00000031这事不能说太细 https://xueqiu.com/5674464747/69985596

富不过三代，三代才出贵族。 反过来说，也就是当富三代开始大规模出现时，就是阶级固化之时 看看英国和日本，外面没路，只能自我压缩扭曲，我们看他们卖基卖萌乐呵，但轮到你你乐意？

“精英社会就是一个低流动性社会，精英阶层为保护既得利益，设置壁垒，导致人才浪费和人力资源配置的低效率；精英社会削弱精英之外人群的人力资本投资积极性；精英社会压制各种要素投入的积极性。这里面我们也做了很多认真的研究，实证发现，社会流动性的高低与GDP增长率呈正向关系，社会流动性高，GDP增速就快。” 这个其实简单想想就能明白，简单做个表，假设有100份资源，10个人(或组织)，各人能力不同，产出率也不同，那么如何分配资源呢？ 从表上看，最简单的平均分配，总产出是104，仅仅4%，产出率是很低的。 将资源集中给最优秀的那个人，总产出是190，高达90%，非常高。 但是且慢，有个规律叫做边际效应递减。在其他投入固定不变时，连续地增加某一种投入，所新增的产出最终会减少。简单一个例子，一台机器每小时生产10个产品，每小时给1份原料产1个，给2份就能产2个，但超过10份后最多只能产10个，甚至因为给料过多，造成机器出故障什么的，反而降低了产出。 当然这个算起来太麻烦，简单处理成以10份为基础，每人所得资源每增加一倍，其产出减半(不足一倍则还是按原产出，所以个人最多只能分配19份资源)。 再看之前的理论最优如果用边际调整是多少 0.19！非常之低。 于是边际调整下最优，每人不超过19份 考虑到公平，每人至少需要1份资源维持生活，仅仅降低了1.6 个人能力并非一成不变的，可以通过教育培训提升，假设教育加值是0.2，最终160，提高了20，可见教育的重要性 同时，年龄经历的增长，让有的人得到锻炼走向成熟，有的人却因循守旧走向衰老，能力也相应变动 可以看到，若维持原有分配，则产出大幅度降低，由60%降到了19% 这个时候重新调整后的最优 (当然实际情况没这么简单，还有更多的影响因素和适用条件。但大体上还是差不多的。)可以看到，将有两个人得到，两个人失去，得到者不论，而失去者，你觉得有多大的可能会自愿交出手中的资源呢？ 这就是问题所在 ================================== 来个更详细，冷酷的数据说话，先说结论，无论初始设定任何随机参数，这个虚拟世界最终都出现了严重的贫富分化。你可以无数次的重启糖人程序，但是每一次都看到贫富分化的重现。 大糖帝国  原作[ 淮夷 ] https://www.douban.com/note/601252110/ 设想你生活在一个棋盘上面。棋盘上唯一的资源是糖。你在棋盘上四处移动，试图吃到尽可能多的糖。 这个棋盘称作Sugarscape，我给它起的中文名字是“大糖帝国”。 这个著名游戏是1996年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的 Epstein 和 Axtell 设计的，这两位是用计算机程序模拟经济演化的先驱。最近我读过一本砖头厚的书《The Origin of Wealth》，提及一些类似的模拟实验。 The Origin of Wealth 7.9 Evolution, Complexity, and the Radical Remaking of Economics / Eric D. Beinhocker /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目的是这样：通过简单的计算机规则，能否模拟出复杂的社会现象，找出现象的成因？ 为此，他们设计了一个下面的棋盘，然后随机扔进去250个糖人，这些糖人象征着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 大糖帝国 左侧是大糖帝国的地形图，由50X50个单元格组成。深色格子含糖高，浅色的含糖少，白色的不含糖。西南和东北有两座深色的糖山，是资源富裕区。棋盘上有大片的浅色地带（资源有限区）和白色无糖区（不妨想像为真实世界的沙漠）。 右侧图中，250个糖人（黑点）被随机播撒在各个角落。它们在棋盘上漫游，寻找糖吃。每个糖人都是单独的计算机程序(agent)，它们有能力吸收信息，观察四周，做出行动。 Epstein 和 Axtell 给这些糖人设置了一些简单的决策规则： 1）糖人的视力可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观测，目标是找到含糖最高的地块。单元格里的糖被吃掉后，过一段时间能重新长回来。 2）如果所食之糖跟不上新陈代谢的消耗，糖人将饿死，计算机将其清除出局。 3）糖人被随机分配不同的基因禀赋。 这包含两个指标： 一是视力的好坏（有人能看到6格之外，有人只能看眼前1格）； 二是新陈代谢的能力（有人代谢一次只消耗1单位的糖，有人则需消耗4单位的糖）。 现在，你按一下启动键，大糖帝国横空出世，糖人们各自为政，移动起来。一开始，局面有点乱，但是很快，研究者发现糖人社会呈现出一种有规律的分布。 下图你看得到，当程序运行期从T1演到T4，糖人们开始围绕两大糖山拢聚，逐渐形成两大部落。无糖区则人烟稀少。而且，糖人们彼此位置分隔颇有效率，任何新长出的糖都会被迅速收割。 大糖帝国 尽管没有一个领袖对其他糖人发号施令，一个具备“自组织”特征的、有效率的社会，已经初具雏形了。 计算机模拟的优点，就是让这个虚拟社会不停的自我演化，瞧瞧到底会发生什么。在此过程里，你可随时抽取一些变量进行分析，譬如糖人的人均寿命、活动范围、最优路径选择，等等。当研究者把目光投向财富变量时（用每个糖人收获的糖量测算），他们发现了一个令人非常意外的现象：这个虚拟世界出现了严重的贫富分化。换言之，人类社会的顽症之一出现了。 底下的图表显示，模拟程序从启动到结束，人均财富分布的演变趋势。 大糖帝国的财富是如何分配的？ 横轴左侧是穷人，右侧是富人。你看得到，国家诞生之初（最顶端的图表），财富在国民间的分配很均匀，基本可算一个平等主义的社会。极富者和赤贫者皆很少，绝大多数人口的收入差别很有限，即使最富有的人也不过拥有30个单位的糖量。 随着时间推移，这个自组织社会的财富分布发生了严重的扭曲。最底下的图表，显示大糖帝国的晚期，最右侧出现极少数的超级富豪，人均糖量高达270个单位。超级富豪的左侧是数量有限的上流阶层，再左侧是不断萎缩的中产阶层，最左边则是人数极为庞大的底层低收入者。 这种分化趋势其实在人类真实历史中已经重现过无数次了。您不妨把上面的图表换成 1949～2012 的中国，中国贫富分化在过去60年的演进路线与大糖帝国简直如出一辙。 事实上早在1895年，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就发现，一个国家的个人收入并不遵循正态分布，而遵循80/20的幂律分布。意思是，20%的人占有全社会80%的财富。 帕累托的发现被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的数据得到了验证。所谓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这种“马太效应”在中国和西方都可算是一个普遍发生而又极难解决的问题。 此处我并不想专门谈论公平正义的话题，反而，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个源头问题是，贫富分化为何一定会发生？ 能不能不发生？ 很多人将贫富的鸿沟归结于资本主义、权贵腐败、或者自己命苦。左派说，富人剥削造成人民穷困。右派则说，你穷只因为自己又笨又懒。 有趣的是，大糖帝国也许能给人们一些新思路。在计算机程序中，你可随意调整各种初始参数，瞧瞧到底哪个参数导致了贫富分化。 例如一个可能的分化成因是每人的禀赋不同。计算机模型中，有的糖人视力6倍好于同类，能看到更大的棋盘，更易找到高糖点。类似地，有的人新陈代谢4倍低于同类，更易于积蓄余糖，抵御饥荒。是否此等优秀人种最终演变成了富人？ 答案是No。盖因个人能力差异是计算机随机分配的。理论上，最终财富的分布也应该近似于均匀的随机状态，亦即，富人、中产和穷人的各自人群数差不多。显然模拟结果并非如此。 另一个可能的成因也许是天生的资源差异。例如模型里，有的人降生于糖山，毫不费力就可大吃特吃，瞬间致富。有的人生在贫瘠之地，历尽辛酸找到含糖区算是命大，有的糖人甚或中途就被饿死。这听来也挺像真实的人类世界：老百姓劳作终生，不过是一场穷忙，不如我爸是李刚来得管用。 好在，计算机模拟结果并不支持“出身决定一切”的模式。要知道，一个糖人占有资源的优劣也是计算机自动给予的，诞于糖山或诞于荒漠，完全遵循随机原则。假如资源差异造成经济分化，最终贫富人数也应均匀分布才对。 看起来，任何模型变量都无法单独解释贫富鸿沟为何越来越深。“天生聪明”不是决定性的，“我爸李刚”也不是决定性的。 其实答案关键在于，大糖帝国本身即是一个复杂性系统，于是人们很难追踪一个事件链（人们由贫转富）的全部前因后果。 您不妨设想有两个糖人，A和B。程序开始时，两人的视力、新陈代谢、出生地的含糖资源，各方面条件都一样。或者说，两个标准的中产人士。 A向四处张望，见其他糖人已在东、西、南三个方向活动，而北方尚余空地。于是它偶然的向北移动。凑巧，走到了东北角的糖山。又凑巧，发现一个没人占领的格子。于是它占住那个区域，开始晋身巨富阶层。 B同样四处张望。出于偶然，它向南移动了一步，结果渐渐走进一名贫糖区。当它意识到这个方向错误，其它糖人早已围满了通往北方糖山的路径。它再无机会，只得四处漫游，积蓄耗光，变成赤贫。 于是两个天生条件差不多的人，最终社会地位出现天壤之别，这种情况也被经济学家称作”horizontal inequality”。这反映出，一些细小的和偶然的差异，足以在系统里造成巨大的后果，这正是复杂性系统的特征之一。 复杂性系统的另一个特征是所谓的“涌现”(emergence)。2009年英国物理学家 Neil Johnson 写的《Simply Complexity》一书，我读到很多类似现象，譬如鸟群复杂的飞行队列、蚁群的精密筑巢、股市的波动周期，这些活动表面上皆有隐藏的秩序，实际上往往只是个体活动的涌现而成，不需要任何复杂设计和高等智力引导。 Simply Complexity 评价人数不足 A Clear Guide to Complexity Theory / Neil Johnson / Oneworld 仍以糖人世界来说。糖人并没长着脑子，被规则管的死死的。它们不能彼此商量下一步的共同策略，人群里也没有一个司令官。但是，这些个体简单行为聚合起来，最终产生了一种“自组织”的贫富分化。你可以无数次的重启糖人程序，但是每一次都看到贫富分化的重现。 在此意义上，人类贫富的两级分化很可能是无法避免的，而且也许只会日益严重。就算您管理的只是大糖帝国这样的虚拟小国（250个人口，高度简化的游戏规则），你也很难为糖人们的贫困问题设计一个真正管用的解决方案。这样想来，这个问题让我有些悲观。 如今中国的贫富悬殊程度已经全球瞩目，十八大报告又强调中国“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这条路怎样才能走的通呢？ 中国的未来方案有待观察。但是我希望中国能走通这条路，中国也必须走通这条路。毕竟，大多数国民并不喜欢生活在一个“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大糖帝国。

# [中国长期经济增长潜力与社会流动性](http://think.sifl.org/?p=7264" \o "中国长期经济增长潜力与社会流动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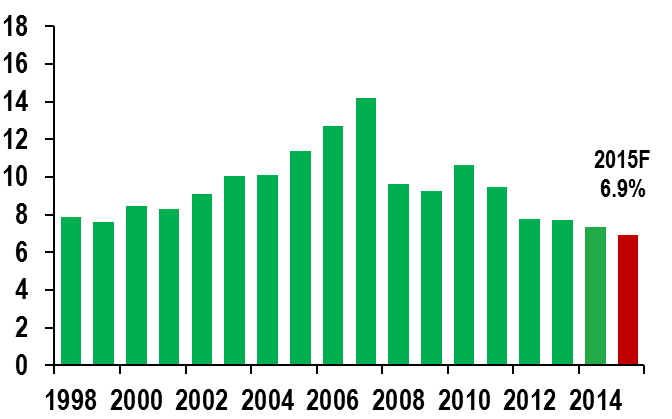
发布于: 2015年12月21日 **[思想库](http://think.sifl.org/?author=1" \o "由 思想库 发布)**

本文为渣打银行资深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颜色教授在第75期鸿儒论道的精彩演讲。

#### ****中国经济的短期增长与长期增长****

相对于经济的长期增长而言，现有的经济分析更关注的是短期经济增长。就短期来看，众所周知，中国经济现在面临非常严峻的转型问题，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GDP增速一直在往下跌，很多人都怀疑中国模式走到了尽头。中国到底还有没有可能在未来的30年继续维持高速增长，这是很多经济学者和精英人士都十分关心的现实问题。这种现实性体现在，很多人会问，中国现在还能不能在国内投资，能不能在国内买房地产？如果中国经济增速继续下滑，是否应该赶紧把资产换成美元，早点准备移民？

乐观地讲，如果短期的下跌只是转型的痛苦期，那没关系，过两年经济增长的势头又会重新提振；如果经济增速能保持在7%，也已经相当不错了，以目前中国经济的体量，这样的增速意味着GDP每年增加一个土耳其；如果这一增速能保持30年，那么中国真的将变成一个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因此我们没必要非要追求双位数的增长。



**图：中国GDP年增长率**

问题关键在于，中国的GDP增速是否会一路下滑？假定今年的增速是7%，在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年的GDP增长目标可能定在6.5%。有人担心，照这个趋势下去，经济增速会不会一路下滑。要回答这个问题，其实说白了，就是要理解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模式，搞清楚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是什么？为什么原来的驱动力不能再驱动了？我们有什么新的驱动力？如果我们有新的驱动力，怎样才能把这些驱动力发挥出来？

对于上述这些问题，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回答。总的来说，过去的增长模式是什么？很简单，投资拉动与出口驱动。

具体来说，投资拉动就是一种要素推动的增长，长期以来我们依靠的投资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房地产投资，二是政府的基建，三是制造业的投资：

l  如今这三项主要的投资拉动效果都比较疲软，相对比较稳健的还是基建投资，虽然前一段时间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地方债和反腐败等等，曾经一度也比较低迷，现在我们看到基建的投资逐步开始活跃起来。特别是明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很多重大项目有可能会启动，所以地方的基础设施投资还算比较稳固。

l  但房地产的投资比较疲软，由于前段时间新建住房太多，特别是二、三线城市的房产库存较多，到底什么时候能够走出库存周期，各方观点不一。尽管从目前来看，房地产交易仍然呈现出量价齐升，但是房地产的投资依然是比较疲软。

l  制造业的投资是最核心、最根本的驱动力，但制造业的投资是非常低迷的。制造业的投资，是与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的愿景和信心联系在一起，因为制造业的投资要等5-10年以后才开始慢慢回本，投资制造业会关心2020年、甚至2025年的经济状况，换句话说，5到10年之后能否赚钱，才是制造业投资关心的关键问题。对此，市场情绪普遍比较悲观的。

出口方面，近几个月来，中国出口都呈现负增长，其原因在于，在中国刚刚加入WTO的那几年，出口的年增长率曾达到过20%—30%，这将一举拉动GDP五个百分点左右。但出口是和外需息息相关的，而由于欧美国家受本国经济萧条的影响，对中国产品的需求疲软，因此从长期来看，中国的出口再也难以恢复到2002年以后黄金时期的增速了，中国传统贸易伙伴的增长潜力基本上已经用尽了。相应的，在国际贸易市场中，中国试图将市场份额从30%提高到40%是十分困难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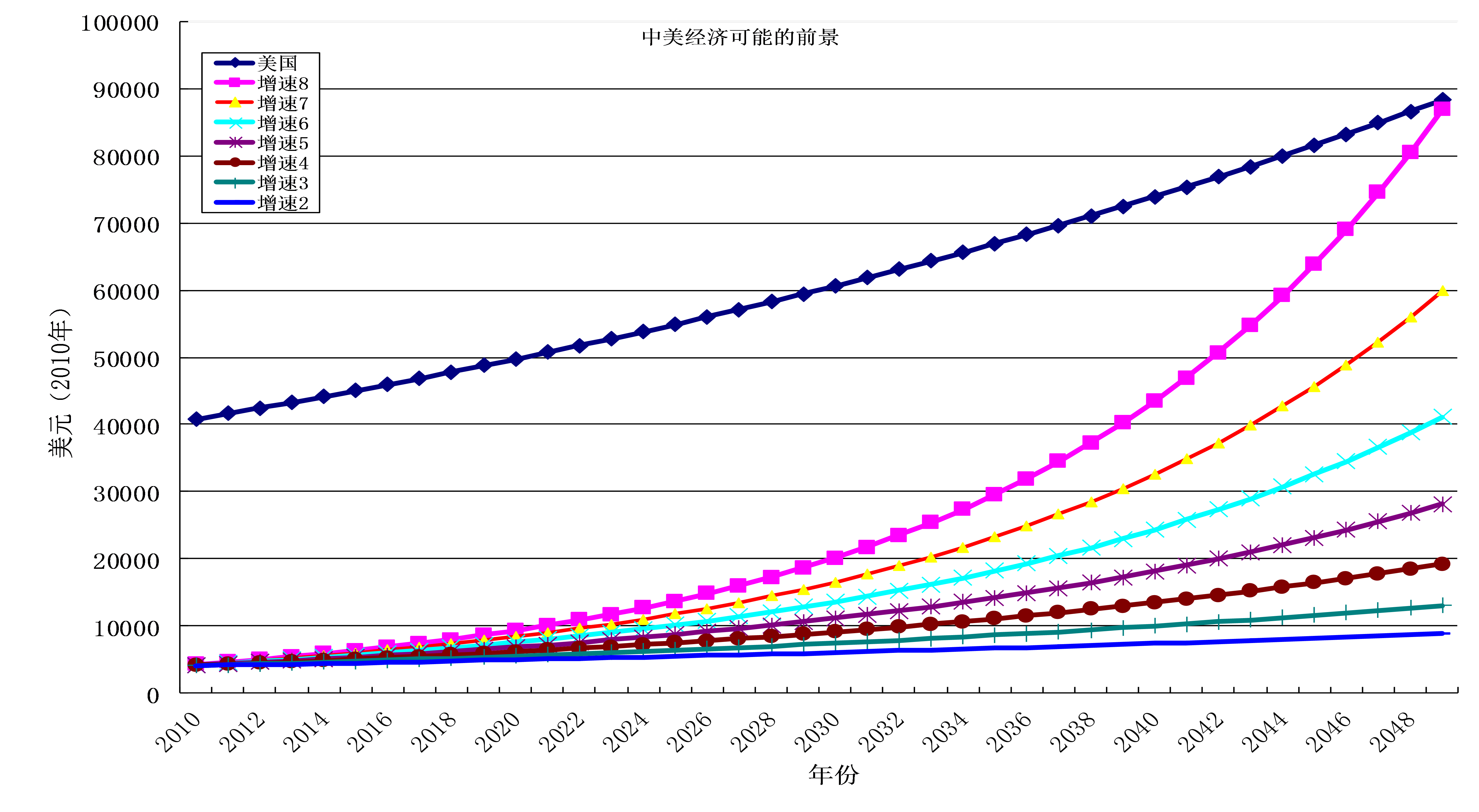
要想继续靠出口拉动经济，另一条途径是产业结构升级，出口中高端的产品，但这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因此，从数据上看，出口在GDP中的份额也在不断下降：现在已经下降到20%了，最高的时候有30%多。

此外，由于本国经济的发展，本国居民的购买力也在逐步的增加，内需的相对重要性越来越高，而出口已经不再是我们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如前所述，投资低迷的主要原因在于投资信心非常低迷，为什么投资的信心非常低迷呢？这就是我所关心的问题：为什么大家对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信心不足？

我们经常讲要转型，要转变成一个以消费和服务业为主要增长驱动力的经济体。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已经逐步实现了这一转变，可是我们没有投资，没有供给侧。我们尤其强调供给侧，因为中国经济现在的疲软是三期叠加造成的，有短期的问题，也有中长期的问题，而中长期问题就与供给侧相关。如果我们片面强调消费，片面强调服务业，其实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尽管我们强调消费驱动经济增长，但是消费不能片面脱离实体经济，否则就很有可能重蹈美国次贷危机的覆辙。

总之，我们认为，现在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主要还是供给侧出了问题，因此我们非常赞成中央说的供给侧改革。为什么供给侧出问题？为什么投资不足就是供给侧出了问题？为什么投资会不足呢？这就是我们现在想要回答的根本性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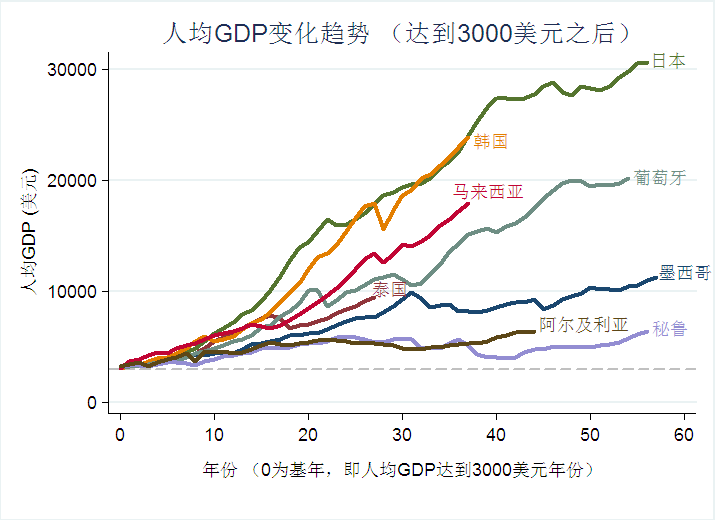
**图：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增长前景**

上图对比了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增长前景，图中上方的曲线代表美国GDP的长期增长趋势，而下方不同颜色的线都是在假设中国以不同的GDP增长率的经济前景：假设中国能保证8%以上的增长率，我们可能很快就能赶超美国了；如果我们稍微低一点的增长率，赶超美国也是有希望的；但是如果增长率过于低，低到4%以下，赶超美国就遥遥无期了。

赶超美国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但它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如果我们真的能保持6%—7%的中高速的增长，等到建国一百周年时，中国很有可能成为真正的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但是如果我们做得不好，那么经济增长前景就将是最下面那几条缓慢增长的曲线，用现在流行的一个词来说就是中等收入陷阱。

尽管目前关于中等收入陷阱是否存在，学界有很多争议，我觉得这取决于怎么定义，但无论如何，确实有很多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徘徊不前，这是一个事实，例如一些拉美的国家，人均GDP一直徘徊在5000~10000美元的水平线上。如今中国的人均GDP正好处在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数上，即7500~7700美元，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如果中国要想再实现持续30年的中高速的增长，那就必须要转型，因为原先的投资和出口已经无法再作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了。



**图：各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比较**

上图展示了一些国家在面临中等收入陷阱时的结局，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别的国家怎么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图中的纵轴是人均GDP，一般认为，3000美元以下通常被认为是一个贫穷国家，突破人均3000美元便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我们暂且将中等收入国家的上限定为人均GDP达到15000美元，而图中的横坐标代表实现相应的经济增长需要的时间，那么从图中可以看出，表现最好的是日本，日本从人均3000美元到人均30000美元花了60年的时间；其次，韩国是从人均3000美元达到人均20000多美元，大概花了35年，也相当了不起了。此外，葡萄牙由于工业化较为漫长，从人均3000美元到人均20000美元花了60年。墨西哥现在还没有突破中等收入陷阱，人均GDP就徘徊在一万美元上下，所以墨西哥是典型的没有走出中等收入陷阱。还有很多其他国家，人均GDP也长期徘徊在一万美元以内，泰国、阿尔及利亚，秘鲁，这些国家都没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

然而，如果我们限定在二战以后不通过侵略、殖民等其他途径，仅仅通过现有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而成功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成为真正发达国家的例子，事实上屈指可数。照此定义，日本也不能算，因为日本在二战之前已经发达了，日本之所以能成功走出中等收入陷阱，还涉及到很多其他因素。真正通过现有的世界经济秩序、成功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我认为最最典型的就是韩国跟台湾地区。

绝大多数国家或地区都能摆脱贫困陷阱，即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这条线；但是15000美元这条线，在现有的世界秩序下是比较难超越的，现有的成功案例并不多。之所以很多国家难以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其背后的原因在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的增长机制是不一样的。

我们可以粗略地把增长机制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要素驱动型的阶段，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GDP在3000美元以下，要想实现经济腾飞，只能靠要素驱动型的增长。

第二阶段是效率驱动型的增长，即对于中等收入国家来说，经济增长的主要的驱动力来自于效率。

第三个阶段是创新驱动型的增长，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GDP达到15000美元以上，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来自于创新。

当然，这种划分并不是说在第一个阶段就没有效率和创新的驱动力，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在每个阶段都是混合的，但是每一阶段主要的驱动力是不同的。

根据2013年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对于低收入国家来说，平均下来，60%的增长来自于要素投入，但这个阶段也有来自效率和创新的驱动力，但贡献很小，比如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平均只占5%。因此，在这个阶段要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就只能不断增加要素投入。

|  |  |  |  |
| --- | --- | --- | --- |
|  | 要素投入的  贡献 | 提高效率的  贡献 | 创新的  贡献 |
| 要素驱动模式 | 60% | 35% | 5% |
| 效率驱动模式 | 40% | 50% | 10% |
| 创新驱动模式 | 20% | 50% | 30% |

数据来源：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3. WorldEconomic Forum.

在效率驱动型的阶段，即中等收入阶段，效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提高到50%，但是依然需要增加要素投入；同时，创新的贡献上升到10%。

对于创新驱动的发达国家，要素的投入就比较小了，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只有20%，效率提升的贡献仍然高达50%，而创新的贡献上升到30%。

根据这样的规律，要想跨越贫困陷阱，首先必须经历要素驱动的阶段。跨越贫困陷阱其实相对而言是比较容易的，但是依然有一些国家长期处在贫困陷阱里。在这个阶段，所谓的要素无非就是劳动力、资本、土地、自然资源和环境，其中最重要的要素就是劳动力。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价格都相对比较便宜，对空气和水的污染也不会面临严格的执法。所以在要素驱动的阶段，经济增长的特征就是依赖低价格的要素，拼命地增加投入。

在这一阶段，做得最好的国家就是中国。中国过去经济发展中的各个方面都体现出典型的要素驱动阶段的特征，甚至是教科书式的。对于低收入国家来说，如果想要实现经济增长，一定要好好研究中国模式。但是要实现要素驱动的增长，需要具备以下这些条件；

第一，强有力的政府支持。这一阶段，很多国家或地区的政府都比较虚弱，导致很多经济政策无法执行。但是，中国、韩国和台湾地区在这一阶段都具备了政府强有力的支持这一条件。政府强有力地干预经济，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同时进行适度的产权保护。我特别强调，适度的产权保护。就是说，一方面要有产权保护，使得人们愿意投资，愿意积累资本。但是产权保护如果过度，那就牺牲了效率。

第二，效率比公平更优先。什么叫适度产权保护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拆迁。假设一栋房子正好在计划修建的公路上，那么拆迁就需要给予补偿；如果绝对尊重产权，那么解决办法只有两个，要么增加补偿款直到业主同意拆迁，要么公路改道，总之这都意味着成本的增加和效率的损失。但如果适度尊重产权，一旦补偿款谈不拢，就强拆了。由于处在要素驱动的增长阶段，很难讲这种适度的产权保护是否合理，比如中国大陆的高速公路都是直的，台湾地区的高速公路都是弯的，因为大陆更强调效率高于公平。

第三，健康的、受过初等教育的劳动力非常重要。我们经常说中国的劳动力是廉价的，但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不准确的。

中国的劳动力确实廉价，但更重要的是高效。所以尽管现在中国劳动力不廉价了，为什么很多跨国企业还在中国生产呢？搬走的只是少部分低端制造业，中高端制造业为什么还留在中国呢？80年代的时候，很多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劳动力比中国更加廉价，为什么跨国企业不选择去非洲国家投资生产呢？因为中国的劳动力高效。

中国的普通劳动者有两大特征，第一，他们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作风勤俭，愿意服从，重视团队合作。更关键的是，他们相信努力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很现实，懂得计算成本收益。这就意味着劳资双方可以进行谈判。第二，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青壮年劳动力由于成长在毛时代，因此其中的绝大多数，尤其是大多数女性劳动者都接受过初等教育，他们识字，他们崇拜现代西方科技。毛时代的教育普及为中国的现代化打好了底子，使得妇女的识字率达到90%以上；而印度的妇女识字率，全国平均只有40%左右，很多偏远地区更低。

这些健康的、受过初等教育的青壮年，就成为改革开放后廉价、高效的劳动力的来源。所以说白了，中国第一阶段的增长靠的是三亿的农民工，这些农民工为我们工业化提供了最稳定的劳动力来源。

到了第二阶段，经济增长不能再依赖廉价劳动力了，而是主要靠效率驱动了。很多拉美国家都无法达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因为在这一阶段，经济增长的机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前是靠拼命地投入要素，但现在的增长要靠提升市场环境，即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竞争力，为将来进行创新驱动做好准备。这时候就需要高等教育，需要人力资本的积累，需要各项改革的深化，需要比过去更加重视产权保护。在这一阶段，政府要慢慢地淡出，政府要做正确的事情。这时候我们希望政府真正地开始逐渐地做守夜人，而不是直接进行投资，直接干预经济。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政府在第一阶段是强势的，现在要卸磨杀驴，政府内部也有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当然不愿意轻易放弃既得利益。

第三阶段是创新驱动的阶段，就是现在的发达国家所处的阶段，要过渡到这一阶段就更难了，它意味着把人类所谓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往外推。在这方面，目前我认为只有美国和德国才真正具有原创的实力，而其他很多发达国家，比如日本和一些欧洲国家都是以模仿赶超为主的，一旦达到了这个阶段，就很难涌现出持续的创新能量力了，在创新驱动的阶段，需要进一步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都要非常高效，需要优良的创新生态和创新文化。

如前所述，中国在摆脱贫穷陷阱的过程中是教科书式的典范，正如厉以宁教授所说，中国模式实现了双重转轨之路，一是从农业国转变成工业国，进行持续的工业化，二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在这个过程中，效率的提高是很明显的。所以中国在经济增长的第一阶段是要素和效率双重驱动的增长，这表现在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上，改革开放30年来，TFP贡献了52%的经济增长，而改革开放初期TFP的贡献率更高，这说明我国的经济增长是要素驱动和效率改善相结合的，我们的工业化是要素驱动，我们的改革是效率的改进。

|  |  |  |  |  |
| --- | --- | --- | --- | --- |
| 时间 | 1978‐2007 | 1978‐1988 | 1988‐1998 | 1998‐2007 |
| 人均GDP增长率 | 7.58 | 6.77 | 6.4 | 9.79 |
| 人均资本增长率 | 3.66 | 2.58 | 3.35 | 5.21 |
| TFP增长率 | 3.92 | 4.19 | 3.05 | 4.58 |
| TFP贡献 | 52% | 62% | 48%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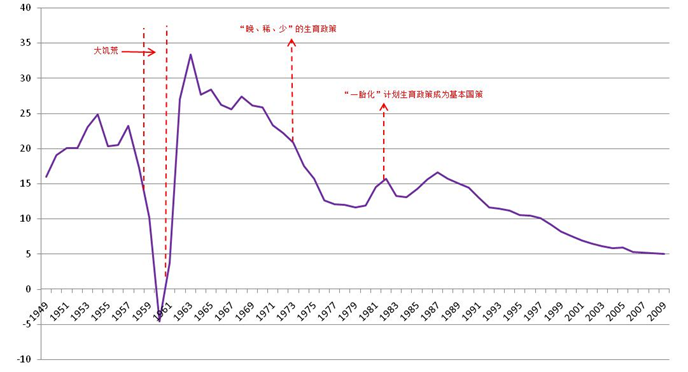
Brandt and Zhu (2010)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在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十年中，我们通过农村的改革和城市的改革，使TFP贡献了62%的增长。但是到了第二个十年，TFP贡献降低到48%，第三个十年继续下降到47%，这说明我们第三个十年尤其是一个要素驱动、而不是效率驱动的增长，因为我们非常依赖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所以中国在第一阶段能够成功的关键在于要素驱动加上效率的改善。但是这种情况如今很难再维持了，这就涉及到下一个问题：中国为什么要转型？

#### ****人口压力与经济新常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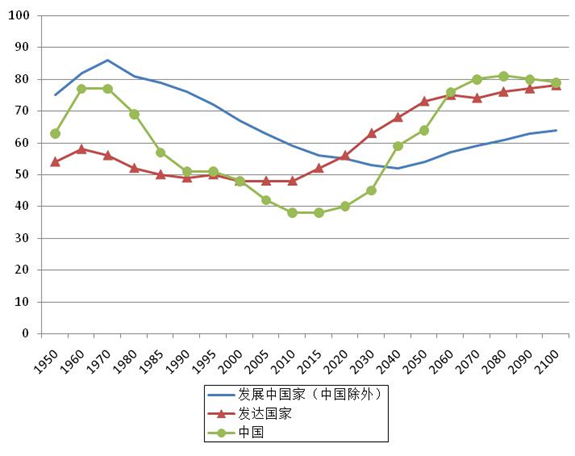
中国为什么不能像过去30年那样继续双位数的增长？为什么要转入新常态？那是因为，第一，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我们以后不会再有三亿多农民工了；第二，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了，工资必然要涨上去，劳动力成本也就上涨了；第三，环境和资源承受力不足，比如前几天，北京刚刚遭遇了史无前例的雾霾；第四，持续投资的边际收益已经开始逐步下降了，我们已经到了临界点。

其中，我最关注的是人口问题，如今，我国的人口的增长速度是一路下降的，目前中央已经放宽了计划生育政策。从下图中可以看出，在50年代末，中国出现过一个人口增速突然的下跌，那是大饥荒，大饥荒过后人口增速又出现了反弹。此后由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增速一路下滑，直接表现为总和生育率的下降。有人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估算出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是1.18，就是说平均一个妇女一辈子只生1.18个孩子，换句话说，上一代还有两个人，下一代就变成1.18个人了，这样下去，人口萎缩是极其迅速的，将导致极其严重的人口危机。有人认为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没有那么低，大致是1.4，但1.4也是很可怕的。



**图：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口增速的变化**

此外，我们还可以引入另一个指标：人口抚养比，即指全社会需要抚养的人口与劳动人口的比值。其中，需要抚养的人口既包括老人，也包括小孩。由于过去中国的人均寿命很低，尽管此后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但人口抚养比是一路下降的，如今人口抚养比已经降得很低了。但今后人口抚养比将开始回升，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老人的平均寿命越来越长，现在退休的老人都是建国以后出生的，和平年代出生的人，在幼儿时期的营养水平和医疗水平都相对要提高一些。此外，随着国家放宽计划生育政策，未来人口出生率的增加也将补充新增劳动力。不过，中国即将步入非常严重的老龄化社会。事实上根据严格的定义，中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了，65岁以上的人口占比已经超过10%了。



**图：人口抚养比，中国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对比**

计划生育政策最重要的影响在于导致劳动力总量的下降。中国的劳动力总量从2012年开始下降，每年下降200-300万人，这种情况只会越来越严重，劳动力总量很快就要跌破9亿了。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人口红利的消失，这将直接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同时，社会供养，社会保障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大。此外，现有的学术研究表明，老龄化会导致各种复杂的效果，比如说老龄化会导致创新动力的缺乏，像在日本这样一个老龄化程度很高的社会，年轻人没有人愿意创业，更多的年轻人就愿意到一个大公司去领一份稳定的工资，老龄化对创新是非常大的压抑。

李宏斌教授和他的团队刚刚发表了一篇论文《廉价中国劳动力的终结》，文中指出，过去这五年，劳动力成本增长是非常明显的；从2010年开始，中国制造业成本开始迅速上升，这些现象我们从日常生活中就能直观地感受到。有学者甚至认为，中国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已经超过墨西哥了，在亚太地区已经仅次于菲律宾了。

人口抚养比上升的另一个影响就是社保的问题。劳动人口的大幅下降，导致社保的压力越来越大，社保现在的缺口非常大。总之，过去我们靠优质的低端劳动力来驱动增长的模式已经无法持续，所以我们必须要转型，转向效率驱动的增长。效率驱动的增长隐含着一个前提，那就是我们的经济运转中还有好多无效，或者低效的环节。那么这些无效或者低效的环节在哪里呢？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当下，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感受。

#### ****如何提高效率，实现中国经济长期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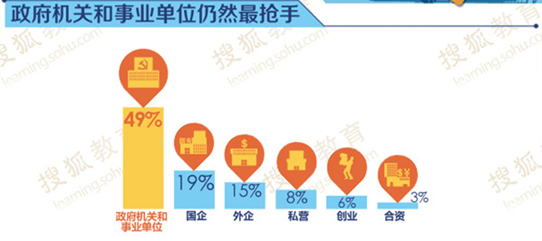
事实上，中央现在已经完完全全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提出供给侧的改革。我个人认为，供给侧改革的着眼点就是效率的提高，而效率提高的着眼点在于要素市场的效率的提高。要素市场的效率的提高包括，第一，劳动力市场的效率的提高，第二，资本市场效率的提高，第三，土地房地产市场效率的提高，第四，政府的角色要更合理、更有效率，第五，市场体系、市场整合程度的进一步完善。

为什么要素市场效率的提高是下一步效率提高的核心呢？因为我们的产品市场已经很高效了，我们现在有网络电商，我们有零售商业。事实上自从1993年价格闯关以后，中国已经建立了初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谓初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因为我们只是在产品市场，而没有在要素市场建立的有效的市场。要素市场的改革一直徘徊不前，越来越难改。

我们最主要强调的是劳动力市场效率的提高，如今劳动力市场面临的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从低技能的劳动力向高技能劳动力的转变。1999年，中国一年只培养出100万大学生，而到2015年，今年我们培养了770万大学生，再过五年，我们一年要培养出1000万大学生，过去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么大规模的高等教育的扩张。

由于劳动力市场的萎缩，再过五年我们家里可能都请不起保姆了；但是，中国会有世界上最便宜、最高效的工程师，这是我们中国赖以增长的最大的潜能。有人说这些大学生没有用，什么都不会。我想说，首先，大学生真的不是没有用，只是他们会的东西你不会；其次，就算中国的大学生两个才顶一个用，那么每年五百万高端劳动力依然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今后每年的新增劳动力中，三分之二受过大学教育。所以说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是否有潜力，关键在于是否能把这部分高端劳动力投放到正确的行业和正确的城市，保证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质量。

但是，要想做到这一点，很难。就目前的就业数据来看，49%的大学生进入政府单位和事业单位，19%选择国企，15%选择外企，8%选择私企，6%选择创业。可见，进入政府、事业单位国企的大学生占了绝大多数，关键问题在于我们的私营企业没有升级，它们还只想着雇农民工，但是由于供给减少，农民工的工资一直在上涨，所以劳动力成本越来越高，高到哪一天承受不了了，就把生产线转移到马来西亚或者越南去。



私营企业之所以难以实现产业升级，主要因为资本市场不支持，资本市场只支持国企。所以，各种要素市场效率的提高是结合在一起的，我们希望到2025年要实现向高端制造业的升级，那就要让大学生能够进入高端制造业，到那时，随着劳动力总量的减少，很有可能出现几个大学生操作一大批机器人，在高度自动化的生产线上工作，这才是我们将来努力的方向。

第二个问题是，将来工作后的大学生在哪里工作、生活？现在毕业的大学生都只想在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工作，之所以他们不太愿意回老家县城工作，是因为县城都凭关系，发挥不了自己的才能。反观特大城市，其实效率也很低，比如在北京工作，上班的路上就需要两个多小时。我们需要的是人口在500-800万的大型城市、特大型城市，这样规模的城市有完整的产业链，大学生可以凭自己的简历找工作，不用拼爹。但在目前的中国，这样的城市太少了。我一直认为，城镇化是错误的，城市化才是对的；规模太小的城镇只是一个养老的地方。无法提供完整的产业链。国际城市经济学普遍认为，中国的城市太小了，很多城市的城区人口都只有200-300万，而像北上广深这样的超大型一线城市毕竟不能代表中国城市化的总体状况。

第三个问题是，怎样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这就需要创意产业、文化产业、服务业的发展，满足中产阶级的需求。我经常举一个有趣的例子，三年之前只有一家电影公司上市了，那就是华谊兄弟。中国有这么大的中产阶级的人口，但当时只有一家电影公司上市了，如果三年之前你买了华谊兄弟的股票，现在一定发财了。

总之，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就取决于是否能提高以大学生为代表的高端劳动力的工作条件、居住条件和生活质量，如果劳动力市场的配置效率在未来10年内不断提升，应当能够提高经济总效率约20－25%。

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其实并不容易，我们需要：

l  稳步的城城镇化，目前我国的城镇化是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市化，这需要改革；

l  需要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l  需要提高人力资本投资。

前两项都是政策问题，我们在“十三五”期间都会着力推进改革。但人力资本投资是个人理性行为，不是政府命令能解决的。要提高人力资本投资，最重要的事情是要提高社会流动性，就是要削弱上一代人对下一代人的社会地位、收入、教育水平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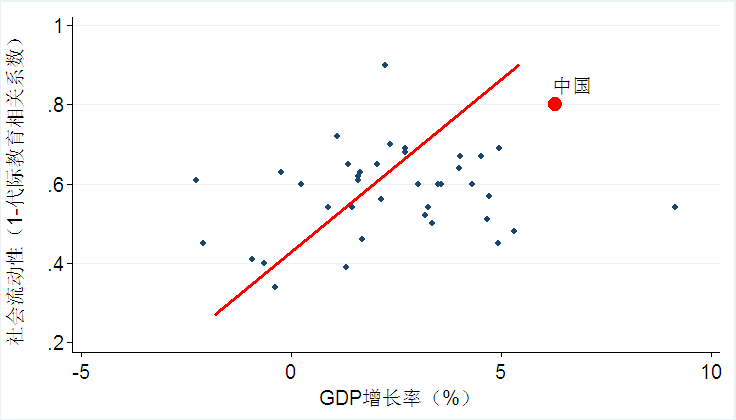
社会流动性差，就是所谓社会固化，用一句古话来说就是“龙生龙、凤生凤”；而社会流动性好，就是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在中国古代，实现社会流动很大程度上靠科举制度。在经济学中，衡量社会流动性的指标是两代人的相关系数，包括收入的相关系数、社会地位的相关系数、教育水平的相关系数等。相关系数等于1，意味着上一代人的收入完全决定了下一代人的收入，这样的社会是一个非常固化的社会；相关性等于0，意味着无论上一代人的收入如何，下一代人的收入都是随机分布的，两代人的收入之间没有相关关系，这样的社会就是具有高度流动性的社会；如果相关性等于-1，意味着如果你的父母是社会中的最高收入者，那么你将是社会的最底层，这就是革命。正常情况下是不会爆发革命的，因此社会流动性的相关系数通常是在0-1之间波动。两代人的收入之间总会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但你的收入又不是完全由父母的收入完全决定。

因此，要提升人力资本，一定要有一定的社会流动性。我们经常用基尼系数来衡量静态的不平等，其实基尼系数没有那么重要，美国的基尼系数很高，北欧国家的基尼系数很低，问题并不出在收入差距本身，重要的是收入差距可以通过努力来弥补，这叫动态的不平等。我们可以试着比较一下两个社会，假设在第一个社会中，基尼系数很低，但没有社会流动性，第二个社会中基尼系数很高，但社会流动性很高，哪个社会更有活力呢？显然是第二种社会，这就是美国型的社会，但是如今美国社会流动性也在降低。

代际相关系数解释了一个人成功靠什么，是靠基因、靠家庭出身、靠社会环境、靠自己的努力，还靠运气。如果某个社会中人们的收入和社会地位全靠基因和家庭，那自己努力就没有用了，就不会去努力地积累人力资本。所以，健康合理的社会流动性是社会活力的保证，是人力资本积累的保证，也是我们成功地进行效率驱动增长和创新驱动增长的保证。

#### ****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事实上这个是中国现在面临的非常严峻的问题，精英为什么不能保证社会持续增长？著名经济学家Acemoglu就指出，精英社会就是一个低流动性社会，精英阶层为保护既得利益，设置壁垒，导致人才浪费和人力资源配置的低效率；精英社会削弱精英之外人群的人力资本投资积极性；精英社会压制各种要素投入的积极性。这里面我们也做了很多认真的研究，实证发现，社会流动性的高低与GDP增长率呈正向关系，社会流动性高，GDP增速就快。



从静态的角度看，效率与公平存在一定的矛盾，所以，要实现效率和公平的相互促进，必须有动态的视角。合理健康的社会流动性，一方面能够保持社会活力，促进效率提升和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能够保证社会的动态平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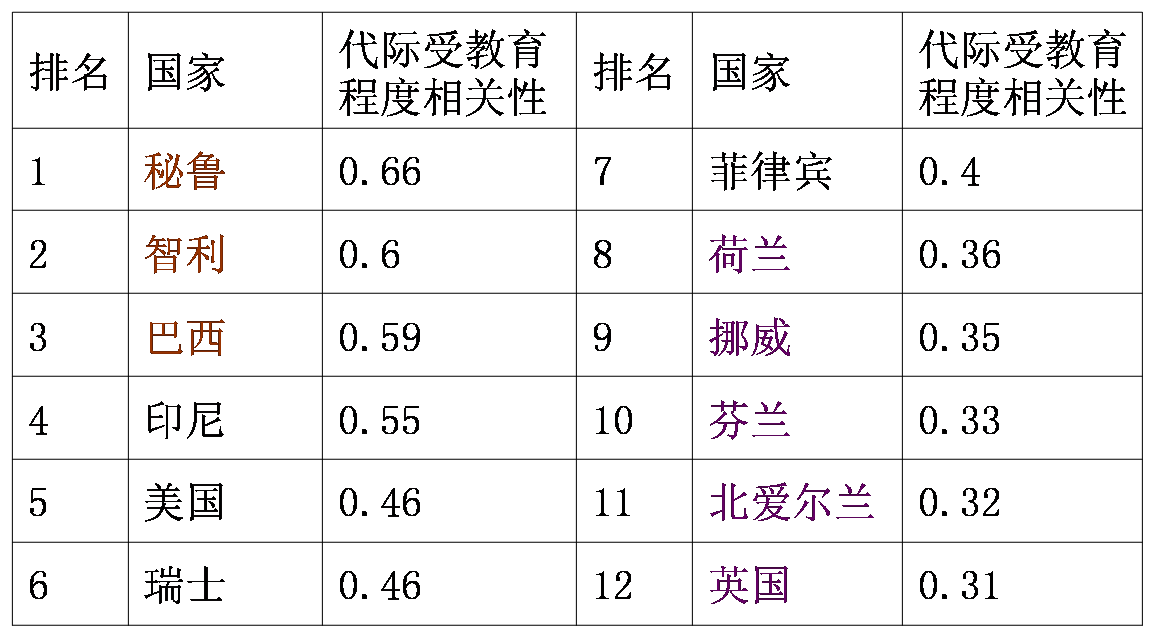
面对严重的静态不平等，如果我们只是关注静态不平等，试图以强行的再分配去实现静态的平等，则适得其反。相反，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动态平等，增强社会活力，同时能够逐渐减少静态的不平等。

哈佛商学院的教授Ariely and Norton在一项研究中，发现美国人民极大的低估美国社会的不平等（top20% own 84%, 实际59%)，不是因为他们不在乎，而是他们认为每个人都有可能成功：“美国梦”就是描述美国社会这种高流动性，所谓“美国梦”，就是说我以前什么都没有，但是我通过自己的努力，过上大房子、大车的生活。

结合中国的现实情况，也结合很多国家的经验教训，为什么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后社会流动性容易降低，社会结构容易固化？

因为以前的经济增长带来社会分层，带来利益阶层，由于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还不完善，既得利益集团就想要固化这种分配模式，加上政府在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博弈中不能做到公平、公正，社会对于动态的机会公平没有文化共识，最终就导致社会流动性降低。

我们引用Hertz等人关于社会流动性的一个研究数据，可以看到一定程度上，低流动性跟中等收入陷阱是相关的：秘鲁的代际受教育相关系数高达0.66，智利高达0.6，巴西高达0.59，美国0.46，美国现在也不低了，很多发达国家都是相对比较低的，这个代际相关系数低就是流动性比较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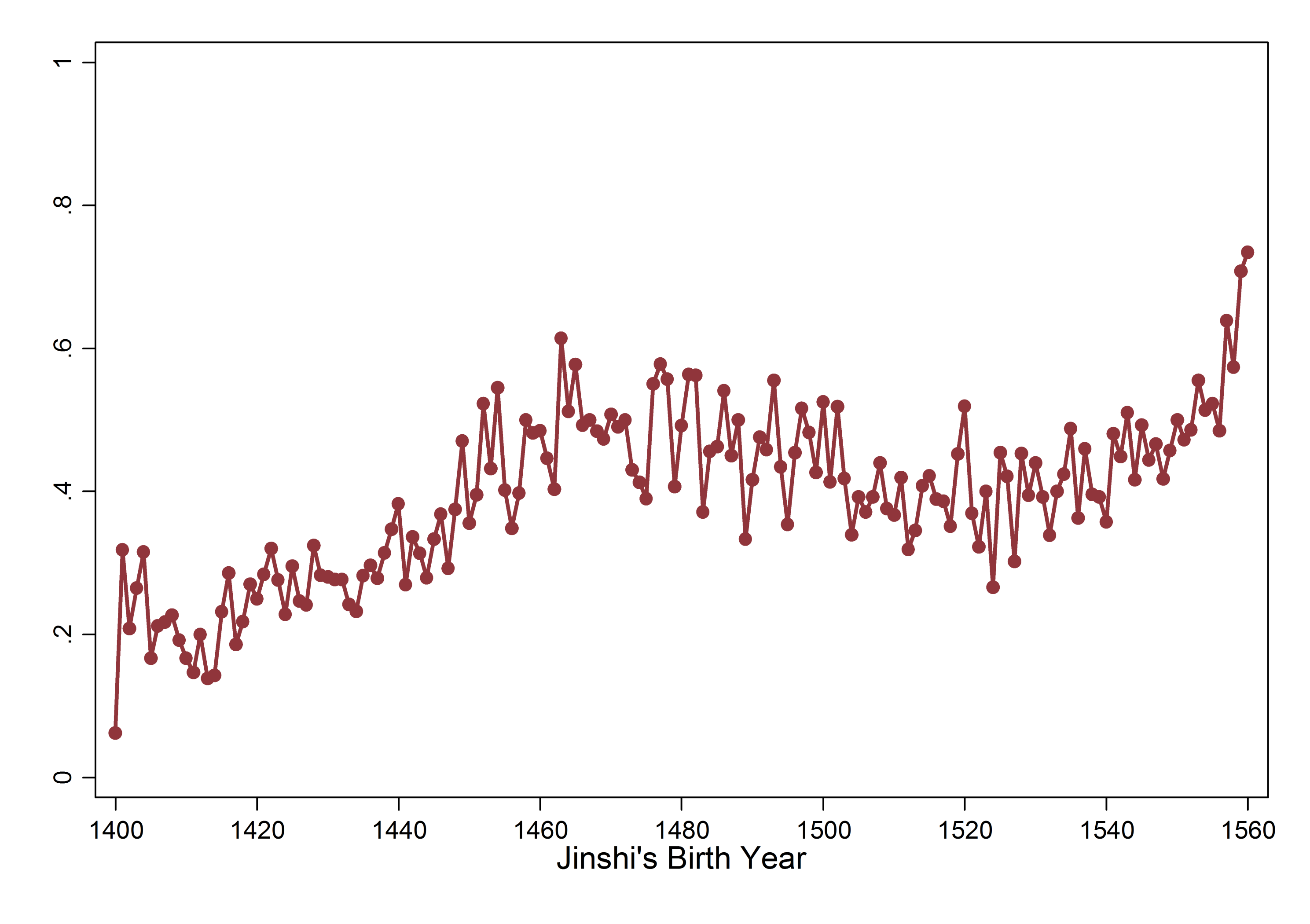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Hertz等（2007）**

中国的社会流动性是什么情况呢？中国在改革开放前二十年，社会流动性是非常高的，有人开玩笑说改革开放前十年，发财靠胆子；第二个十年开始，发财靠路子，社会流动性开始降低，再过十年，发财靠老子，那就是社会流动性最低了。

根据斯坦福教授Khor和Pencavel在2010年的一项研究，1998年后，中国社会流动性在降低，所以才出现所谓的官二代、富二代，官三代、富三代。现在这精英阶层里面还分层，比如红二代看不起官二代，官二代看不起富二代。这种情况是非常危险的信号，所以像“我爸是李刚”这种事情就变成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事件。

这种情况跟我们古代是一样的，古代科举制度刚开始给社会提供了比较高的流动性，但随着社会逐渐成熟稳定，社会流动性都会降低。我曾做个一个研究，看明朝的进士，有多少是精英家庭出来的，有多少人是普通老百姓：早期的时候，进士出身于精英家庭的比例只有20%，然后随着时代的推延，这个比例一直上升到60%，后来虽然有下降，但总体而言的趋势都是上升的。所以，到了万历时期，80%的进士出自精英家庭，老百姓就没什么前途了。进一步的，我们还研究了天气冲击对它的影响，我们发现天气非常恶劣的时候，由于收入的效应非常明显，穷人更没钱上学和考试，所以这些时段精英阶层中进士的比例更高。



**图：明代出身于精英家庭的进士比例**

高考制度跟科举制度起的是类似的作用，但现在教育的水平和质量越来越取决于出生和出生地：钟莉2006年的一项研究指出，1990年中国城镇和农村适龄人口高等教育入学率分别是2.6%和0.9%，前者约是后者的三倍，而2003年分别为26.5%和2.7%，二者差距扩大到了近十倍；再看教育质量，杨东平2006年的研究指出，重点高校中农村学生的比例呈现下降趋势，清华大学2000年农村学生的比例为17.6%，比1990年减少4.1个百分点，北京大学1999年农村学生比例为16.3%，比1991年减少2.5个百分点。

以我们光华做例子，一个教室200多个学生，首先地区就不平衡，我说有几个是人大附中的？有十来个，但学生中来自人口大省的，比如江苏等，上光华也不超过5个；再看农村生源比例，光华管理学院本科学生中，来自农村家庭学生不到10%。为什么？社会阶层固化，他觉得没有希望，我干吗要考大学呢？反正考也考不上，为什么考不上？因为大学强调素质教育啊，农村小孩没法搞素质教育。

这一点中国走上美国的歧途，美国的歧途是什么？就是公立教育缩短学时，一点半就放学，黑人的小孩一点半以后在街上玩儿，慢慢拉帮结派。那些有钱人家的小孩一点半以后干什么？是家长带着上各种培训班。现在据说有精英学校，一定要爸妈都参与，这个是很奢侈的，普通工薪阶层爹妈都得上班的，哪有功夫管，所以就变成精英教育。中国现在也有这个趋势，讲素质教育，比如说要弹钢琴，几个农村家庭买得起钢琴？一张笔，一支笔是最好的、最公平的竞争手段。

所以，我们说各种不平等、各种固化使得社会活力逐渐降低，适度的社会流动性保证动态的公平，才能激发老百姓的积极性，实现长期经济增长，从而减少不平等，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相互促进。

为此，政府需要做什么？政府要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首先就是要保障机会公平，需要消除体制歧视，比如户籍改革、尽快消除二元体制、市场准入、职业限制、实现更公平的劳动力市场。全国统一的市场不仅是商品市场，更重要的全国统一的要素市场。

同时，真正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还要求考虑动态的机会公平，这要求政府公正有力，能科学合理决策，但这个把握度很困难，比如美国的平权法案保证大家有公平的权力，但保证过头也有问题。

在这其中，教育和健康平等至关重要。从国际经验来看，东亚奇迹的关键是教育水平的提高和教育平等，实现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健康和教育的均等化。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是日本的教育平等：日本尽量保持校际间不出现师资、设施设备上的差距，中小学生均经费地区间最大差距仅约2倍，学校设备全国统一标准，山区小学和东京的小学设备一样，另外，日本教育法规定一位教师在同一所学校连续工作不得超过5年，尽量消除机会的不平等。

另外，在提高社会流动性方面，社会组织也要承担起相关责任，社会文化要凝聚共识，增强社会公益组织的共识，要从“达则兼济天下”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接着扒，先阶段小结一下。基于上面的讨论和基本的人性  
可以得出：  
1、随着时间发展，现有资源配置策略不改变的前提下必然导致产出率越来越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俩词涵盖太广，这里不用)；  
  
2、资源配置策略的改变，(认为自己)资源份额减少者必然是不满的，天然带有抵触心理和对抗改变的动机。  
  
这两个结论，下面再就这两个结论展开讨论*

*追求小确幸/小小的幸福之类的，大概可以分为三种情况  
1、不想追求大的幸福(为什么不想)；  
2、没能力追求大的幸福（为什么没能力）；  
3、没机会追求大的幸福（为什么没机会）。  
  
当一个国家，追求小小的幸福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这个国家是幸还是不幸呢？*

*不强分什么有产无产阶级阶层，但有一条相对明晰的线是始终存在的，那就是是否能以较低风险较深入参与再生产，用直白草根的话来说就是衣食无忧的基础上有没有能力合法的坐地收钱（无论是钱生钱还是别人挣钱你来花）。*

*当前外储20万亿，国有资产超百万亿，净资产至少几十万亿，王八蛋，这么多钱被拿去贪污腐败贬值，这能忍啊，分了[怒了]  
  
苏联当时就是这么想的，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开始进行全面的改革，全面私有化，每人获得了相当于一万卢布的私有化凭证，当时可以买一辆汽车。[赚大了]  
  
然后呢？不到十年，财富聚集到几大寡头手中，私有化凭证全部成了废纸。[吐血]  
  
均田地，然后土地重新兼并，人人平等，总有人逐渐比他人更平等，就算大家一样穷，但总有那么一些人会从一个穷人变成财主，只要给他时间，他还是能成为老爷，你还是当你的长工。 [卖身]  
  
为什么？*

*一划线，简单明了。  
再细一点：  
线以上，能否制定或主导规则，也就是立法权和司法权，权力的权力。  
线以下，能否在一般情况个体正常存续，也就是先保证活得下去。  
怎么对号入座请随意。  
好了，讲个笑话，中产[干杯]  
  
四等种姓真是个伟大制度，比士农工商先进多了，可惜四大还是惯例有五个，多了个达利特[好失望]，还是四等人制实诚，说四等就四等，绝不抽冷子蹦个五等出来(五等死光了)[笑]。*

*莫迪搞那个货币改革，简单说就是政府抽冷子来次M0=0。  
  
如何理解印度政府于 2016 年 11 月 8 号突发声明作废 500 和 1000 面值的纸币？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2427312?rf=52429028](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2427312?rf=52429028" \o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2427312?rf=52429028" \t "https://xueqiu.com/5674464747/_blank)  
  
作者：Carl Zhao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2427312/answer/132369162](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2427312/answer/132369162" \o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2427312/answer/132369162" \t "https://xueqiu.com/5674464747/_blank)  
  
  
从两方面简单地说，是好事。  
  
一。印度经济完了  
  
二。给研究货币的经济学家们提供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定量研究现钞和经济关系，M0, M1, M2之间的关系。  
  
这些关系本来谁也说不清。你说中国的M2“高”了，难道你知道“正常”的M2应该是多少吗？你不知道"正常"的M2，你凭什么说M2“高”呢？经常有文章把我朝的M2跟美帝的比较。但是在金融制度天壤之别的两个经济体之间，仅仅是数值的比较毫无意义。  
  
经济学上你不可能像物理或者医药那样提供一个对照组，也不可能拿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国家的货币制度来开玩笑，所以你无法在论文说这样的话：“让我们假设M0=0（M0指现钞）的时候，M1的变化是什么，M2的变化是什么”，因为你永远无法知道M0=0的情况，直到 duang 一声，天降莫迪同学，为经济学家们出手了。  
  
现在大家很快可以知道M0=0的情况了。学经济的赶紧开始写论文吧，这个千载难逢的荣誉先到先得，不要让印度学者近水楼台先得月啊。  
  
如果我是经济学教授, 我会马上带领小组分散到印度各地, 实时记录考察新旧卢布的黑市兑换率, 记录旧卢布在交易中的折扣率等数据。这些实时数据的变化一定与经济发展，人口，政治甚至文化等因素相关，而单单是简单地记录这些相关性，混几篇顶级期刊论文不成问题。  
  
虽然以后可以通过访谈获取这些数据，但是再好的访谈也比不上一个事先就设计好的采样系统实时采样。设计巧妙科学合理的调查采样方法获取的数据远远比事后访谈得到的数据更加科学和完善。你想，世界上怎么会有国家和政府愿意跟你合作，突然宣布纸币作废，然后让你观察M0、M1、M2等数据在经济中的实时互动。这些互动数据一定能大大加深人类对经济学的更深入的理解。这种极其宝贵的数据以后出个诺贝尔经济学奖也说不定。天朝和美帝的经济学家们要抓住机遇啊。  
  
比如，我可以提一个观点：腐败程度高的地方旧币兑换率更高，也就是说民众损失更小。因为腐败程度高的地方，腐败分子从特殊渠道拿新币容易，相互竞争之下，当然旧币的兑换率高。反之亦然。如果在印度各地的实时采样数据与腐败指数之类的吻合，一篇好论文就出炉啦。而如果接下来莫迪开始打击腐败，并且造成旧币兑换率下降，那么这篇论文就不愁引用率啦。  
  
当安倍绞尽脑汁想把通货膨胀率推到1%的时候，莫迪的惊天一剑，直接给印度来个通货紧缩90%。现在的混乱还是货币银行学层次的, 接下来会发展到金融层次, 然后是经济层次, 再后扩散到政治层次的混乱. 大混乱会不会发展到文化历史层次呢? 暂时不知道.  
  
一国的币值是国家的根本。天朝从古到今都对币制非常小心。古代币制大约等于盐铁，后来约等于铜政。一国币制混乱，基本上离乱世也不远了。  
  
古代在币制上作死的例子有王莽同学。王莽在现代社会有了接班人莫迪。  
  
印度的腐败、黑市、偷税横行难道是因为现金吗？不是，是因为政治腐败，大家才用现金，而不是因为大家用现金才腐败。在政治腐败完全没有解决的迹象的时候，用任何商品交换媒介都不会对反腐有任何帮助。靠一个腐败的系统来执行"根除"腐败的脑洞想法, 印度真的很有创意.  
  
不作死就不会死。Word印度，我看好你！  
  
======================  
理想是好的，这事要搁吃瓜群众身上那是反他娘的节奏，然而实际情况是：  
  
======================  
  
作者：nine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2427312/answer/130590279](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2427312/answer/130590279" \o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2427312/answer/130590279" \t "https://xueqiu.com/5674464747/_blank)  
  
先谢过北京的dodo妞和她同事，为我们带了些美金来。  
银行还是排队，但是外国人是可以不用排队的。SBOI的NRI支行，是可以兑换美金的，打电话问了汇率很不错6600，但是周末不开门。吼吼吼。焦特布尔可以换钱点现在新钱6000，旧钱给到6600。城堡门票和不少住宿餐厅都可以刷卡，汇率给的不好，2000卢比，扣了30.89美金。但是能刷就好啦，进店先问能不能刷卡。有时候他们系统问题，赶上不能刷也没办法。  
据说大批新钱快来了。期待。不知道是不是正确，但是看着银行门口排长队的，真心不像洗钱的，都挺大众的，又着急又没办法的那批人。  
  
听说咱大中华换一版人民币要十年时间，这莫总带来的麻烦真挺烦的。但是听到挺多支持的，因为说巴基斯坦印假币，这是反恐的措施。听说咱大中华换一版人民币要十年时间，这莫总带来的麻烦真挺烦的。但是听到挺多支持的，因为说巴基斯坦印假币，这是反恐的措施。  
  
我们已度过难关，谢谢关心。   我们已度过难关，谢谢关心。  
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  
已经连续两天在汇丰atm没取到钱了。因为ATM里没有钞票了。  
  
在酒店老板那里换来张2000的，三天了花不出去，没人愿意找零钱给我。  
  
明天一早再去汇丰。祈祷能取到。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来印度旅行的国人，最近多带几张银联卡吧，大城市有汇丰的，可以汇丰取现，2000卢比每天每卡，汇率，扣了206人民币。atm要排队一会儿。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  
人在印度。一早醒来满脸懵。  
你想一下，你的支付宝不能用，钱包里的50/100都不能用，银行atm关门。每个人口袋里能有几张10块钱啊，印度还没有20的。折合人民币，我还有八张一块的，一张五块的，两张十块的。够吃早饭。午饭酒店签单，等过两天银行开门再取钱去还。  
街上兑换的店，如果要小面额，100美金还给你5000卢比，汇率今天是6700。  
能刷卡的地方太少了。好在泰姬陵可以网上买门票啦，1000卢比，不收500/1000的现金了。阿格拉堡去不成了，因为没有钱了，打车的钱都没有了$\_$  
但是印度政府的执行力，真是不可思议。说不用就不用了，一点预警都没有。银行说关门就关门。各个部门立刻执行，完全突击，完全没有缓冲。印度人也就安然接受。懵呆。  
  
第一天，走在街上小贩推销，我说我没有卢比，他说我也没有卢比，然后都大笑。换钱的地方，开始1000卢比可以换7张100的零钱。其实这件事情对本地人的生活，没大影响，银行开门之后，他们手里的卢比可以存进账户的。换钱的商家赚了一笔，但是做游客生意的，饭店纪念品店，都在骂政府，早上说没鸡蛋了，因为没小钱去买。苦了着急走的游客，手里现金花不出去，印度不允许带出国，只能七折换，换美金更便宜。问些本地人，有很开心说，可以换新钱啊！  
第二天，部分银行开门了，开始大排长队。街上的汇率也好点了。开始有炫耀自己取到新钱的三哥啦。很快就过去了。该过节过节，乐呵着呢。  
神奇的印度。  
  
  
======================  
  
你瞅瞅，四等种姓熏陶出来的人民就是行[很赞]，民心可用[心心]，万般苦楚，一笑置之，难怪甘地大大称他们为神之子民[大笑]，大写的服[加油]*

*拉马克相信这个世界是温柔的，所有活下来的努力会得到回报，所以世界把他狠狠嘲弄一番；[卖身]达尔文相信这个世界是冷酷的，只有生的对才能活得好，所以世界和他站在了一边[好失望]*

*以前的初中教科书，说西方那些工人，资本家给他们工资和福利，但他们还是无产者，因为只有生活资料，没有生产资料.....大意如此。当然这些“谬论”现在已经不会再教了。什么无产者[怒了]，人那是中产阶级，中产！小资！懂不！[不屑]  
  
不过，国外太远不说，国内现在《深圳两套房 面临失业中年财务危机引发家庭悲剧》《三套房，女儿白血病，募捐》之类的文章经常刷屏，专家大v一个词概括叫做“中产的焦虑”。[卖身]  
这样看来，钱跟钱，作为生产资料的钱，和作为生活资料的钱，似乎，或许，确实是不一样的？[可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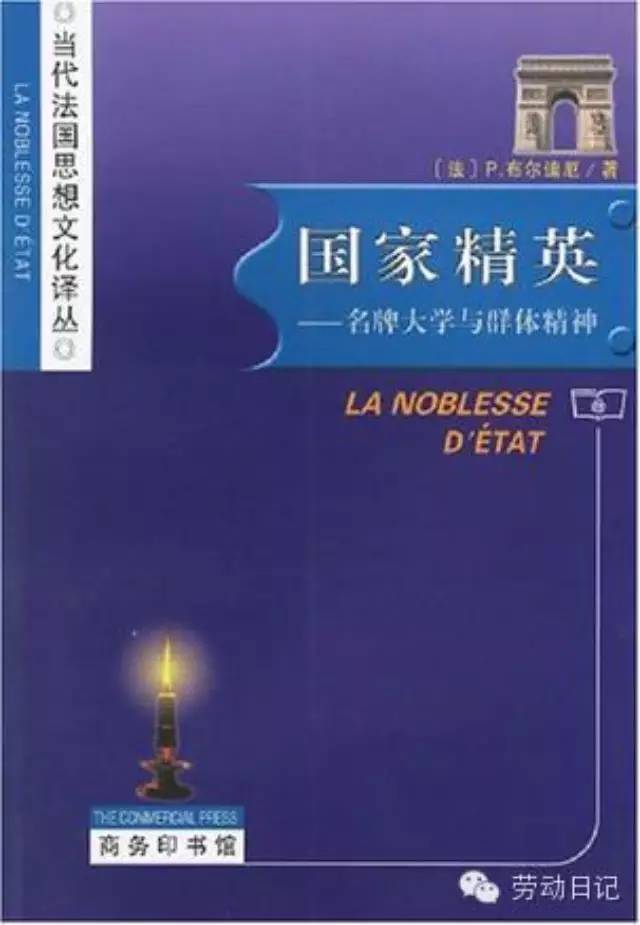
*吴重庆：如何研究“中国底层社会”？  
  
对转型期中国来说，底层社会尚处于不断被创制的过程之中。如果底层社会的向上流动不仅无法得到制度化的保障，而且还在市场化大潮的裹挟下不断被再生产出来，那么社会势必日益固化并失去弹性从而断裂与碎片化。  
  
文/吴重庆  
  
我所谓的“中国底层社会研究”意在引入一个观察转型期中国社会的视角，讨论转型期中国产生底层社会的机制。所以，与其说我关心什么是“中国底层社会”，不如说我更加关心中国底层社会的再生产过程。  
  
与何谓“底层”问题直接相关的是何以提出“底层”。“何谓‘底层’”与“何以提出‘底层’”事实上都是值得讨论的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底层”观，“底层”本身并非一个客观实体，“底层意识”可能是由精英建构出来的。印度“底层学派”曾经讨论“自主的底层意识存在与否”的问题，即“底层能说话吗”（Can the Subaltern Speak）？斯皮瓦克说，底层可以直接通过历史学家的书写发出声音的想法其实只是一个神话。  
  
在一般意义上，提出以及主张“底层”研究的人，程度不一地带有社会批判、文化批判乃至政治批判的倾向。这一批判的倾向既可以基于“左”也可以基于“右”的立场，既可以是出于对“普世”价值的关怀，也可以是出于对“多元”取向的标榜。  
  
安东尼奥·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提出“底层阶级”概念，用来表示意大利南部的作为从属阶级的农民问题，以及无产阶级领导的阶级联盟中的其他社会群体的“隐语”。他认为革命的知识分子必须是“有机知识分子”，必须重视农民的文化、信仰、实践活动以及政治潜力，以夺取资产阶级的文化霸权。所谓领导权的确立并非通过国家机器强行获得，而是必须建立于底层阶级认可的基础之上。  
  
直接借用葛兰西的“底层”概念并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开展底层研究的是一批印度学者，号称“底层学派”，他们包括拉纳吉特·古哈、帕萨·查特吉、斯皮瓦克等。他们于1982年创刊《底层研究》，关注南亚底层社会的历史、文化、生存状况和反抗斗争，致力于批判精英（殖民主义精英主义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精英主义），确立底层意识的自主性。  
  
印度“底层学派”与葛兰西提出“底层阶级”不同，葛兰西侧重于表示无产阶级领导的阶级联盟中社会构成的多样性，印度底层学派使用这个概念，除了表示印度社会构成的复杂多样性以外，更强调的是“底层性”作为所有下层社会群体的同一性。  
  
印度“底层学派”也与英国新社会史学家如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P.汤普逊、C.希尔等主张“自下而上”的史学观不同，他们认为，“自下而上的历史”依然被限制在给定的框架内，不过是使西方现代性的叙事更为详细、完整罢了，没有任何“自下而上的历史”能够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本身的存在、稳定或者说历史合法性提出挑战。印度的“底层研究”不应该重复“自下而上的历史”研究。  
  
而在中国，说到“底层社会”，虽然首先毫无疑义地是指“弱势群体”，但诉求各异。  
  
人类学家乔健先生在《底边阶级与边缘社会》一书的“绪论”里说，“底”指社会地位低下，处于社会底层；“边”指边缘，即在士、农、工、商四民之外，一般从事非生产性行业的群体。他们处于“礼法”的边缘，属于“化外之民”，并且“穷而无告”、“弱而无助”。他认为“‘底边社会’的特质近乎维克多·特纳说的Communita ，其特点是地位、等级、与财产的消失，同时呈现同质、平等、卑下与无私等特色。相对于主流社会严密的结构，它是一种反结构”。所以，他重视“底边社会”，主要还是出于人类学家历来对“社会连接”、“社会结构”问题的关注。  
  
社会学家郭于华著有《倾听底层》一书，她主要关注底层对苦难的讲述。她认为革命以及以革命运动形式推进的社会工程和社会试验给底层民众带来新的苦难。“底层的表述蕴含着巨大的能量，而关键在于苦难若能进入历史（被讲述和被记录），苦难就有了力量”，一种颠覆和重构的力量。“诉苦”曾经是一种革命动员的方式，今天却可能是革命解构的方式。  
  
政治学者于建嵘的文集《底层立场》中承认“底层政治”具有自身的内在逻辑，不过基本上是将“底层社会”纳入“公民社会”的框架，认为“社会底层群体所进行的政治抗争表现为在国家政权主导下，利用公民社会的力量，试图谋求某些具体的利益”。  
  
我所谓的“中国底层社会研究”并没有颠覆精英史观的兴趣，同时我并非以“底层”解构革命而是从底层视角出发理解革命及底层行为的复杂性，也无意于以“底层”突出维权抗争、催生“公民社会”。我只是选择“市场化”这一特定的视角，观察近代以来中国产生底层社会的机制。这样一种观察角度自然有可能将一些因为极端灾害性气候导致的饥民、流民----这些本属于“底层社会”的人群遗漏掉。对此，我也只能以“底层总是被建构的”自慰。  
  
一般来说，传统中国社会的稳定得益于以家户为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兼业是小农经济的重要特征，“男耕女织”是具有兼业特征的小农经济的类型化表述。在近代中国遭受西方一系列侵入与冲击的过程中，洋纱洋布大举低价倾销中国，大概是对中国小农经济的解体构成最具象征意义的事件。洋布以低价格及低关税迅速打败中国的土布，导致耕织解体，农民的日常生产与生活不得不与市场日益相连，即日益货币化，因此导致小农经济的解体。其结果是农民不得不到城市里纯粹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计，成为城市苦力，沦为生活无稳定依靠的“底层”，其中码头工人、人力车夫乃典型代表。据三十年代北平社会调查所完成的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数据，当时单上海人力车夫就有50万人之多。值得一提的是，裴宜理在《上海罢工》一书中说，“人力车夫并未成为以发动工人运动为己任之政党的主要依靠”，“他们是工人阶级中最不易罢工的分子”，“上海为数庞大的人力车夫不与任何一方打交道。在车主和承包商的控制下，人力车夫几乎不可能起来反抗他们的雇主”。显然，如果我们真能触及底层的生存境况，便可获得底层视角，此一视角是异于无产阶级政党政治视角的，即并非“越穷越革命”。  
  
近代以来，中国农耕经济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日益并轨，小农经济日益破产，大批农民在生存的底线上挣扎。这也是我们了解中国革命得以发生的最重要的背景。詹姆斯.C.斯科特在 《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 中说，“有些地区农村人口的境况，就像一个人长久地齐脖深的河水中，只要一阵细浪涌来，就会陷入灭顶之灾”。贫困的农民信奉并践行生存伦理与道义经济，在“民不聊生”之际，只能“揭竿而起”。黄宗智先生在论及“阶级斗争”作为中国革命的动员手段时，曾区分过“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即革命动员过程中所呈现所表达出来的阶级矛盾程度远高于革命时期中国农村实际上存在的阶级矛盾的程度。其实，如果我们从底层的生存伦理与道义经济的角度看，在同等剥削量的情况下，不同生存境遇的人对剥削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即使革命时期中国农村的阶级矛盾程度及地主对农民的绝对剥削量即阶级斗争的“客观性现实”并没有达到足以发生革命的地步，但是，如果广大农民已经在生存的底线上挣扎，那么，即使是轻度的剥削，也会激起底层的强烈反弹。阶级斗争的“表达性现实”也许是对阶级斗争的“客观性现实”在剥削量上的夸大，但却是符合于底层对阶级剥削的实际感受的。在此，的确又是“越穷越革命”。  
  
1949年之后，剥削阶级被消灭，社会各阶层的贫富差距急剧缩小。尽管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低下，甚至还发生过大饥荒，但政治地位及生产资料占有意义上的底层已不复存在。1978年之后，市场化的改革与“弱势群体”的创制相伴而行。农民固然可以在城乡间自由流动，但也只能在城市里靠出卖劳动力维生。城乡二元体制、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脱节，使“农民工”难以实现市民化。他们日渐年老后失去了被企业招聘的机会，同时不被城市接纳，尤其是第二代农民工，他们也不愿意回到家乡，这样便只能寄居于城市，他们或自雇劳动，或以非正规就业的方式从事非正规经济活动，成为城市的底层。而九十年代开启的国有企业改制浪潮，使5000万左右的国有企业工人下岗，这批人较少成功再就业，大多成为新的社会底层。为数众多的下岗工人并没有导致激烈的社会动荡----所谓“集体无行动”，那是因为他们为了生存而选择了非利益最大化的权宜取向。再看至今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的农民，由于资本开始下乡，农民已经不可能像小农经济时代那样在生产的每一环节都可以获得微薄的利润。农民不仅在流通方面，而且在生产诸环节都失去了主动性，如种子、农药、化肥逐渐被跨国生产商操控。这很像工厂流水线上的“打工”者，被切割压缩到了细小的生产环节上，只能靠出卖劳动力维生。这样的农村好像“代工厂”的生产空间，这样的农民可谓“打农”，也成为新的社会底层。而他们之所以还愿意从事并非有利可图的农业劳动，那是因为农户在考虑“经济利益”的时候，与以个人为单位的角度不一样，农户以家庭为单位，考虑的不是个人的眼前收益，而是整个家庭的可持续生计。  
  
对转型期中国来说，底层社会尚处于不断被创制的过程之中。如果底层社会的向上流动不仅无法得到制度化的保障，而且还在市场化大潮的裹挟下不断被再生产出来，那么社会势必日益固化并失去弹性从而断裂与碎片化。所以，研究中国底层社会，不仅仅是历史学的科目，也是社会学、政治学的任务。作为历史学的底层研究，可以发挥颠覆精英史观的功能。作为社会学、政治学的底层研究，虽然我主张从“市场化”视角观察底层的再生产机制，但如果能够看到底层的行为逻辑，包括生存理性、道义经济、底层政治的意识形态，其实也可以发挥对一些主流学术话语过度扩张的纠偏作用，包括市场、效率、理性、发展主义、个体化的维权等。这样的底层社会研究，或许将有益于当代中国的社会建设与可持续发展。  
  
(本文刊于《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选入作者《无主题熟人社会及社会重建》一书。吴重庆，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 想象法学148期 | 朱国华 | 布迪厄：文化与权力

## 朱国华 | 布迪厄：文化与权力

编辑来源 2016-01-01 劳动日记

编者按：不同类的人群，其文化品位被区隔开来；精英们的品位，被精英们刻意的包装并且提升为雅调调，而其他的调调都是下里巴人，这点连低下阶层的反抗者自身都被调调论掩埋，以趋同于高雅的调调为美；所以，一旦咸鱼翻身，都喜欢充扮鱼刺；明明瞌睡的要命，还是要熏陶自己的音乐细胞。连老炮儿六爷，也必须在面对BOSS的时候，穿上大院子弟的军大衣，手提大院子弟的军刀，这是一种品位的瞬间提升，源于自卑；还是说，权力意志可以替换一切，保留了弱者最后的权力——暴力反抗权，从而为低下阶层的喘息提供一种出口？



（布迪厄著作《国家精英》）

简介【详细见文后】

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又译为布丢），法国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1981年进入著名的法兰西学院执掌社会学教席成为他学术生涯的巅峰，其在国际上获得的殊荣更是不胜枚举，2000年英国皇家学院颁发给他的赫胥黎奖章，代表了国际人类学界的最高荣誉。

**一、布迪厄是谁？**   
  
　　一个哲学家？不错，他早年就在哲学家高歇的指导下完成过一篇讨论莱布尼兹的论文，他还出版过《1945年以来法国的社会学与哲学》、《马丁·海德格尔的政治本体论》这样的专著，实际上再也没有什么比他晦涩难懂的哲学术语、冗长句子更能说明他的哲学倾向了；但是我们也可以以同样的理由说他是个人类学家，他的《实践理论大纲》和《实践的逻辑》已经成为人类学的经典；可以说他是个教育学家，他在英语世界获得的最初的声誉，来源之一就是他在《教育、社会和文化的再生产》中对于教育体制保守功能的批判；可以说他是个语言学家，他的《语言与符号权力》在语言学界被广泛征引；可以说他是个文艺理论家或者美学家，他的煌煌巨著《区隔：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艺术的法则》和论文集《文化生产场：论艺术和文学》在某种程度上摧毁了康德以来的一些我们视为常识的一些文学、美学观念……类似的头衔还可以继续列举下去。   
  
　　当然，无论是普通学人还是布迪厄本人，都把他定位一个社会学家，但是，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布迪厄已经使社会学的含义发生了变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一个社会学的社会学家。   
  
　　换句话说，他已经几乎将社会学等同于普遍性的社会科学，等同于一种元科学。既然如此百科全书，他为什么直到世纪之交，在汉语学界才开始显山露水？实际上他即使在英语世界，其名声也是姗姗来迟。何以会如此呢？但是且慢，我们先来看看他的学术生涯。

**二、外省的陌生人**   
  
　　海涅曾经说康德没有历史，意思是说他的个人生平平淡无奇。这样的话用在布迪厄身上不知是否同样适当。布迪厄对于他自己的个人生活是非常吝于笔墨的。我们知道，他1930年出生于法国西南部的一座小城镇，Deguin，这地方小到法汉大辞典上查不到。他父亲是个名不见经传的乡村邮递员。操着一口家乡方言，完全依靠自己的个人奋斗，1951年，布迪厄得以进入著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很难设想别的学校能够象她一样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向世人贡献这么多的学术巨匠：涂尔干，阿尔都塞，柏格森，列维- 斯特劳斯，梅洛- 庞蒂，萨特，阿隆，福科是早他三年的学兄，德里达是比他低一届的学弟，而著名历史学家拉杜里和叙事理论家热奈特是他的同学。当年弗洛伊德曾经崇拜汉尼拔，因为汉尼拔作为迦太基人永远挑战罗马的雄心，正好与弗氏作为犹太人挑战西方主流观念的理想遥相呼应。布迪厄尽管就读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尽管在1981年入选为法兰西学院唯一的社会学院士，尽管在1993年他获得了CNRS金质奖这一殊荣（此前仅有列维- 斯特劳斯在1968年获得过），尽管他在国际学术界声誉日隆，如日中天（1989年的调查表明，他在英语文献中的引用率在法国思想家中仅次于福科，而列维- 斯特劳斯、德里达、阿尔都塞、萨特、拉康、波德里亚分别排名为3 、4 、5 、6 、9 、10），从而达到了公认的学术金字塔的顶峰，但是，他从来没有忘记过他的社会出生和外省背景，并且将这种边缘意识转化为对于任何主流话语的拒斥：他把自己的任务界定为反对一切符号统治，反对任何合法形式的不平等。在学术姿态和政治立场上，他总几乎是刻意的保持与主流话语的距离。斯大林主义盛行的时候，他与德里达等人组织自由委员会；他参加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小组，但是从未成为其信徒；7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在广受攻击的时候，他却大量的引述马克思的诸多观点。布迪厄很少参加法国知识分子热衷的签名活动，而1968年的5 月风暴对他来说只不过是一场毫无政治效果的“符号暴动”。布迪厄曾经对知识分子有一个著名说法：它既反对X ，也反对非X.这话用在他自己身上最合适。有人认为他代表着左派所放弃的一切，甚至说他利用世界的苦难来扩大自己的影响，但又有人形容他是“左翼强硬派社会批判家里健在的老前辈”。事实上正因为他的低调，因为他思想上不象德里达等人那样走偏锋，因为他一如既往地以陌生人的视点来观看社会世界，所以他才由于学术上不时髦而不为人知，但也会比之许多耀眼一时的学术明星获得更为经久和更为雄厚的学术资本。

**三、区隔：趣味分野与社会等级**

　仅仅是从1958年到 1995年，布迪厄就共发表了30本以上的专著和340 多篇论文，他涉猎的范围如此之广，探讨的内容如此复杂，在一篇几千字的短文中确实是不能达到其万一的。如果我们暂时不去关注他在超越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理论研究与实证调查方面在方法论上的贡献，而只是把目光投向与我们的社会现实距离更近的文化和权力的领域，我们也许可以从他的《区隔》一书说起。

　　在这本600 余页、附有大量图表的著作中，布迪厄首先把矛头对准了康德。康德的形式主义 美学暗示，艺术天才乃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个人天赋，但是布迪厄的调查却表明，一切文化实践中存在的趣味，实际上与教育水平和社会出身（主要是指父亲的职业）两大因素相关。有什么样的文化消费者的社会等级，就有什么样的艺术消费等级。参观展览馆，听音乐会，阅读普通人不堪卒读的乔伊斯，这是上层阶级通常具有的品味，至于无产阶级，因为缺乏将其中隐含的代码加以解码的能力，对那些合法艺术品只能望洋兴叹，并自甘愚笨。康德强调的纯粹美学容易让人们相信，我们与艺术品的遭遇是一种一见钟情，因此让我们忘记了有些人得以钟情而更多的人无动于衷这背后的社会条件。审美无功利关系的纯粹性使人们忽视，只有少数人，才能够掌握编码艺术品的代码，而这些人不是因为他们比别人天资更为聪颖，只是因为他们拥有的经济资本或由此转化而来的文化资本使他们可以接受较好的高等教育，可以摆脱生活的直接性和必要性。

**四、区隔：纯粹凝视与功能满足**   
  
　　到现在为止，我们似乎还没有觉得有多新鲜。因为鲁迅就曾经说过北京捡煤渣的老太太不会欣赏林妹妹之类的话，问题是布迪厄不仅仅止步于对于艺术的消费，而且把这个问题推进到了人类的所有的文化实践领域。“美学”这个概念在其字源学上本来应该是“感性学”，在康德、黑格尔那里，几乎已经简化成了自然美学或者艺术哲学。布迪厄认为，只有把对于狭义的高级的“文化”的趣味，也就是对于合法文化（艺术、哲学、科学等等）的趣味，与一般认为形而下的、粗俗的文化经验（餐饮、美容、装修、摄影等等日常实践）的趣味结合起来，才能真正了解文化实践的意义。   
  
　　由于艺术自主性场域的形成，纯粹美学带来的纯粹的凝视，作为历史的发明，不仅仅成为文化生产场的基本信念，而且，还带来了一种向文化生活各个领域强加以自己逻辑的美学性情，其基本特征就是强调形式高于功能，强调表征模式高于表征对象。统治阶级就餐的时候考虑的是餐饮行为的形式维度：灯光、音乐、服务、排场、菜肴的色香味，而下层百姓考虑的不是怎么吃，而是吃什么，是鱼还是熊掌，是青菜还是萝卜，以及吃得是否经济实惠等等；精英阶层欣赏的作品注意的是叙事技巧，是作品描述了什么，而工人阶级渴望的却是在作品中的一种感情投入，一种道德感的满足。   
  
  
**五、区隔：自由趣味与必然趣味**   
  
　　最后，由于纯粹的凝视的合法性和神圣性，没有什么被凝视的对象是不美的了。我们都可能知道罗丹的那句广为引用的名言：世上没有不美的事物，只是缺乏审美的眼睛。我们大多数人可能会误读为，我们必须在日常生活中捕捉稍纵即逝的美的事物。但是纯粹美学的意思却可能是：一切事物，特别是被认为粗俗的、淫荡的、卑下的、低级的事物都有可能转化为美。假如我们观照事物的方式是纯粹的，那么就没有什么对象是可能不美的，无论是杜香的尿壶还是行为艺术家在艺术展览馆门口吹涨的避孕套。同样，表征的道德，艺术的道德，或者说审美性情的道德，指向一种伦理学的价值中立或者说道德虚无主义，并且在事实上常常与日常生活的道德格格不入。布迪厄在这本书的引言中引用了一段艺术家的话：“给我最大触动的是这一点：在我们的首演舞台上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是淫秽的；歌剧中的芭蕾舞女，即使是裸体的舞者、仙女、小妖精或女祭师，都保持了一种不可亵渎的纯洁性。”这样，统治阶级通过以风格化的形式来否定功能和内容，通过类似于圣餐变体论的自我神化，使自己将肤浅快感提升为纯粹快感，从而在文化实践和日常实践中获得了一种特权，一种摆脱任何低级趣味可能性的绝对自由。   
  
　　形式与功能的对立对应着自由的趣味与必然的趣味之间的对立。前者通过对后者的排斥将自身合法化，并将隐含的阶级对立转化成为一种被工人阶级或被支配阶级认同的文化趣味的区隔，这样，文化的区隔便充当着将社会阶级的区隔加以合法化的功能，文化实践一方面调节了诸阶层之间的对立关系，另一方面又掩饰着社会不平等的事实。

**六、文化与符号暴力**   
  
　　由上文可见，在布迪厄看来，文化趣味的区隔（高雅/ 通俗，形式/ 功能，深刻/ 肤浅，尊贵/卑下，体面/粗鲁等等）实际上反映了一种**权力关系**。正如一位学人指出的那样，布迪厄在文化领域试图做的正是马克思在经济领域已经从事的任务：揭示文化生活中的权力动力学和基本结构。布迪厄之所以把注意力集中在文化实践上，不仅仅是因为他反对庸俗社会学把一切问题化约为物质基础或经济因素的决定力量，从而忽视文化的相对自主性；也不仅仅是因为当代社会高等教育的日益大众化和文化市场的急剧增长使得文化现象越来越具有了突出的意义；还因为文化关系涉及到布迪厄最为关心的一个疑问：即是**为什么触目皆是的社会不平等为什么没有遭到强有力的反抗？**在布迪厄看来，这是因为统治阶级改变了统治策略，他们不再进行粗暴愚蠢的身体强制，而是改变成了温和得多的控制形式即文化实践形式。简单的说，他们的统治变成了多少类似于催眠术的符号统治，在此统治下，被支配阶级和统治阶级达成了共识，准确的说，就是被支配者接受了支配者的理念，并将这些理念误识为正确的、因而自己应当遵守的理念，而意识不到支配者对自己的符号支配。这种权力形式布迪厄称之为符号暴力。举例来说，贞操观即是男性权力强加在女性身上的符号权力，男人出于对于女性处女情结的病态爱好，将它塑造成女性纯洁之美的一个根本特性，并将此观念强加在女性的灵魂深处，使女性把对于贞操的保护变成一种自己的主动追求，不少少女为了保住所谓纯洁不惜跳楼自杀，而事后诸媒体对她刚烈贞节的赞美，则强化了男性权力对于广大女性的符号统治。布迪厄认为，文化资源、文化体制或文化实践则是将此类统治合法化的主要工具，至于教育系统，则强化了对此社会不平等关系的再生产。

**七、资本、习性与社会阶级**   
  
　　布迪厄的符号权力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为了避免空疏，布迪厄不是从本质主义的观点来看权力，而是从关系主义的观点来看待权力。具体地说，权力的大小相对于拥有的资本的数量和结构而发生变化，由此他可以将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结合起来。资本作为积累的劳动，在布迪厄的概念系统里已经失去了马克思的剥削的涵义。布迪厄提到了三种主要资本形式，即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又把此三者的合法形式称之为符号资本，比如经济资本的合法形式之一就是信誉。但是其中他比较独辟蹊径、运用得比较得心应手并且发生广泛影响的是他的文化资本的理论。 布迪厄理解的社会世界与资本有着直接的本质的联系。实际上划分阶级的依据是根据每个行动者所拥有的资本的总量。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是两种最主要的资本类型。   
  
　　拥有非常多的资本的人，例如大企业主，银行家，工业巨头，高级专职人员，教授，艺术家，就构成了统治阶级，而拥有较少资本的人，例如体力劳动者、工匠、小学教师，即是被统治阶级。文化资本尽管有相对自主性，但是它来源于经济资本，因此也在总的原则上受制于经济资本。所以，知识分子拥有较多的文化资本和较少的经济资本，它就变成了统治阶级中的被统治阶级。每个行动者所占有的资本决定了他/ 她在社会空间中所占据的位置，而这一位置又塑造了他/ 她的习性，习性就是一套性情系统，对于外部世界的判断图式和感知图式，当然也包含我们上文提到的趣味。习性来源于早年的生活经验，并得到教育系统的强化或者调节，最后，习性与一个行动者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存在着互动关系：习性决定了行动者的社会位置感，另一方面，行动者的位置又不断塑造着习性。上层社会钟情是清淡、精致的食品，有的人身居高位，但是仍然喜欢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说明了他们不能摆脱童年贫困生活对自己的历史纠缠。最近出版了一本划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书，据说是按照收入来划分的。按照布迪厄的说法，收入是重要的，但是并不是决定阶级分层的唯一要素，因为它忽视了文化习性的重要意义。对于十个手指戴满戒指，手指中还有未洗净指垢的暴发户，上层社会并不竭诚欢迎他的加盟。暴发户的策略是通过给后代提供最好的教育机会，将经济资本的一部分转换成文化资本，从而抬升其文化习性。

**八、文化生产场的发生与结构**   
  
　　把文化加以资本化，首先是对于文化卡理斯马意识形态的去魅。哥白尼说地球不是宇宙中心，达尔文说人是从猴子变来的，弗洛伊德说人的潜意识特别是性意识对生活起着决定性作用，这样人的自尊心只剩下了尼采为我们保留的艺术或者文化了。我们本能的拒绝对于艺术、文化加以经济学或者社会学的解释，因为人类文化的崇高和圣洁似乎是证明人类仍然是高等动物的唯一证据。   
  
　　但是布迪厄认为，文化实践同样为个人或者群体的利益所驱动，文化的生产、消费、传播、积累、继承等诸环节，与其他事物一样，也可以依照一种实践的符号经济学来加以研究。布迪厄并不否认文化产品的独立价值，但是他坚持，只有把文化产品置于特定的社会空间特别是文化生产场中，其独创性才能得到更为充分的解释。   
  
　　布迪厄以文学艺术场为例分析了文化生产场。场域并非古已有之，而是随着社会的结构与功能的分化，现代社会特有的一种现象。传统社会权力作用在无中介的主体之间，而现代社会则借助于资本的不平等分布通过非个人的社会结构或体制发挥作用。文学场是历史的发明，其标志是文学自主性即“为艺术而艺术”观念的确立。以前人们认为“文以载道”或者“美是道德的象征”这一类观念是天然合法的，可是波德莱尔这些人却强调文学应当反抗政治、经济和道德等对文学的支配，强调文学除了自身之外没有任何别的目的。文学场是围绕着对于文学的幻觉而被组织起来的。相对于日常世界，它是个颠倒的体系：其特征就是它遵循“输家即是赢家”的游戏规则。政治权力、经济资本、道德声誉等等，在文学场只有相反的作用。在结构上文学场有两极：一极是“为了生产的生产”，作家们创作作品只是为了给同行看，因为曲高和寡，别人也一时看不懂，这当然在经济上就容易陷入窘境，但是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却能在未来获得较多的经济收益，因为以后成了名著必然会畅销；另一极是“为了受众的生产”，那些作家为了迎合受众的口味而创作，这主要就是畅销书作家，当然，这些作品会迅速获得市场效应，同时不久也会被别的畅销书取代。前者在文学场上由于具有较多的文学资本，因而据支配地位；后者只是具有较多经济资本，因而只能处于从属地位。

**九、文化生产场的斗争逻辑**   
  
　　文学场始终处于永动不居的斗争之中。就内部斗争而言，存在着已经获得经典地位的作家与希望获得统治地位的新兴作家之间的符号斗争。布迪厄借用韦伯的术语分别把他们分为牧师和先知两类作家。牧师要捍卫正统，而先知则通过预言未来要推翻经典作家的统治。斗争的目的在于获得更多的文学资本，从而获得垄断文学合法定义的权力。新生代作家一个经常采用的策略是以宣称回归到文学的本源的名义，以新的文学命名活动来废除当下文学观念的合法性，并增加自己的符号筹码。   
  
　　比方创造社成立之初就是提出“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挑战文学研究会的权威，并制造了新的文学景观。 外部斗争则似乎是布迪厄关心的主要方面。这就是居于从属位置的作家挪用 外部资源来调节内部斗争。那些拥有广大读者、拥有较多经济资本的作家，不甘心在文学场上处于被支配位置，他们通过将自己的作品改变成电影、电视，通过广播、报纸、电视台等大众媒介的活动，将自己的得之于文学的经济资本转换成另一种符号资本，并向文学场施加压力，使得文学场屈从于外部的文学标准。金庸在当代语境的经典化历程，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证。   
  
　　文学场在权力场中仍然居于从属地位，它的自主性表现在当别的决定要素试图将自己的逻辑强加到文学场内部时，必须要按照文学场的游戏规则加以变形。金庸的经典化，不是因为他较高的政治地位或政治影响，也不是因为他拥有巨大的经济财富，而是因为有不少著名学人撰文颂扬他带来了一场文学革命，因为北京大学授予的名誉教授给他带来的符号资本，因为他被选入种种排名或文学选集使他进入了文学的历史。文学艺术体制向经济资本的俯首称臣，这一现象不仅仅于中国为然，好像在当今世界也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事实。对此布迪厄在许多书中，特别被翻译成中文的《自由交流》和《关于电视》中有详细的论述。

**十、并非结论的结束语**   
  
　　和所有的大师一样，布迪厄的文化理论远不是无懈可击的。布迪厄在研究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区隔的时候，尽管扮演成一个比较客观的、价值中立的分析者的形象，但当他强调精英文化对于大众文化的优势的时候，他主要批判的事实是，文化资本的不平等分布使得广大被统治阶级被剥夺了接受精英文化的机会，在批判的同时他不知不觉的暗自同意了资产阶级精英文化是合法文化这一信念。对于芸芸大众在观看情感悲喜剧的电视连续剧时抹眼泪，布迪厄不屑一顾。他一方面说到文化的任意性，文学艺术并没有属于她自身的固有本质，但是另一方面明显地又同意精英文化把大众文化区隔为低劣的逻辑，对于受众在观赏文学艺术所投入的感情深度予以符号排斥。布迪厄也看不到大众文化对于精英文化的抵抗，关于这一点，我们读读巴赫金、德塞特或者费斯克会不无裨益。布迪厄的文化社会学虽然口口声声强调文化的相对自主性，但是在实际研究中，他却既不尊重文化的历史性，又忽视文学艺术本身的塑造力量。文化历史性与文化任意性这两者之间的悖论式张力并没有得到布迪厄很好的解决。这方面彼得·彼格尔对他的批评仍然不容轻轻放过。布迪厄将自己的任务界定为反对形形色色的不平等和符号控制，因此将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放在了突出的位置。他认为知识分子在统治阶级中被统治的位置，与工人阶级等被支配阶级存在着结构上的对应，因此知识分子应当可以成为下层人民的代言人。但是他没有说明下层人民接受知识分子教育的现实途径。   
  
　　实际上，布迪厄本人艰深晦涩的文字足以将一般学人拒之门外，更遑论普通劳苦大众了。这就有理由怀疑他的理论规划还没有超越乌托邦冲动的层面。而且，结构上的对应既不能说明知识分子的确已经了解了工人阶级，也不能说明工人阶级渴望了解他们的代言人说了一些什么。 布迪厄正在越来越深的进入汉语学术界。借鉴、应用布迪厄的理论资源的学人有逐年递增的趋势。布迪厄已经有《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自由交流》、《关于电视》、《实践与反思》、《艺术的法则》五部著作被译成中文，据称，今年商务印书馆将有包括《区隔》的四部布迪厄的译著问世，这显然是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不过，需要警惕的是，布迪厄论述的一些文化理论主要是基于发达国家的现实。他不能摆脱一个欧洲的白种男人固有的局限。要避免将他的理论资源非法挪用，必须根据中国的具体语境加以修改。比如说，他的阶级分类许多具体方面在中国就绝对无效。他认为大学教授是统治阶级，小学教师是被统治阶级，在中国，许多大学教师的经济收入比一些著名的中小学教师就要相差甚远。再比如说，他的场域理论与文化自主性的理论，应用于向现代性迈进的中国，必须非常小心。但无论如何，布迪厄这位以后卫姿态出现的先锋派思想家必然会开拓我们的视野，丰富我们的学术资源，这一点似乎是毫无疑义的。

# 皮埃尔·布迪厄



皮埃尔·布迪厄

　　皮埃尔·布迪厄（法文：Pierre Bourdieu，1930年8月1日—2002年1月23日），法国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哲学家。1930年生于法国南部比利牛斯-大西洋省，2002年因癌症死于巴黎，享年71岁。

## **皮埃尔·布迪厄简介**

　　皮埃尔·布迪厄（1930年8月1日－2002年1月23日），法国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哲学家。[英国卫报评价他为“许多人心目中的当代知名学者”，一位可与傅柯、巴特、拉岗等人齐名的思想家。国际社会学协会将他的著作《区隔：品味判断的社会批判》评定为20世纪最重要的十部社会学著作之一。布迪厄并不是一个出世的学者。承左拉和萨特的衣钵，他积极投身社会活动，招来不少争议。　　布迪厄开创了许多调查架构和术语，如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和象征资本（symbolic capital），以及惯习（habitus）、场域（field）或位置、以及象征暴力（symbolic violence）等概念，以揭示在社会生活中的动态权力关系。他的作品强调实践（practice）与体现（embodiment）在社会动态和世界观的建构所扮演的角色或其型态，经常处在反对普世化的西方哲学传统的立场。他的理论基础建立在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莫里斯·梅洛-庞蒂、埃德蒙德·胡塞尔、刚居朗（ Georges Canguilhem）、卡尔·马克思、加斯东·巴舍拉、马克斯·韦伯、艾弥尔·涂尔干、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以及牟斯（Marcel Mauss）。值得一提的是布莱兹·帕斯卡对他的影响，布迪厄将他的讨论群命名为“帕斯卡学派沉思者”（Pascalian Meditations）。　　布迪厄拒斥由尚-保罗·沙特所体现的知识分子“先知”或“全能知识分子”的这个概念。他最著名的书是《区隔：品味判断的社会批判》（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他认为，品味判断关连到社会地位。他结合了社会理论以及来自调查研究、照片与访谈的资料，来提出这个论点，试图调和若干知识难题，例如如何在客观结构之内理解主体。在这个过程中，他试图调和外部社会结构与主观经验对个体的影响。

## **皮埃尔·布迪厄生平**

　　皮埃尔·布迪厄1930年生于法国南部比利牛斯-大西洋省的小城 Denguin ，父亲是邮差（后成为地方邮局主管）；家中使用的语言是Gascon语。1962年布迪厄和 Marie-Claire Brizard 结婚，婚后生下三儿子：Jér·me Bourdieu，艾曼纽埃尔·布迪厄（Emmanuel Bourdieu）跟 Laurent Bourdieu。



皮埃尔·布迪厄画像

　　皮埃尔·布迪厄在小城 Pau 的“路易巴图”中学（le lycée Louis Barthou）就读，其中一位老师认为他资质优异，建议他转去巴黎的“伟大的路易”中学（le lycée Louis-le-Grand）就读，时为1948年。 皮埃尔·布迪厄后来进入法国高等师范学院（·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ENS)）。1954年通过哲学教师会考，同一年法国高等师范学院通过的学生还包括有未来的大哲学家雅克·德里达、未来的知名历史学家 Emmanuel Le Roy Ladurie。在法国高等师范学院就读期间，他避开当时蔚为主流的存在主义，反而跟随路易·皮埃尔·阿尔都塞、Gaston Bachelard 和 Georges Canguilhem 这几位哲学家学习逻辑学跟科学哲学，选修 ·ric Weil 教授的黑格尔的法哲学。1953年皮埃尔·布迪厄完成一份硕士论文，谈论莱布尼兹的 Animadversiones（Leibnitii animadversiones in partem generalem principiorum Cartesianorum）。　　1954年至1955年一段很短的时间，布迪厄在“木蓝”中学（le lycée de Moulins）任教。1955年被国防部征召，在凡尔赛服役。很快地他被派到阿尔及利亚服兵役，为时两年。1958年至1960年他转至阿尔及利亚的首都阿尔及尔大学的文学院教授哲学。1960年他返回法国，先在索邦大学任助理，然后转至里耳的里耳大学担任讲师教授社会学，直至1964年。他同时跑去巴黎的东方语言学院（l‘é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加强他的阿拉伯文，这是他在阿尔及利亚已开始接触的语言。1964年之后，布迪厄接掌高等研究实用学院（·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tudes）(1975年起改名社会科学高等学院)第六部门的研究主任。从1968年起，接掌由雷蒙·阿隆创立的欧洲社会学研究中心（Centre de Sociologie Européenne），他担任这个职位直到逝世为止。从1981年起，布迪厄担任法兰西公学院第六部门的社会学主任(先前担任这个职位者有雷蒙·阿隆与 Maurice Halbwachs)。　　在1958到1962 年的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布迪厄从事对柏柏尔人的一个支系卡拜尔人（ Kabyle people）的民族志研究，这树立他在人类学的名气。研究成果就是他的第一本书《对于阿尔及利亚人的社会学研究》（Sociologie de L'Algerie，英文书名 The Algerians），这在法国一出版就声名大噪，并于1962年于美国出版。　　1964年，布迪厄成为午夜出版社（Editions de Minuit）“常识”（Le Sens commun）系列的主编，他的大部分书籍都在此系列中出版。直到1992年，布迪厄更换出版商，改由门槛出版社（Editions du Seuil）出版他的著作。1975年布迪厄连同费尔南·布劳岱尔及他在欧洲社会学研究中心的研究群，成立学术刊物《社会科学的研究行动》（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他自任总编辑直至去世为止。《社会科学的研究行动》主要刊登他与门徒的研究论文，主要寻求转变既有的社会学知识生产的教条，并壮大社会学的学科气势。　　因应1995年11月跟12月的大罢工社会运动，布迪厄创立行动动机出版社（Raisons d'agir），多半出版年轻学者的作品，编辑方针是批判新自由主义。　　1993年，布迪厄荣获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所颁发的“全国科学研究中心奖章”（“Médaille d'or du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1996年，他荣获柏克莱加州大学的高夫曼奖（Goffman Prize），并于 2001年获颁不列颠暨爱尔兰皇家人类学会（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的赫胥黎奖章（Huxley Medal）。布迪厄于2002年因癌症逝世，享年71岁。

## **影响**

　布迪厄的作品受到许多传统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影响，他将它们整合到自己的理论之中。从韦伯那里，他继续关注社会生活中宰制和象征体系的重要性，以及社会秩序的概念，这最终由布迪厄转变成一套场域理论。　　从卡尔马克思那里，除了其他洞察以外，他得到一种对“社会”的理解方式，将社会视为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存在于社会生活之中的东西就是关系----这不是介于能动者之间的互动，也不是个体之间的关系，而是客观的关系，它的存在’独立于个体的意识与意愿之外‘” （其基础建立在经济生产的模式和条件），并需要从辩证角度发展源自于社会实践的社会理论。　　从涂

*大糖帝国 演示  
[http://www2.le.ac.uk/departments/interdisciplinary-science/research/the-sugarscape](http://www2.le.ac.uk/departments/interdisciplinary-science/research/the-sugarscape" \o "http://www2.le.ac.uk/departments/interdisciplinary-science/research/the-sugarscape" \t "https://xueqiu.com/5674464747/_blank)  
  
或者  
  
[https://sourceforge.net/projects/sugarscape/](https://sourceforge.net/projects/sugarscape/" \o "https://sourceforge.net/projects/sugarscape/" \t "https://xueqiu.com/5674464747/_blank)*

*要搞清楚，阶层固化和腐败，不！是！一！码！事！  
甚至可以说，是部分对立的[怒了]  
简单一个道理，固化的上层，根本犯不着去腐败，完全可以合理合法合规的享有超额资源[抠鼻]。那什么人有动机腐败呢[不说了]*

## 在沉默中积累，在绝望中爆发：第三次民粹大潮中的人类世界

原创 2017-04-21 赵皓阳 [大浪淘沙](https://mp.weixin.qq.com/s/_e_N_5WKDdDE380nkthksA" \l "#)



**（一）定义：“民粹主义”的褒贬之辨**

2016年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第三次民粹主义大潮的元年：大到英国脱欧、美国大选、欧洲反难民潮；小到杜特尔特当选、朴槿惠下台、土耳其政变失败；再小到香港占中、台湾太阳花运动……全世界范围内都可以看到民粹力量的崛起以及其对国家内政、世界局势的巨大影响。美国著名的《外交事务》杂志在2016年最后一期的主题就是民粹主义。

在政治学上，民粹主义是一种与精英主义相对立的价值观。精英主义（elitism）认为一些特定阶级的成员，或是特定人群，由于其在心智、社会地位或是财政资源上的优势，应当被视为精英：这些精英的观点应当被更加重视；这些精英的观点及行为更可能对社会有建设性作用；或这些精英超群的能力或智慧令他们尤其适合于治理。几千年以来，人类社会一直是精英主义为主导的，最早的指导思想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期的“四层阶级论”和“目的论”就开始了（亚里士多德：最好的笛子给最好的笛手）。很明显，精英有学识、有眼界、有判断力、有执行力，能够引领我们走向一个更好的未来。精英主义者们主张一种“慈父理论”（也叫严父理论），就是说我对你好，比如说让你交税啊、让你受教育啊、让你系安全带啊、让你服兵役啊，你别管为什么，听我就行了，你只要明白这是对你好、对我们国家好就行了。然而，精英主义的弊端，就是我们本篇文章所论证的种种“特权”，一直都没有消除，如何能保证精英们在扮演“父亲”的角色中不损害儿子们的利益（终究不是亲生的），是近代以来各种法律、规则、制度的终极命题之一。毕竟“肉食者谋之，肉食者肥之”，随着社会不断进步、人民自主意识不断提高，饿了几千年下层人民也想吃肉了。

民粹主义（populism）是一种极端化的民主，历史上曾有多种表现形态，其基本精神是以维护平民的利益为由而反对权威，为此不惜采用任何手段。民粹主义的概念最初来自于拉丁语“populous”，类似于英语中的“folk”“nation”“masses”等概念，是将全体民众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民粹主义思潮的滥觞可以追述到古希腊、古罗马时代，是由普通民众反对贵族政治（aristocracy）、财阀政治（plutocracy）运动中提炼出的精神思想。它不仅仅是简单粗暴的“少数决定多数”，还夹杂着诸如民众运动、暴力斗争、反精英等意味在其中。平民的力量从法国大革命开始初现端倪，在工人运动、社会主义革命中展现的淋漓尽致，沉重地打击了统治阶级，为我们建立起一个更平等、更公平、更美好的社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民粹主义的弊端同样很明显，群众的盲目性、野蛮性在多次政治运动中频繁地造成了诸多的灾难。以至于让领导人两相比较说出了“要防左，也要防右，但主要还是防左”的话来。

民粹主义既是一种政治思潮，也是一种社会运动，这种很复杂的东西很难“一言以概之”，许多平民运动中都夹杂着民粹主义的趋势，许多民粹主义的爆发都有阶级斗争的根源。文科这种东西，历史、政治、经济，掺杂的各种元素太多了，有时候这角度说是这样的，哪个角度说就成了那样，很多地方界限是很难划清的。

就“民粹主义”这一含义的褒贬评价来看，也是根据历史时代不同而不同变化的。无论是“民粹主义”还是“精英主义”，在学术上讲都是中性词，不存在谁优于谁之说。然而在一定历史时期内，若是精英过于不知节制，对于下层人民的盘剥过于苛烈，则提“精英主义”则多为贬义；若是贫民运动对社会的正常秩序、物质生产生活造成了难以挽回的危害，则在此语境下提“民粹主义”则多为贬义。还由于自古以来精英阶层都掌握着话语权，所以提到与之相对立的民粹主义，大多使用贬义语境。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提“民粹”这个词第一时间都会浮现出一些负面印象，这也是与精英话语权下潜移默化的灌输分不开的。所以必须要用辩证的思维来看待“民粹主义”

需要注意的是，不能把民粹主义和无产阶级运动混为一谈。民粹主义讲究的是代表全体人、每个人，虽然这里的“所有人”往往代指下层人民，但是其定义明显不是以是否占有生产资料来分野的。马克思主义学从来不避讳承认自己就是代表某一特定阶级的利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政党也从来不承认自己代表“所有人”“全体利益”。毛主席说得好，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动。革命是全天下最权威的东西，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这种最容易讲道理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无产阶级革命、共产主义运动，特指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阶级运动，民粹主义与之的区分还是很明显的。

IMG_257

如何区分民粹和民主，也是学界纷纷争论莫衷一是的问题。不过多数学者支持这一观点：民粹是极端的民主。二者有一种很大的区别就在于，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是代议制：民众通过选举选出国家权力机关或是立法机关，有他们代替民众管理国家、行使权利。然而民粹主义者坚定地认为，只要是政客、大商人这些精英，都是良心大大滴坏，你代表了我们还是会阴奉阳违地去维护自己的利益。所以民粹主义对于“代议制”是普遍不友好的，但是民粹主义者们提出的普遍全民公投、严苛的罢免权，在现代政治的应用中又成本太高。这也是有史以来除却特别动乱的时期以外，民粹主义政治思想很难付诸于政治实践的关键。

再多一句嘴，最早提出“人民主权说”的卢梭，他认为代议制是无效的：国家主权应该而且只能属于人民，而人民主权不外是公意的运用，同时主权有如下四个特点——第一，主权是不可转让的；第二，主权是不可分割的；第三，主权是不能代表的；第四，主权是绝对的、至高无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卢梭的观点是很有道理的，事实也证明，代议制的民主根本无法代表全体人民尤其是底层人民的利益。然而现代社会实行一切规则都是有成本的，主权不能转让又不能代表，难道但凡有什么大事让全国人一个一个表态么，明显是不现实的。然而卢梭所说的——主权不能代表不能转让，确确实实是客观真理，所以民粹主义与精英主义、民粹主义与现代民主政治的矛盾也是命中注定的，持续至今依然没有缓和的迹象。

**（二）历史：三次民粹化浪潮**

当今学界公认的，历史上共爆发过三次大规模的民粹主义大潮：第一次发生在第一次科技革命到第二次科技革命之间的欧美国家，具体表现是以乡村为基础的民粹主义。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生产力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但是贫富分化、阶级矛盾、城乡矛盾愈演愈烈，在城市中由于无产阶级较为集中，所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无产阶级运动欣欣向荣；而在农村则具体表现为广泛的民粹主义运动，例如俄国民粹派的“到民间去”运动和美国西南部农场主的平民党运动。随着历史的发展，在俄国，以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民粹运动最终被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所接手；而美国的以反现代化、反新科技、反奢靡风的保守主义民粹运动最终无疾而终。

IMG_258

（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沙皇俄国处以“假死刑”，并流放至西伯利亚长达二十一年）

第二次民粹化浪潮爆发于20世纪50年代的拉丁美洲国家，是一次以城市为基础的民粹主义。因为拉美诸国在历史上被殖民、在现代被压迫，各国政府多为欧美诸国的傀儡，两极分化严重、政治腐败。在此背景下，拉美人民求独立、求发展的诉求一浪高过一浪。以阿根廷庇隆主义为代表，全拉美都掀起了民粹主义运动浪潮。最终运动的结果是除了秘鲁的亲美政府还在苟延残喘之外，拉美各国普遍建立起了满足平民诉求的左翼政权。但是，我在之前的文章里也说过，拉美各国左翼政府上台后，终究不是根正苗红的无产阶级革命，他们不能改变现有的生产关系，只是通过发福利来满足底层人民的诉求。然而发福利终究有一个头，福利发完了还靠什么来获取支持呢？于是近二十年来拉美左翼政府纷纷倒台，曾经最为激进福利也发的最多的委内瑞拉的倒下，宣告了拉美政府左翼化的彻底落幕。

我们现在就出在第三次民粹主义大潮中。2016年至今，英国脱欧、美国大选、这一次民粹主义运动迎来了巅峰。这一轮民粹化浪潮有三个明显的特征：反全球化、极右翼排外和网络化。现在欧洲，代表保守主义、排外主义的极右翼政党全面得势，如法国勒庞的“国民阵线”、希腊的“金色黎明”、瑞士的人民党、匈牙利的“更好的匈牙利运动”、奥地利的“自由党”、比利时的“佛拉芒利益党”、英国“独立党”…………这些理念非常极端的极右翼政党，许多只成立了几个月，就在短短时间内成为全国第三大党、第二大党。这股思潮之猛可见一斑，第一世界之割裂可见一斑。

**（三）根源：矛盾在沉默中积累，在绝望中爆发**

分析问题，还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今世界，所有社会问题归根到底都可以化作两句话：一为贫富分化，一为阶级固化。

根本的原因，还是一个经济问题。以这次美国大选为例，川普基本盘的标签，基本是白人、工人、小企业主、低学历者、中老年人。一言以蔽之，川普支持者的特点很明显————在经济全球化中受剥夺感最强的人。希拉里基本盘的标签也很明显，华尔街精英、黑人、妇女、拉美族裔、穆斯林、同性恋者……一句话也可以归结为：所有反对川普的人。希拉里自身特质本身就不强，只是一个所有反对川普人的最大公约数。

IMG_259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以50岁为界，越年轻支持希拉里的比例越高。以有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为界，文化程度越高支持希拉里的比例越高。

在美国的发展中，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深，使得资本跨国流通变得更加容易，这加剧了美国产业空心化，导致就业岗位的大量流失，本国工薪阶层的利益遭到了损失。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蛋糕越做越大，中下层人民也能分一杯羹，然而自08年以来经济波动剧烈，有愈发下行的趋势，这时美国内部的矛盾就显露出来了，川普只是一个代表而已。马克思评价拿破仑，“就算没有拿破仑，法兰西也会出现一个皇帝”，就是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新兴资产阶级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铁腕政权来代表自己的利益，而拿破仑只不过是被历史“钦定”的那一个。他上台之后对外驱逐鞑虏、恢复高卢，对内确立民法典、打击旧贵族，还能勒马维也纳、传播资产阶级价值观，很好地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使命。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川普的出现就容易很多了——历史走到这一步、经济周期律运行至此，保守主义、孤立主义势力如日中天，川普只不过是替他们发声的一个人。

一直以来，美国中下层白人群体，在政治上极度缺乏代言人和保护者。黑人、穆斯林、同性恋者都有自己的“政治正确”和话语权，然而白人中下层群体，就是我们上面说的川普的基本盘那几个标签，政治地位并不理想。更何况，他们在全球化中是受剥夺感最强的一批。华尔街资本家们可以通过全球资本市场运作覆雨翻云手赚得盆满钵满，跨国资本可以通过全球化利用不发达地区廉价劳动力和优惠税收政策，那么谁受损了呢，很明显就是本国的工薪阶层。可以看到，这一群人既没有政治地位又没有经济地位，川普的出现只是在经济危机阴霾之下中下层白人日久压抑的一次大爆发。

再来看另一个例子，英国脱欧：

IMG_260

看上图，可以明显得看出，留欧派主要集中在哪里呢，首先是伦敦及其周边——跨国资本的集中地。换句话说，资本全球化中受益最大的地区。同理还有北部苏格兰，作为北海气田和重要工业化地区，也是从欧洲大市场一体化中受益的。那么脱欧派就好理解了，其他相对不富庶的地区，全球化跟我没啥关系——基本钱都被上层精英团体争去了，而我反而要承受全球化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比如中国廉价工业产品摧毁本地小作坊、小工厂、小品牌；比如工作机会被工资需求更低的、不需要社保等其他福利的、更肯吃苦加班的第三世界贫民抢走；比如要承受大量移民带来的市容、治安难题。这个逻辑是很好理解的，你把全球化、欧洲一体化吹得那么好，但是基本上都是“肉食者谋之，肉食者肥之”，我非但没有获利，反而承受了种种损失和不便，那我为什么不反对呢。

说白了还是一个资本主义永远无法解决贫富差距、两极分化的问题。资本永远是贪婪的，永远是追求更高利润的，但是当它们围绕资本制定出这样一套吸血体系时，利益的分配不均必然会导致民意的反弹。我们可以看到，就在今年，就在西方社会，白人中下层工薪族已经用自己的声音对上层精英一如既往坚持的资本全球化、普世价值表达了最直接的反对——支持脱欧、支持川普。

其次，在经济不景气、生活品质不见提升的情况下，一些社会问题就凸显出来了。即便在西方民主制度下，政治也是精英的特权，普通民众的政治参与感并不强，而民选政府往往在一些社会重大问题处理上缺乏能力（日本核泄漏和德国难民安置问题就体现的很明显）。这样民众的期望与政府的能力就产生了落差，也是民众想直接参与国家管理、进而兴起民粹主义的政治根源。

同时，民粹主义还往往与短期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相挂钩。众多政客为了选举利益，发现“民意可用”，于是故意用极端的民粹思想迎合平民、获取选票。这一股民粹大潮的兴起少不了这群政客们的兴风作浪。

另外，不要忽略社交网络推波助澜的作用。纵观世界政坛，社交网络已经全方位、无死角地影响着政治局势。例如川普竞选，花费的经费只有希拉里的十分之一，但是之所以能有这样大的声量，绝对是“一支推特顶十万雄兵”。台北市长柯文哲，作为一个“政治素人”，能够击败在台北盘根错节经营三代之久的连家，他作为一个社交网络达人为他赚取的形象分不容忽视。更明显的是去年的土耳其政变，往常政变最先需要占领的是什么——火车站机场、电视台。占领了火车站就断绝了后援，占领了电视台就垄断了信息源。然而互联网时代一切都没有用了，埃尔多安面对政变直接在社交网络上发布一个短视频，号召大家走上街头保卫政权，于是全国各地每一家清真寺都用大喇叭广播，军队的行动瞬间淹没在“人民的汪洋大海中”。你要想，如果你有一个很蠢的观点——比如说在墨西哥边境上修一座长城，你明显会遭到身边“理性”的亲朋好友们的嘲笑，久而久之你肯定会产生自我怀疑。然而现在有了社交网络，你可以在网络上自由表达观点并找到众多“志同道合”的人，于是乎这种抱团取暖的现象会使极端思想更加顽固、更加极端，社交网络的生态环境为民粹主义提供了绝佳的天然土壤。

**（四）未来：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我们要相信，纵使全球化现在遇到了巨大的挫折，右翼保守力量、排外避邻力量、反全球化反贸易力量裹挟了民粹运动，成为了时代中呼风唤雨的政治势力。但是，从历史的大潮流来看，人类的合作与交流继续深入是不可阻挡的客观趋势。要将全球化进程当做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来看待，期间必将遇到高峰与低谷。

同时，我们要意识到，全球化的本质在于，它是一种打破和超越领土、国别、民族、地理界线，展示人类日益相互依存，并作为一个类主体求生存、谋发展，逐渐形成一种新的整体性文明和最广大市场的历史进程与趋势。不能将全球化简单的等同于资本全球化，全球化不是跨国资本家们更方便攫取剩余价值的工具。如果全世界的平民不能同精英一样享受全球化带来的便利、利益，那么全球化进程将面临民粹主义持之以恒的反噬。

在当今世界来看，目前兴起的民粹主义并不是完全的“平民化”“保障底层利益”，而往往是被某些政治精英所利用，成为煽动民众情感、捞取政治资本的工具。民粹主义运动然而终究还是被某些“精英”所领导，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讽刺。民粹主义运动的参与者们，往往在一种群体无意识中走向狂热、迷失自我。

要辩证的来看待“民粹主义”：它既有进步的一面，又有落后的一面；既可以左，又可以右；既有民主特征，又是对成熟民主政治的危害；它貌似激进，却常常代表保守力量；它反对精英政治，又往往盲目从众。从根本上讲，不能用简单的“好”“坏”来评价民粹主义，要当成一个客观现象、客观规律来看待。如果民粹主义能够推动社会进步、让人类社会往更好的方向发展，那么这一种力量是值得被肯定、可以被利用的。

从人的本性上来讲，民粹主义的负面作用似乎难以避免。心理学上讲，一旦人们参与类似“民主”这种政治活动，盲目、从众、群体无意识的状态难以避免，人群也很容易在这样一种不理智的情感中走向极端。那么如何让民粹主义推动社会进步，如何斩断不理智民粹运动的土壤，不外乎姜文在《让子弹飞》中说的那三点：“公平、公平、还是TMD公平”。

IMG_261

因此，从历史上看，民粹主义仅仅是作为对精英主义的一种制衡，而从未成为过人类行之有效的政治运行方式。自古以来，精英主义永远都是最主流，而当上层的老爷们吃相太难看的时候，来自底层不满的火焰必会熊熊燃烧，在古代表现为广泛的农民起义，在近代欧美就是前两次的民粹浪潮。

这里需要再特殊提一下的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前文中已经说了，无产阶级运动不是民粹主义。从本质上讲，列宁主义指导下的政党，也是一个“精英主义”政党，列宁坚信无产阶级只能“无意识”地跟着先锋队走。列宁甚至指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创造者不是无产阶级，而是一批高尚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学者。列宁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概念，“自觉性”和“自发性”：自觉性意味着智慧，具有理解和预见的能力，能够进行组织、制定计划、分析时机；相反，自发性意味着冲动、蛮干和本能意志。无产阶级先锋队具有自觉性，而人民群众往往是“自发性”的。当然，列宁还是承认人民群众改变历史这种根本性、无法抗拒的力量——没有这种力量，任何革命性的伟大社会变革都无从谈起。但是他认为这种力量是盲目的，需要先锋队的引导。

不过有趣的是，如果说列宁是“先锋队本位制”，那毛泽东绝对是“人民群众本位制”，这二者看似是辩证统一的，但其实细琢磨起来还是有很大不同的。毛泽东在愚公移山中说的很明白：“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看一个是“天神”，一个是被带节奏的群体，思想差异有着明显的分野。毛选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这是体现毛泽东核心政治思想的文章，体会一下其中无一不是“人民本位制”。翻开毛选或者红宝书，随处都可以看到这种话：“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人民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往往是幼稚可笑的”“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也就是因为对人民近乎于执念的信任，毛泽东也不吝于将自己最后一次、最看重的一次社会实验寄托于近似“民粹”的手段，关于发动文革的种种理念在他一生的思想中都是有所体现的。

未来，随着社会动荡、阶层割裂加剧，平民与精英、穷人与富人、白人与移民之间的冲突会愈演愈烈。在这样一种情形下，唯物史观、革命话语权和阶级分析的思想必将回归。先锋队领导下的广泛的无产阶级运动，是否可以在精英主义与民粹主义中找到一个平衡点，现在衰落的国际共运能否在未来为人类自古以来的矛盾找到一个解药，我们还要拭目以待。

毛诗有云：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  
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  
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  
千秋功罪，谁人曾于评说？  
而今我谓昆仑：  
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  
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  
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  
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对底层社会的污名化、歧视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这是贫富分化愈演愈烈注定带来的副作用，同样也有深层次的心理原因。人们希望相信自己生活在一个公正的世界里，而善人遭恶报，恶人有善报，这样一个不公正的世界，显然不是我们所愿意看到的。一旦“公正世界”的信念受到威胁，人们在面对这个世界时会缺乏自信，丧失对世界的控制感，这也不是我们所愿意接受的。因此，人们更倾向于认同世界是公正的，虽然这种信念的内容并非真实的。而在一个公正的世界里，只有坏人才会得到惩罚，所以被持续惩罚的“受害者”就必须是一个坏人。因此，人们更倾向于责备受害者，认为他们是罪有应得，来满足自己内心脆弱的的“公正世界信念”——这便是著名的“公正世界信念”谬误。  
  
基于此，人们倾向于认为，底层人民的贫困是咎由自取，是懒惰、是愚昧导致他们活该受困于现在的贫穷。但是他们往往忽略了一点，懒惰、愚昧、低素质，有时候往往是贫穷的副产品。但是人们更愿意颠倒一下因果关系，以至于让自己的心里好受一些。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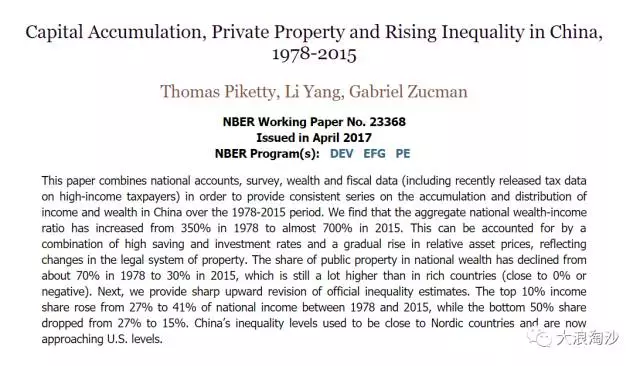
*[http://mp.weixin.qq.com/s/a4cE-0KER\_TwFjIBI5IHgQ](http://mp.weixin.qq.com/s/a4cE-0KER_TwFjIBI5IHgQ" \o "http://mp.weixin.qq.com/s/a4cE-0KER_TwFjIBI5IHgQ" \t "https://xueqiu.com/5674464747/_blank)*

## 割裂的中国：一列贫富分化的高速快车

2017-05-08 文/赵皓阳 [大浪淘沙](https://mp.weixin.qq.com/s/a4cE-0KER_TwFjIBI5IHgQ" \l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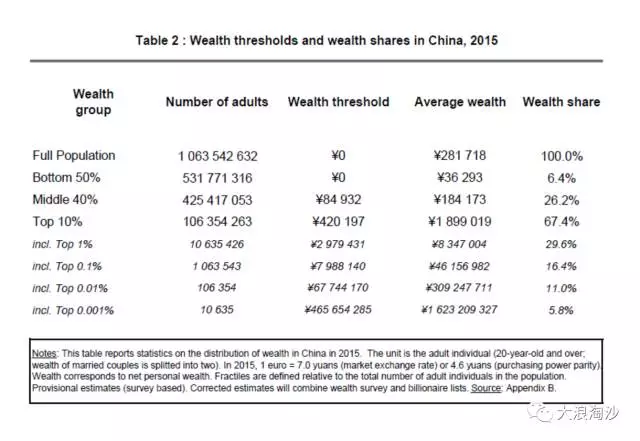
**（一）贫富差距的“赶英超美”**

还记得我们之前的文章[《疯狂的资本》](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zE2NTY0Ng==&mid=402782125&idx=1&sn=8ffaad2bc1e94f2f550f02eb01759d69&scene=21" \l "wechat_redirect" \t "https://mp.weixin.qq.com/s/_blank)么，文中隆重介绍的《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托马斯·皮凯蒂，刚刚在四月份发布了中国贫富差距、分配不公问题的论文。壮哉老皮，这次真的是给力了，我们来看一下当今世界研究贫富分化、资本积累、财富分配规律最权威的团队，是怎样看待中国问题的：



（论文地址：http://www.nber.org/papers/w23368）

详细论文可以在上面地址里下载（英文版的），数据的选择、分析的方法、论证的过程可以去看原文，我这里只捡着重要的说。



在2015年，最富有的10%的人群占全部财产的比重为67％，最富有的1%的人群占全部财产的比重为30%。Top1%人均财产为835万元——是不是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夸张，不过要注意我国人口基数，top1%的人群就有1400万人。而最底层50%的人群，只占有全体财产的6.4%。

IMG_258

1978-2015年，中国公有财产比重从70%下降到30%，私有财产比重从30%上升到70%。

IMG_259

上图比较有意思，蓝色的线是官方数据中top1%收入占全体收入比（注意，上表中是财产，这里是2015年的收入，不要搞混），红色的线是皮凯蒂团队根据各种相关数据修正分析后的top1%阶层收入（具体怎么修正的官方收入可以去看原文）。可见，经过作者团队修正过的收入不平等数据要远远高于官方统计数据，可以说中国财富分配不平等现象被严重低估。

IMG_260

上图比较了1978——2015年中国、美国和法国各阶层人群收入的增长率。三十多年来，中国的最富1%收入年均增长8.4%，底层50%收入年均增长4.5%；美国的两组数据分别为3%和0。可以看到，1978年的中国比美国和法国都要平等，而当今中国的不平等程度已经超过了法国，接近美国。

IMG_261

看完了收入再看财产，上图显示中国最富10%人群的财富同样完成了“赶英超美”——在2005年前后不平等程度超过法国，并飞速接近美国。

**（二）何不食肉糜：割裂的社会阶层**

今日，某视频自媒体发表了这样的言论，引发了广泛热议：

IMG_262

我想说的是，做这类自媒体节目，重要的是抓住自己的粉丝，不是什么正确说什么，而是什么吸引眼球、什么能引起粉丝共鸣说什么。所以说看到“办公室白领是社会底层”这种专门戳人痛点引发传播的言论，也就见怪不怪了。不过我想说的是，根据2016年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6年我国网民7.31亿 互联网普及率53.2%。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 的数据，我国当前中国智能手机普及率58%。这些人拿着智能手机、上着网，听着自媒体节目，恐怕还谈不上“社会最底层”吧。

那么真正的民工是什么样的，是不是真的“随随便便”就获得了优于城市白领的生活，引用腾讯“活着”栏目 第五十二期的报道《农民工老了》（摄影/吴家翔 编辑/王崴）：

IMG_263

▲黄昏时分，北京五环外的一处建筑工地旁，55岁的老范坐在马路牙子上吃着他的晚饭。三个馒头、一袋混合着豆腐干、花生米和零星肉食的小菜，共价值5元。路边熙来攘往的车辆扬起的灰土，被他就着馒头咽进了肚子里。像老范这样的老龄农民工并不在少数，中国人最忧心的“未富先老”的挑战已经抢先一步在农民工群体中显现。

IMG_264

▲晚上下班后，老冯回到宿舍吃饭。他的晚饭是5个包子，一个1块钱。宿舍里太热，人又多，老冯一边吃饭一边拿毛巾擦汗，屋里弥漫着浓重的汗味。

IMG_265

▲河北人老辛今年59岁，四年来一直在工地上给人做水暖工程，来北京之后他最奢侈的就是花八十多块钱给自己买了件衣服……

五块钱的晚餐、遍布蚊蝇的集体宿舍、一辈子最奢侈的衣服八十块，城市白领可以自行比较一下自己的生活质量。这其实反映了一个社会问题，这些城市小白领、在网上发声的年轻人，他们不是看不起农民、农民工等底层劳动者，他们是看不见这些人。这种类似“何不食肉糜”的无病呻吟恰恰反映了社会的割裂。我有一位在法国生活了十年的朋友跟我说，欧洲社会上层、中层、下层分界非常明显，这些人们的生活几乎一辈子没有交集，而且几乎没有阶级晋升的社会流动。比如一位上层精英，平时出入高级商场，住在市郊高级社区，开车出入核心CBD，生活中完全可以跟下层社会绝缘的，更不用提工作交集了。各个阶层的生产生活、经济运作，已经类似平行状态、完全绝缘，带来的除了是阶级晋升的困难、人民对于自身命运的悲观，更有各阶级之间的陌生、不理解乃至是歧视、敌意。

引用一篇知乎匿名用户的回答，“如何评价《北京折叠》获得雨果奖？”：

我是北京的环卫工。科幻吗？我觉得蛮写实的啊。现在就是，不用到未来。垃圾清扫，转运，焚烧，填埋，堆肥，这一切都发生在大家假装看不到的地方，而做这些的人们生活在城市的夹缝中。你们知道在四环内哪里卖一块钱一大串的肉串吗？六块钱大份炒面呢？十块的理发馆呢？

你们知道在垃圾场干一天活身上的味道是洗不掉吗？小白领们抱怨的环境差拥挤喧闹的在第二层的地铁，身上有味道的沉默卑微的人是不敢上去的。《北京折叠》的作者还是太年轻啊！不需要铁闸，别人的目光和一声声的外地逼和捂住口鼻的湿纸巾就足够了隔离第三层的民工了。

我们遵循最严苛的标准把你们的北京打扫地干干净净，然后把自己努力影藏在阴影中不打扰北京人，如果偶尔发现不小心走入阳光下身上有异味惊恐的我们，生而为外人，真的很抱歉。（地址：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9846394/answer/118234002）

**（三）绝望的底层：努力并不能脱贫**

对底层社会的污名化、歧视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这是贫富分化愈演愈烈注定带来的副作用，同样也有深层次的心理原因。人们希望相信自己生活在一个公正的世界里，而善人遭恶报，恶人有善报，这样一个不公正的世界，显然不是我们所愿意看到的。一旦“公正世界”的信念受到威胁，人们在面对这个世界时会缺乏自信，丧失对世界的控制感，这也不是我们所愿意接受的。因此，人们更倾向于认同世界是公正的，虽然这种信念的内容并非真实的。而在一个公正的世界里，只有坏人才会得到惩罚，所以被持续惩罚的“受害者”就必须是一个坏人。因此，人们更倾向于责备受害者，认为他们是罪有应得，来满足自己内心脆弱的的“公正世界信念”——这便是著名的“公正世界信念”谬误。

基于此，人们倾向于认为，底层人民的贫困是咎由自取，是懒惰、是愚昧导致他们活该受困于现在的贫穷。但是他们往往忽略了一点，懒惰、愚昧、低素质，有时候往往是贫穷的副产品。但是人们更愿意颠倒一下因果关系，以至于让自己的心里好受一些。

更何况，“努力”真的能让人摆脱贫困吗？根据统计局发布的2015年农民工监测报告，我国2.77亿农民工月平均工作25.2天，平均每天工作8.7小时，合计平均每月工作219.2小时。而我国劳动法规定的每月劳动时间为166.6小时，加班不得超过36小时。可见，我国农民工平均每月超时劳动16.6小时。在富士康等企业，工人们在生产旺季的平均加班时间能达到80小时一个月，有些工人甚至加班160小时[ “新生代”ilabour课题组，关于富士康公司工资、工时与工会调研，中国工人，2015(8)]，这达到了19世纪欧洲的工时水平。在相当多的企业，工人们还会被要求“义务”加班而没有加班费。除此之外，企业不给外来务工人员交社保、工伤不赔偿、拖欠薪水等现象非常普遍。然而穷人为什么不抗争呢，不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呢？因为这样做之后，你连工作都没了，为了养活自己，必须服从于这种不平等。你能去恣意指责，这些底层劳动者“不努力”吗？然而辛勤的劳动依然无法使他们摆脱贫困，一句话——穷人，是永远受资本支配的奴隶。

穷，和懒从来没有必然联系，贫困问题有着更深层次的社会原因。自奴隶社会起，就存在了“辛苦的穷人”，奴隶的一切都是属于奴隶主的；农民要将大部分的粮食作为地租；工人剩余价值被剥削后仅能维持自己的生活……2012年中国城市人均GDP排名前十分别是：澳门、香港、克拉玛依、阿拉善、鄂尔多斯、东营、大庆、包头、无锡和海西，大多是靠石油、煤炭等自然资源起家；而同年中国城市日均工作时长排名前十的是：广州、杭州、上海、深圳、郑州、青岛、北京、武汉、南京和天津，两者无一对应。

学者姚建平根据统计《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得出中国住宿餐饮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制造业等七大行业的劳动报酬低于社会平均劳动报酬，其就业人员的平均劳动报酬都没有超过社会平均劳动报酬的60%。鉴于如何衡量贫困在中国还没有统一的标准，以国际贫困线（通常是该国家或地区社会平均收入的50%）作为贫困标准，这七大行业工作的劳动者绝大部分都是工作贫困者。

而这些行业恰恰加班严重、工时超长，《2014中国劳动力市场报告》显示，住宿和餐饮业劳动者平均每周工作时间长达51.4小时，排名所有行业平均周工时第一；建筑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分列二至四位，且以上四个行业均已超过法律规定的“特殊行业”周工时49小时界限……依照《劳动法》规定的日8小时标准，这些行业的工作者平均每周只能休息一天甚至更少。

最近，“丧文化”在年轻人中非常流行，《光明日报》还专门发表了一篇文章《引导青年人远离“丧文化”侵蚀》：

“我差不多是个废人了”“其实并不是很想活”“漫无目的的颓废”“什么都不想干”“颓废到忧伤”，这些散发着绝望特质的话语，配上生动的“葛优瘫”“懒猫瘫”等表情包，成了新聊天形式的流行内容。从这些话里，我们明显地感受到了某种情绪——什么都不想干、只想蹉跎岁月、找一个最省事省力的方式活着的消极情绪。这与大家对青年朝气蓬勃的一贯印象格格不入，令人费解，也令人担忧。

IMG_266

官方的媒体看问题倒是看到了，然而看到了能说明什么问题呢？单靠喊几个口号，进行几轮思想教育，强迫学生背点正能量价值观，年轻人就能不“丧文化”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永远坚持唯物史观的立场，永远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关系分析问题，年轻人为什么“丧”，简单得很，工作压力过大，上升渠道渺茫，别说事业有成开创未来什么的，就连房子都买不起。人又不傻，你能看到的未来预期就这么点，努不努力差别不大，那肯定就“丧”起来了。日本的现在就是我们的一面镜子。还是那句话，当你发现努力、奋斗都改变不了什么的时候，那还奋斗做什么呢？

所以说，当看到一些用得起智能手机、上的起网刚刚摆脱“社会最底层”的年轻人，意气昂扬地在朋友圈里刷着《我拉黑了朋友圈里所有的穷人》《致贱人，我为什么帮你》的时候，当看到越来越多的把贫穷原因归咎于到的原罪的时候，我不禁想问一句，当你认为贫穷是咎由自取、是“不努力”的时候，你能通过“自身努力”实现阶级晋升吗？

**（四）驱离的世界：分化的高速列车**

如何准确定义我们这个世界，不平等？固化？不不，这还远远不够，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全球思想联合委员会主席莎士奇亚·萨森，用这样一个词来形容我们当前的世界——Expulsions，驱离。

在其著作《大驱离》中，萨森指出，就像环境的破坏从污染土壤、水源开始，进而破坏整个生态圈，驱逐这个区域内所有的生物，经济运行的逻辑也是如此。当今的经济体制会让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这不单单是个固化的趋势，还会有一个动力在后面推着那些被“驱离”的人——中产阶层可以一夜间沦为新贫，而穷人被排除整个主流社会，永无翻身之日，处境还会每况愈下。萨森这样解释“驱离”效应，起初你只是贫穷，然而你会面对各种疾病、天灾、暴力、法律缺失的处境，慢慢你会无家可归、食不果腹，处境更加糟糕，最终被世界所抛弃。再比如穷人们连网络、智能手机都使用不到，对比整个社会的发展这不仅仅是原地踏步，而是倒退，这就是“驱离”的力量。

今年刚刚离世的英国思想家齐格蒙特·鲍曼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在其著作《工作，消费，新穷人》中，鲍曼指出，当今社会（无论是国内还是发达国家）一个很明显的现象，那就是对底层、对穷人持续的污名化过程。不同于“劳工阶级”（working-class）意味的穷富对立，"下层阶级"（lower-class）指向的潜在社会流动，"底层阶级"（underclass）一词的出现并风行，成功建构起了一个无用且危险的穷人形象。Underclass一词，最初是由缪尔达尔在1963年预言"去工业化"的危险时首次使用的，即工业生产的萎缩，可能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口永久性失业和没有资格受雇。这个词汇在很长时间里并未引起太多注意，直到70年代末期（也是福利国家制度开始遭受重挫的时代），在大众媒体和公共共识中，"底层阶级"逐渐演变为"穷人"的代名词。

在美国各州的司法案例和判决书中，“底层社会”这个词语的出现往往伴随着很长的相关列举——少年犯、辍学这、瘾君子、单身母亲、抢劫犯、纵火犯、未婚妈妈、皮条客、乞丐、暴力犯罪——用可怕的定性词语让所有体面人放下心中的道德包袱。伴随于此，两个相关的概念也开始同时被贩卖：首先，贫穷不再是一个社会议题，而只关乎个人选择。沦为底层阶级被视为是自主的选择——故意的或者默认的。用鲍曼的话说就是：“指责穷人因为不愿意工作而陷入惨境，因此给他们安上道德堕落的罪名，且把贫穷当成是对罪恶的惩罚，成为了工作伦理在全新的消费社会里的最后一项任务”。————有没有很眼熟，我们的朋友圈热文是不是就习惯用这种“道德谴责”来弱化贫穷问题的社会属性。

在传统资本主义社会，穷人和富人们地位虽然不平等，但精神上依然是平等的。然而现今穷人们被排除在正常生活之外，精神上已不再具有平等性，并产生了耻辱感、内疚感。鲍曼指出，并不能将"贫穷"简单折价为物质匮乏乃至身体痛苦，它同时亦是一种心理折磨与社会压迫。

在书中鲍曼绝望地写道：“今天的穷人，比任何传统意义上的穷人，比任何过往时代的穷人，都更为无望，更为痛楚。”他们不再是宗教意义上的救赎对象，也不再充当生产社会里稳定的劳动后备军，帮助穷人已经丧失了任何经济利益，他们被彻底逐出了道德义务的世界。那么穷人的出路在哪里，鲍曼也很悲观，无论在书中还是知道他生命结束，都没有给出一个关于未来的分析预测。

不过在我看来，要把人类社会当成一个动态的发展历程来看，我们处在的这个时代太过短暂太过微不足道，未来的世界还是充满了变革的动力。新时代底层年轻人身上的政治潜力是一个有待探索的领域：他们是不满的源泉，却未能展开新的政治想象；他们在阶级固化中幻灭，却不断地再生产着与消费社会相互匹配的行动逻辑；他们关心社会的变革，播散着从自由民主、平等多元、民族主义到全球化等各不相同、自相矛盾的价值，却甚少将他们对自身命运的思考与“被剥削的阶级”这一概念及其未来联系起来。这一切，都是留给未来可以想象的空间。

*老规矩，先泼冷水再喝鸡汤[抠鼻]，这条路，99%的人知道、想过、憧憬，但99%的人不敢、不想、不能，包括你我[关灯吃面]*

## 这年头做个青年为什么这么难？

原创 2017-05-05 米糕 [米糕新闻日记](https://mp.weixin.qq.com/s/1sL5btW6xZn2MQI6HoMMUA" \l "#)

‘



过了五四，才想起要帮青年人说句话。

**01**

在这个五四之前，中国的青年们刚刚经历过几场堪称残酷的心灵洗礼，他们在北上广深热火烹油的楼价面前颤颤巍巍，在漫天神爹的社会现实面前哆哆嗦嗦，在祁同伟射向自己大脑的那颗子弹的森白光泽里看到漆黑的未来。

我年轻的时候没有经历过这种连唬带吓、堪比鬼片的青春期教育，我看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阳光灿烂的日子》，都是飞舞的荷尔蒙和空气里湿哒哒的暧昧味道，给我的教育是只要不乱搞男女关系，人生就是充满薄荷味的诗与远方。我会自然长大，顺便成人，哪里会在少年时就满怀人到中年的颓废，更不会频频思考如何以己为棋胜天半子的悲壮。

以前做青年人，大家不那么关心爹是谁，我记得自己上中学时，亲耳听到一个复旦毕业的数学老师指着一个干部子弟说：不要以为你爸是谁谁谁，你就可以不认真读书！这句话现在也有老师说，但变成了：如果你爸不是谁谁谁，我劝你最好拼命读书！爸爸还是那个爸爸，励志片变成了恐怖片。

现在的青年人，上进不能功利，否则人们说你是精致的利己主义；淡泊不能消极，否则人们说你是颓废的啃老一族；明明房价已经相当于抄了三遍家了，主旋律还在鼓励你们不要做大官，要做大事。

说实在的，我看《人民的名义》，唯一的感受就是，这剧里不管好人坏人，贪官清官，办公室住宅都是一水的大开间，目测都在200平方米以上，按目前这市价，反贪局长陈海在汉东的房子都保不齐是怎么买回来的？更不要说侯处长在北京的宽敞豪宅，按照国家主席每个月工资不超过2万来算，侯处长这房子到底怎么解决的？

**02**

同为党建的宣传片，相比27年前的电影《焦裕禄》，焦书记的破办公室不足10平方，桌腿都不稳，一张破藤椅还因为得了肝癌要顶着肝疼结果捅破了，当时的年青人看到这样的领导肯定不羡慕。

现在的年青人看看这楼价再看看《人民的名义》，即便要像祁同伟一样以己为棋，也会前仆后继的强插进革命队伍混吃等死。趋利避害这是人性，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的共产党人、共产党人里专抓腐败的工作人员都住这么大的好房子，青年人怎么能不心向往之？又能实现人类大同的理想，又能让自己住上大同世界的房子，当个棋子算什么？

祁同伟要下天局，所谓天局自然是极难之事，以己为棋，胜天半子，哪怕最后冻死在山谷。这份悲壮说白了就是人不屈服于命运，敢赌敢拼，甚至以生命为代价。这种大路货热鸡汤往古代看有“天道不测，造化弄人，誓与造化争短长”，往近代看，有高尔基的海燕，叽喳乱叫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过去青年们听这样的故事热血沸腾，现在的青年人听完之后呵呵一声，内心都是草泥马，不然你见过现在哪个青年敢喊让房价涨得更猛烈些？鸡汤还是那些鸡汤，苦难早已升级了几代。

电视剧里祁同伟较劲的是规则，他知道获得权力不易，但是他需要获得权力，他想要获得权力，他自认能获得权力，所以他愿意以命相搏，与虎谋皮，所谋的不过是也能穿上虎皮，狐假虎威。权力之路如天局，甚至要付出生命代价。如果你现在跟年轻人说，考公务员请谨慎，抑郁跳楼是家常便饭，个别还会吞枪爆脑。年轻人可能都不信，坐在办公室哪有这么多幺蛾子，但现实中省委小秘刘小华不也悲壮一跳还留言羡慕冬松吗？

众人同情祁同伟，在于他生于寒门不是虎，要穿虎皮先得脱层皮，这个蜕皮的过程包括娶不爱的女人，挨枪子求上位，昧良心下黑手，每蜕一次皮，他就跟自己说距离穿上虎皮的日子近一点，那个坐在他身边的大老虎，也确实经常一边梳理皮毛，一边向他招手：来，再脱几层皮，你也可以长出虎毛来。最后祁同伟毛都没捞到，还丢掉了小命！这让年轻人看了怎么想？看个反腐片最后变成恐怖片，知识也不能改变命运，以己为棋胜天半子最后也是一枪毙命，正路走不通，邪路也不行，大哥，混口饭吃，能给条明路吧，这部反腐大片到底是要闹哪样呀！

**03**

以前孩子们要学坏，看一个故事就行了，所谓变坏不就是跟撒旦魔鬼做交易，把灵魂交出去满足欲望。圣西奥菲勒斯为获神职与魔鬼立约大概是祁同伟前传的西洋版，这从来都不是什么新鲜事，问题是，圣西奥菲勒斯斋戒了30天就得到了上帝的宽恕，现在青年犯个错动不动就要吞枪子，现如今做个青年怎么就这么难？

现在这个世界想方设法、千方百计地吓唬年轻人，告诉他们，社会已经固化了，你不要去努力，没用的！走正路，你辛辛苦苦一场空，走邪路，你颠颠簸簸没个好，最好是什么都不干，什么都别做，按部就班，行尸走肉，像机器一样，先当考试机器再当工作机器，供楼供车供书教学，最后领着养老金颤颤巍巍跟自己说：哎呀妈呀，辛苦小心一辈子终于可以安全地等死了。

作为一个青年，面对这个充满恶意，固若金汤，不想要给你一点机会的世界，你越是哆哆嗦嗦，你越是无路可退，青年的价值是什么？是年轻，是孔武有力的肌肉，是无限空间的未来，是天赐的荷尔蒙，是打破规则的勇气和机会，这个世界永远是大人吓唬小孩，一部分老实的孩子被吓唬住，老老实实的被固化，而另一部分不信邪冲出来的年轻人用实力告诉大人靠边站！

曾经有一全球最牛逼公司的CEO，年轻的时候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有一次，在图书馆，这个管理员碰到了当时身为哥大教授，牛逼闪闪的胡适，这个年轻人激动万分地跟大教授讲自己的理想。等他讲完了，胡适说：“年轻人，你讲了很多，可是很遗憾，我一句也没听懂……”

后来，这个年轻人坐在丰泽园的沙发上挥斥方遒，结果是胡适的儿子胡思杜亲笔写下了一篇《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成为来自亲生儿子射向自由主义大师的第一发炮弹。在这个管理员看来，什么阶层固化都是大人吓唬小孩子的鬼把戏，胡适还批评这个管理员《蝶恋花》写得狗屁不通，当时的水平完全考不上北大，如果这个管理员被吓唬住了，以后哪里还有这么多事？

**04**

说到底，祁同伟的败，不是败在他不够拼而是败在他拼错了方向，以子为棋看似悲壮，实际上连棋盘都没跑出去，当个棋子却要跟下棋的天斗，你见过谁能抓住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起来吗？以子为棋和天斗，胜天半子有意义吗？胜了你也还是棋。

天怕什么？天怕的是你这个小坏蛋，不按规矩好好下棋，反而呼啦一下把棋盘拨乱，甚至干脆掀翻棋盘，什么破规矩，老子不下了，砍了棋盘去烧柴！

这世界从来就没有什么人类设立的规则是不能打破的，既然规则都可以打破，怕得哪门子阶层固化，怕只怕你听多了大人们的鬼故事，吓破了自己的胆，最后成了比谁都积极去维护所谓固化的人。

1992年，有个个子不高的大人跑到南方去讲春天的故事，当时他和围着里三层外三层的年轻人一一握手，然后说：“我要握一握年轻人的手。”这个经常说要把这个事那个事交给年轻人的老人说过最对的一句话就是：21世纪要看年轻人的！后来，他来过的地方出了一拨科技新贵，干起了大人们看不懂也插不进手的事，建立了自己的帝国和规则。

生老病死是这个世界最无奈的事情，然而也是这世界最妙的地方，新陈代谢，绵绵不绝，沉船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后浪的目的不就是为了把前浪拍死在沙滩上，然后喊一句：让你老是拍鬼片吓我，老子就是不怕鬼！等你喊出这句话，自然就从儿子变成老子了！

别再念念不忘什么胜天半子的二货心结，跟天干不是把自己当子，而是把自己当天，跟他平起平坐的干，你年轻力壮你怕什么？你一无所有你怕什么？你压根不入流你怕什么阶层固化，鬼故事讲给鬼听吗？不管是做大事也好，是奋斗也好，都别忘了，规则不合理，就是规则有问题，你是年轻人，你就该去打破规则，没有哪个大人会心甘情愿交出对这个世界的掌控权，如果有，或者是他太虚弱，或者是你太强大，别无二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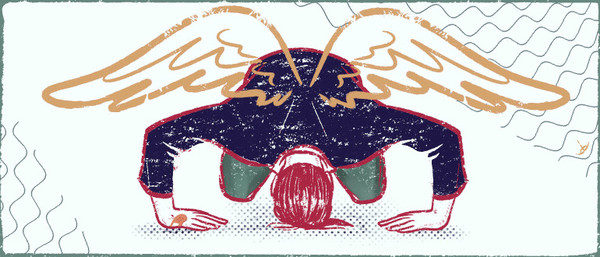
什么狗屁以己为棋胜天半子，你不是棋，你是人，记住！

如果你最近被房价、被别人的爹、被祁同伟的子弹惊吓过，这篇文章拿去压惊。另外告诉大家一个不是新闻的新闻，6月1日开始，米糕新闻日记作为一个无照自媒体将无法再发布新闻内容，所以这个地方可能以后都是用来跟大家说古代新闻或者八卦闲谈，如果还想听米糕说说体己话，欢迎加入米糕的小密圈，我们不谈新闻，只说风月。

*一句话，古代叫“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现在叫掀桌上井冈山（梁山太low），国外叫 “自由、平等、博爱,或死亡（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 ou la mort，后面这半句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害羞]）”，这条打破阶层固化的路，99%的人知道、想过、憧憬，但99%的人不敢、不想、不能，包括你我——————因为怕死[亏大了]*

# **牛津教授项飙：我们应该“认命”，但不能“认输”**

2017-05-06 21:10



关于出国打工：“他们追求的’不是一个法国梦或者说日本梦，他做的还是一个‘中国梦’: 超常规的、超高速的、跃进式的积累。”

关于出身：“你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做这样一个工作，不要把这个东西看作是要逃避、要超越的东西，而是要把这个东西充分拥抱住，看清楚。然后，你不要超越它而去，而是把住它、改善它。”

关于下岗：“东北（1990年代）的下岗工人，可能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面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忧郁的幽灵’。它不是‘怒鬼’，但是它忧郁。”

关于语言：“知识分子可能花了太多精力去‘解构’空洞口号，而没有把空洞口号的现实基础讲清楚……活的思想，需要实践、交往、交流才会出来，它需要一个社会生态系统。”



图为项飙老师，照片为项老师提供

执教牛津大学的人类学家项飙这些年纠结一件琐事：他的名字越来越多被写成“项飙”，而不是“项飚”。他发现“项飙”是电脑字库的首选。怎么办，那就全写成“飙”好了。“认了吧！”他说。

项飙今年45岁，他觉得自己像是个干体力活的。

“我像个调查员，不像知识分子”。

项飙出生于浙江温州，平日往返于英国、中国与日本之间，研究、教学，陪伴家人。近些年，他研究世界各地打工的中国东北移民。随着 90 年代的市场化转型与产业工人的“下岗”，大量来自东北城乡的劳动力，通过中介到外国打工，再回到东北生活。项飙想知道，这些流动对他们和对中国社会意味着什么。

1992年，就读北大社会学系的二年级学生项飙，来到北京市郊的“浙江村”调查，最终以这里为田野，完成了硕士论文《跨越边境的社区》。项飙在浙江村内部看到新生的变革力量——一种改变社会、突破体制的活力。

硕士毕业，项飙前往牛津读博。初到英国，他决心尝试一个完全不熟悉的题目：研究流散海外的印度 IT 从业者，为此他耗费数年，辗转于悉尼、海德拉巴和吉隆坡之间，险些没能毕业。印度 IT 工人的劳力输出从乡镇到大城市，从大城市到海外，在流动性、个人成功之外，项飙发现了多重不平等：传统的社会分层继续在新的经济模式中改头换面。

研究越做越多，项飙发现自己和文字的关系“不是很亲密”——“我对文本不是很敏感，不是说读不懂，而是觉得看很多当代的研究不太能激发思考，很模糊。”

项飙觉得调查材料像是个在手中跳动的活物，要把它转化成接轨热点理论的学术文章，就特别棘手。

“今天的学院工作，又要快又要拽，我这两个都不行。”

快速阅读的时代，人们常常更不耐烦，但项飙觉得大家仍然会爱看复杂的东西。“一本小说里如果人物和情节都那么直白，有谁爱看？你给家具上漆、房子刷墙，更不要说素描、壁画了，也一样：那一次刷成的色调，和一层一层叠出来的色调，感觉是不一样的。”

在他看来，文字不是简单的学院工作，而是值得和艺术结合起来，学者应该尝试更多写作方式——比如小说和故事。

他觉得人类学家的写作工夫也要像毛笔。世界的问题总是藏在多重矛盾里，而未来的希望，也在多重矛盾里。毛笔是书写这种矛盾的隐喻：“它本身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结构，水、墨和宣纸之间的互动关系就更复杂了，一笔下来，好多层次和变数。它是高度浓缩的复杂”。

他希望继续探索中国人跟世界的关系——印度、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理解异文化的理念、传统和智慧，反思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然而他说，这些工作比想像中难多了。

访谈正文

一

问：你从九十年代初开始关注“浙江村”，读博的时候又转向了印度，研究程序员的全球流动，之后又研究东北移民。你的研究一直是“全球”的，这里面有没有一条连贯的主线？

项飙（以下简称“项”）：有，那就是流动，我研究的都是跨区域或者跨国界的人的流动。

我想我对流动感兴趣，可能是因为它后头有这样一个矛盾：一方面大家对“为什么要流动”的回答是非常清楚的：为了生活更好。这个“好”，是按照常规的主流意识来定义的，大家说怎么好，就是好。所以你可以说流动在政治意义上是一种保守的生活策略，因为他没有想到去改变大的社会结构，更不用说革命。很多情况下可以说流动是一种逃避，因为眼前的问题太困难了，要通过流动来解决。

但是在社会意义上，流动又是很不保守的。人在流动过程中能够做什么，流动过程当中会发生什么，这些在一开始显然是不明确的。按照我们常规的话讲，思想比较开放、比较超前的一些人，才会流动。他要面对很多风险，而且要在流动中创造出许多新的做法，这些新的做法可能在中观和宏观上形成新的制度安排。

所以流动有意思，在于它同时有保守性和非保守性。它一方面会形成新的规则、新的制度，会挑战、改变旧的一些做法。但这些新的做法，不一定形成质的突破变化，它往往又会很快形成新的等级关系，新的不合理的东西。原来人们想通过流动冲破牢笼，但是又会发现有一个新的牢笼出现。

问：在浙江村和东北移民的研究中，你都发现了这种结构吗？

项：浙江村原来有两个特色，一是它和总体的社会体制格格不入，具有很强的创新性；二是在其内部高度平等。这两个特色现在都在消失。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资产变得空前重要，掌握资产的和不掌握资产的，彼此形成了很大的区隔。这倒不是完全因为流动本身再造了不平等的关系，这也和国家政策的干预分不开。我现在关注的东北移民，可能是更加明确的例子。

问：可不可以举例介绍一下呢？

项：我 2000 年初开始关注东北。那时候我还在欧洲做博士论文，在国际移民组织做短期工作。当时去参加欧盟的一些会，不少人说东北成为了中国新的非法移民的输出地。特别是在法国，这个说法流传得很广。

我当时觉得这个说法有点道理，因为东北从九十年代的后期开始国有企业改革，九十年代末期的时候彻底地私有化，大面积地“下岗”，下岗的工人拿了一定的买断费，可以拿来出国。所以我觉得把国内的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和跨国移民联系起来，可能有点意思。

结果等我研究之后，发现情况完全不一样。我 2004 年去辽宁调查，发现这个流动过程是被高度组织化的，不是说是有什么蛇头、非法移民这种组织，而是完全是由合法的中介在操作。而且 2002 年以后，国家允许私有企业进入“境外就业服务”，开辟了这么一个新的中介产业。中介组织是一层一层的，最高的叫“窗口公司”，意思就是说你通过这个窗口才能走到世界上去，最下层在街道或者在镇社区里，叫“基地”，下面还有联络员。中间当然有不少所谓黑中介，也就是没有政府特许资质的中介，但是这些中介经常都在正规中介的旗下，作为它们的代理而活动。因为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所以出国的费用也非常高，要六七万。所以东北的移民跟我们在欧洲的想像——失业工人非法、无序涌向国外——是完全不一样的。

问：在这种流动里，如何观察到了新的结构产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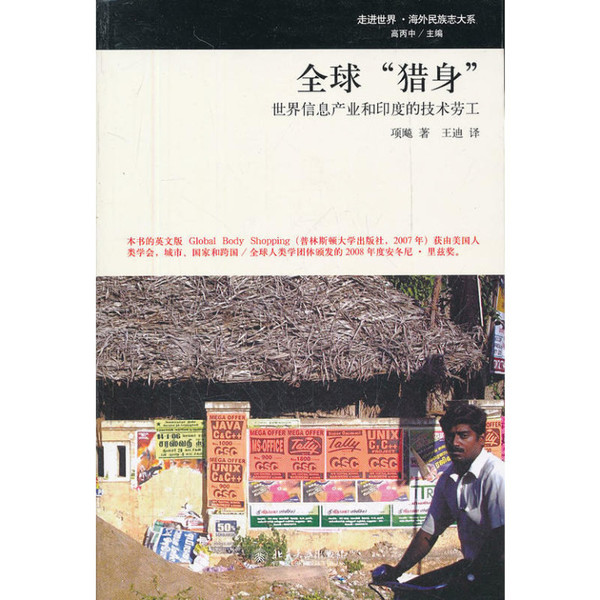
项：我调查的中心问题是，这么一个中介秩序是怎么形成的，怎么把个体那种非常急切的，不成型的欲望，要出去求生存的那种欲望，换为这样一个多层级、系统化的管理对象。这里的管理并不是政府行为，而是私有的商业中介成为了事实上的管理者，它对劳务人员进行控制。

一般来说，普通人想出国，其意愿经常是很模糊的，他们怎么下定决心呢？经常是中介在最基层的“腿”，也就是联络员，在底下看谁可能会有出国意愿。比方说，离婚的妇女，觉得生活没有意思，时不时受到非议，就会是一个好的潜在出国者。她有欲望要改变生活，会比较愿意在这方面花钱。

“腿”会跟她暗示，把有关信息告诉她。然后可能会陪着她到“基地”，也就是在县城或者镇上有门脸的中介，去报名。报名后，就形成了一个“材料”，这个材料就往上一级中介报，最后到“窗口”。

这几个层级，不仅是招聘的层级，还是控制的层级。比方说她去了日本，如果在日本违反了工厂的规定，工厂是不直接跟这个工人谈的，他们会跟窗口公司联系。然后窗口公司找到下面的基地。

这时候，基地和联络员会找她家里，跟（她的）父母或者爱人说，你的家人在日本做这样那样的事情，如果不悬崖勒马的话，那可能就要被遣送回国，以前交的费用那就全部要泡汤，回国之后中介可能还要采取法律行动。这个一层一层的中介不仅把人招到，让他们交钱，而且还要熟悉出国人员的家庭环境，能够直接给出国人员造成道德和社会压力，从而去规范（出国人员）在海外的行为。



项飙对印度的信息劳工做了深入的调研，最后写成《全球“猎身”》一书。

问：这听起来很像你在《全球“猎身”》里面讲到的，印度程序员的求职中介？

项：对，但比印度人的中介要精细多了。印度人的“劳力行”相当于劳务派遣公司，靠把员工派到大型公司做项目而赚钱。他们要控制员工，但是没有像东北的中介那样形成这一系列的社会，甚至是法律关系，把劳工“锁住”。比如有的中介要出国人员找当地的公务员担保。如果在国外跑了，当地的公务员有法律义务给中介赔钱。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新的相当严密的秩序在形成。你出国前的计划、意愿、去哪里的选择、怎么交钱，出国后的行为，三年合同期满后怎么办，都变成管理对象。在表面上，这种新的秩序完全是以市场规则运行的。商业性的中介机构为什么要管你？为了赚钱。但是当你看他怎么去赚钱的时候，他是要制造出一种支配关系，一种社会上和法律的支配关系，甚至是道德上的支配关系的。在这样一个支配关系下面，他才能够拿到钱。

出国打工对中国社会整体来说，那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一个现象，但是对越来越多新生代就业人口——70后，80后的这些人——来说，他们的生活就是越来越由这些微不足道的细琐现象构成的。他们这些人有很强的自我发展的欲望，但是没有共同的阶级意识，不和公共机构形成稳定的关系，甚至没有稳定的工作，也不知道一辈子将来会怎么样。他们和社会的关系，不是一个群体和社会的关系。而是看他们在干什么。当他们在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们成为某个系统的管理对象，但是当他们做另一件事情时，那又进入了另外一个系统。像出国这样的个体行动是怎么样被组织起来，被管理起来的，可能帮助我们理解中国社会总体上的变化。

问：这些移民劳工最后会定居在海外吗？

项：不会。有一些去欧洲的，做护理工人、屠宰工人，做厨师的，可以移民，但是数量很小。大部分是三年以后一定要回来。

问：所以这些人想去日本或者想去欧洲的时候，他们对生活的想像是什么样的？他们去日本几年，最后是会回来，那他们好像就并没有完成真正的流动，不是说真正逃离了什么东西，是这样吗？

项：是的。其实传统上中国人出国的目的，都是为了回来。衣锦还乡，这是最高的目的。在外面落地生根其实是比较新的一种想像。

东北农村的这些人出国，他要想的是什么呢？不是一个法国梦或者说日本梦，他做的还是一个“中国梦”。

但问题是，他要在中国做中国梦的话，永远也完成不了。你看房价天天在往上涨，以他在中国打工、务农，就不要再想了， 2016 年，玉米的价格下降 50%，这种情况下，你的中国梦——有房有车，结上婚，现在要不止三十万——这个中国梦你永远实现不了。

那你为了实现这个中国梦要怎么办呢？你要采取超常规的、超高速的、跃进式的积累办法。出国就是一个办法。

其实出国的工资并不一定比国内的工资高好多——以前是高出五六倍，现在也就是两三倍。这个工资从常规来讲，吸引力是不大的。大家知道，出国的社会成本还是很高的，你自己还得事先交那么多钱，然后那么多不确定性，舍家撇口出去。大家也都知道，出国干的肯定是所谓“三低”工作，好的工作轮不到你。

那你为什么还要去？一个重要原因倒不是说他挣到的绝对数目大，而是他挣到的都是“干钱”。在国内你打零工，像干建筑，现在一天也有三百块钱，但是在东北你一年干不了几个月，也就干个五六个月；第二，你干完活之后，工资不一定能拿到；第三，你工资刚拿到，就得跟朋友出去喝酒消费，每天娱乐，省不下多少钱。

在国外，正因为你完全没有社会生活，没有娱乐，天天工作，而且工资基本能够保证支付，所以你能够月月看到很高额的积蓄。

你其实是把自己作为一个社会人的交友、消费需求压到最低，然后把自己积蓄的能量强迫性地放到最大。出国就是把自己扁平化为一个纯粹的劳动者和积蓄者，从而能够达到跃进式的积累。所以出国是为了跃进式地追求中国梦，完全不是在追求生活意义上的日本梦、法国梦或者美国梦。

问：这种很艰苦的生活，是如何支撑下来的？没有娱乐，没有社交，难道不会让一个人觉得自己过着极端受压迫的生活吗？

项：这个就牵扯到另外一个问题，当你把自己单面化为一个经济人，其他很多社会行为、伦理道德，以及中国语境下的“人情”这些东西，都简化了。这其实是现在新秩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特色——把那些东西给抽干，然后一切都以利益计算作主导。

劳务人员作为最底层的人，他显然不是这个系统的受益者，他是管理对象。羊毛出于羊身上，他就是这头羊，所有的人都从他这里拔毛，那他这头羊为什么还要跳进这个系统，这个火坑呢？他其实是这么想的，这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心理状态：我今天做的东西确实是没什么价值，也不是我真正想做的。但是我以后会做那个那个。先把手头这个咬牙忍过去，今后回来我就好好过生活。既然眼前这个火坑离我最近，也许能捞到第一桶金，跳进去再说。

这个“以后好好过”，当然是个自欺欺人的谎言。我问一个出国人员身体怎么样。他说“哎呀，身体那是以后的事。有病了，能治，治；不能治，拖着。”他能不知道如果现在不注意身体，以后就来不及了吗？但是他的生活状态强迫他去这么自欺。这种看似自愿地，把自己作为人的多种需求搁置起来，其实是个深刻的社会和政治问题。

二



图片来源：free stock photo

问：这听起来像很多城市中产的考虑。比如说，在大公司工作的人，会说这几年就拿命换钱，过了几年我就辞职去周游世界实现梦想，好像很类似。

项：是的，所以我这里有一个概念，叫做“工作洞”。

他们去工作，就像跳到一个洞里面，发疯地工作，咬牙积蓄。几年后从洞里爬出来，歇一口气。相对清闲地晃荡几年，搞搞直销、炒股、开个烧烤店再关掉。然后再跳进工作洞。人们跳进工作洞，带一点英雄气概。洞里很苦，但是为了未来，你要忍。这是一种积累策略，甚至是投资策略，就把自己的生命、时间、精力，金钱进行投资。

现在讨论很多的一个问题是，民工是不是新的无产阶级或者说工人阶级。我觉得这背后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一方面你要看他的经济行动的话，他确实是无产阶级。他们作为无产阶级的劳动，是中国经济模式的基础。而且你看他们在工作洞里一天劳动十几小时的情况，他们还不仅是一般的无产阶级，可以说是超级无产者。但另一方面，从他们的主观意识上讲，从他自己的社会定位上讲，他们不认为自己是产业工人。他们一心想要逃离产业工人这个身份，想着自己做个小生意，开个小店。民工也是这个想法——要回到自己的镇上买房子——在社会和政治行为上非常坚定地模仿小资产阶级。小有产者怎么让自己去做无产者的工作呢？就是靠把工作看作“工作洞”。

倒过来，“工作洞”也解释了，为什么无产者的劳动和工作经历，没有转换成无产阶级的社会意识和行动。传统的无产阶级成为无产阶级，也是因为他们不得不入火坑，除了到工厂受剥削外没有别的选择。但是他们以洞为家，在这里发展出朋友、战友。工厂也就成为一个持久战的战场。洞里开出新洞天。但是我们现在，人们不断从一个洞跳到另外一个洞，所以很难有劳工组织，劳工的意识也很难沉淀下来。洞里一片黑。大家用于界定自己的，似乎更是从一个洞跳到另外一个洞之间的那种“自由人”的感觉。

80后民工的罢工行动，引起了不少关注。这背后是反映了他们的劳工和阶级意识的成长，还是他们厌恶自己的劳动身份、个人意识张扬的一种反抗？可能两种成分都有。但是如果说现在我们有一个已经成为社会主体的新工人阶级，我觉得为时过早。

问：其实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的工作就是不平等的，存在着剥削和压迫的，是吗？

项：对，当然是。老板跟他挣得不一样，这是明摆着的。而且他对这个不平等更敏感，因为他心里想的，就是要过上老板的生活。但这里的剥削的意思就不一样了——他不觉得剥削是要反抗的、对他本质性价值的一种侵犯。他把它合理化、自然化了。

第一，他会觉得剥削是工作的一个前提。第二，他希望今后能够转化成老板，能剥削别人。所以，如果你对自己在这个社会里面的位置没有清醒认识的话，那别人对你做的很多事情的意思，就完全不一样了，你对你跟别人关系的理解，也就会完全不一样。

我跟很多年轻的出国人员聊天的时候，发现有一个普遍态度，叫做“不认命，但是认输”。很多人都不认命，这是说，他出生在农村，或者父母是下岗工人，但他不认命，他想着“我一定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一个新的人生境界”。然后折腾来折腾去，没折腾出东西来，就认输了，这时候他说：“哎呀现在我成熟了，认识到社会就是这个样子，不认不行”。

我觉得，现在要提倡的可能是相反，要认命不认输。要认命，就是你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做这样一个工作，不要把这个东西看作是要逃避、要超越的东西，而是要把这个东西充分拥抱住，看清楚，为什么你出生的家庭会是这样？你究竟为什么是做这样的东西？然后，你不要超越它而去，而是把住它、改善它。不认输，就是不要放弃自己的努力。

你不是想通过变得和别人一样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永远解决不了的。某几个人运气好，也许可以这样改变命运，但是其他很多人还是这样一个命。认了命，也就意识到，出生不是一个个体层面上的随机事件，所谓上苍和你开的一个玩笑。这个命是结构性地摆在那里的。你要把自己的命想清楚，也就能够从里到外地对社会形成新的理解。这样认了命，两只脚踏在实地上，也很自然的不容易认输。

问：那是不是可以说，这些人出国就是为了所谓的向上流动的中国梦，这个中国梦，是不是就是一个不认命的梦？

项：对，中国梦对很多人——对出生低的普通人来讲，确实是一种不认命。或者说是一种很积极的、幻想的、热情奔放的逃避主义。是对自己的“命”的逃避。这种逃避，呈现出一副咬牙切齿的奋斗精神。

问：“不认命”，像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感觉，这是不是和美国梦差不多了？

项：和所有人都可以当总统的美国梦有点像。美国梦当然是一个巨大的谎言，但是它对等级是没有很强的、发自内心的尊重。但是中国梦呢，我们对既定的等级有一种敬畏。我们吹牛说看到哪个官怎么摆谱，谈得非常津津有味，都是仰视。梦里想的是“取而代之”，而对怎么奋斗、创新，其实大家是不太关心的。比如说在美国梦的谎言下面，小孩子跟家长聊天，说我崇拜一个人，那要说是因为这个人做了什么东西。但中国家庭，在同样的话题下，我的感觉是很少有人会注意到“贡献”这个问题。大家更多讲那个人买了什么车，买了什么房子，家长也是这样。在中国梦里最牛逼的人是什么人呢？是不付出努力而能够得到很多的人，这是最高目标。

其实很多大学生、搞研究的也是这样。都说这个大学、那个学者厉害，但是如果我们问他，这些大学、学者到底做了工作，有什么贡献，和你现在要做的事情有什么实质关系，不一定能讲清楚。都是抱着五颜六色的泡泡在飘，都想挤到大家认可的泡泡里来。而不是去想这个系统是不是合理，该怎么去改变。

当然，大家这么想，首先是因为觉得改变系统太难了。做了贡献不一定得到回报，又何必谈贡献。但是，这些泡泡在飘着，也是因为我们在抬举它。我们至少可以在心理意识上把这些泡泡戳破，让它们掉到地上来。至少可以开始学习怎么从我今天做的事情出发，来看这个社会是怎么构成的。未来总是从现实里长出来的。不先把现实是怎么回事搞清楚，等未来真来了的时候，它可能就是一头怪兽。

三

问： 现在的人希望工作是一个“洞”：跳进去是无产阶级，跳出来是小资。而讲到无产阶级，尤其是东北的无产阶级，最近看到很多讨论。比如贾行家在《一席》的一篇演讲，里面提到原先工人阶级的“主人”身份，那个年代显得很美好。后来一切都一下子垮了。如果说社会主义是好的，单位制度是好的，工人是主人翁，那为什么这一切迅速消失了？东北为什么从发达的工业化变成了赵本山代表的滑稽的农村？

项： 东北的形象很有意思，从“共和国长子”——最高的科技水平，最典型的社会主义形象，一下子就变成了喜剧化的、带一点黑色幽默式的调侃对象。

我们怎么理解东北本身的衰落？首先一个问题是：东北企业的工人是不是我们原来理解的工人阶级，是不是充满了政治和社会的主动性，具有先进性，能够自我组织、自我管理，带领社会前进？我是存疑的。因为东北的工人群体，是国家塑造出来的，是通过体制安排形成的职业性群体。

在当时的生产过程中，确实发生了很多值得我们今天记住的实践。比如说改革之前的很多企业，车间里的各种事情都是直接民主评议的，评先进，你够不够格评上，大家会把够的不够的地方都当面说出来。不需要无记名投票。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一个干部要腐败，确实很难。但是，一旦体制环境开始变化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工人群体是非常脆弱的。他没有办法形成一种体制的、集体性的抵制力量。

90年代初，国有企业开始改革，内部就比较乱了。如果你在 90 年代中后期去大型国有煤矿，你会发现大概有 10% 的工人根本不用上班，但是照样拿工资。这是为什么呢？只要你跟井长、段长搞好关系，就可以这么干！同时，井长、段长可以公开和某个工人讲：这个月我从你这儿“贷” 100。他的意思就是在你的工分上做手脚，把你的工资扣给自己。

我再举个例子。我们觉得矿工理应是最团结的。但矿工告诉我说，他们在井上都是哥们，抽烟喝酒，但是穿上井服下了井，就是六亲不认的，你在下面干不了活没人帮你，因为别人帮你，别人就少干了，就少挣工分了。

（所以）体制环境一变化，内部的腐败、浪费就很难抵制了。等到一下岗，这么大的工人群体就一下子瓦解了。 这个脆弱性，我觉得是值得反思的。

东北以一种悲壮的方式被喜剧化了。我觉得我们可以记住两点，一是那种乌托邦式的人际生活和生产关系是真实存在过的，这是一种真实的可能性，也是我们的财富，这一点不能被忘掉，不能被喜剧化。第二是当时那个工人阶级至少不是马克思所说的工人阶级，不是先锋队，而是体制下面构造出来的一个附属性的群体。

问：所以说下岗的时候，工人并没有作为一个阶级去行动？

项：对。在当时有不少游行和社会不稳定因素，但以东北那么大规模的下岗，过程是非常平稳的。

政府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我概括为“兜住—消化”。“兜住”是说以不出人命，不出大事为基线，给一些基本的保障。“消化”就是把社会问题在不给明确结论，不给明确说法的情况下给你消解掉。

对于下岗工人的消化方式是什么呢？当时不是说一下岗就回家，中间有个过渡过程，你有几年在再就业中心，接下来几年到社区上拿低保，是一个逐渐的过程。然后鼓励你去买房子，让你中间一部分人变成小业主。这样慢慢把下岗工人消融到普遍的社会底层群体、弱势群体里面，再慢慢地就消融到普遍的城市人口里面了。原来的自我意识消解掉了，这样社会矛盾也就没了。

其实中国历史上有不少的的“失意者”和“消失者”，比方说“右派”、“文革”中的受害者等等。但这些受害是有很强的政治性的，无论他们平反不平反，都有政治性的说法在那里。而东北的改革，代表着中国改革开放中一个很重要的、新的历史现象，它的要害是：在不给说法的前提下，把问题慢慢用很细微的方式给你消化掉。

今天东北的下岗工人，可能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面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忧郁的幽灵”。它不是 “怒鬼”，因为它已经被消化了。但是它忧郁，因为它的非正常死亡没有一个“说法”。这并不是说当时忘了给说法，而这就是市场化改革中一种很重要的策略：拒绝对这件事做一个政治性的结论。

下岗的时候，社会上的评论基本都是说下岗工人很“惨”。但我们很少去考虑，他们失去的究竟是什么？ 他失去的其实不仅仅是一个稳定的物质生活来源保障，而且是一整套生活方式、生产方式，那种文化，那种民主评议这些东西。有过那样几十年乌托邦经历的人，一下子就变成了很惨的、需要帮助的人，历史一下子给切断了。

今天上楼买车，是补偿不了那种社会关系的。当时你每天去工作，觉得自己在建设一个大的东西，朝气蓬勃，那种感觉跟你作为个体消费者获得的快感，是很不一样的。 我们今天的存在意义是看我们消费了多少资源，而不是说我们建设了多少东西。那种建设意识下的感觉，那种失去，当时很少有人去讲。

失去不是一个简单的从有到无。不能说一个离了婚的人，就和她从来没有结过婚一样。如果对失去了什么讲不清楚，我们也就讲不清楚我们获得的是什么。我们获得的东西可能会让我们害怕。今天谁在讨论二十年前的下岗？不是下岗工人自己，而是在这二十年里发展得不错的中产。他们想起下岗，是因为他们在房子、汽车、出国旅游的奢华里看到这个忧郁的幽灵。这个幽灵在今后可能会不断重现。

四

问：有人谁这个幽灵已经对现实造成了很大影响。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有很多人提到“锈带”，提到衰落的工人阶级。另一方面，另类右翼的论述会说，过去曾经有一个时间，大家是“做大事”的，但后面这种事业感消弭在市场环境下了，“Make America Great Again”之类的口号，也就是要恢复这样一种“做大事”的感觉。那么像东北这样的失落，会不会也召唤出这样的政治变化呢？现在说“不忘初心”，似乎中国也开始试图把市场化中间丢失的一些东西“捡回来”，我们该怎么看这种趋势？



图片来源：Washington Post

项：美国有“美国第一”，要把美国重新做强等等，英国也有类似说法。最明显的例子可能是日本的极右分子，现在日本政治的“右转”和这种心态有相当的关系。他们觉得日本的左翼谈太多战争反思了，把日本这个伟大的民族贬低化了，他们也觉得市场和消费主义把日本的年轻人全部变成没用的了，所以他们提出要重塑“大和魂”等等东西。

这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共同点：大家不仅要回到光荣，还是要回到过去。他的光荣是以过去来界定的，是一种对现在的不满，但缺乏对现在的分析，也不知道未来究竟怎么去做。比如日本右翼要回到明治时代，普京要回到苏联时代，美国要回到里根时代，英国要回到殖民主义时代，中国据说要回到唐代。

这些是很臆想型的谈法，不是一个方案。而且这些都是国家层面的东西，老百姓能够参与多少？我们今天要谈建设感，谈做大事，必须有日常生活的角度。构建伟大民族、以民族为单位的复兴，这些口号我倒不一定觉得危险，但是很空洞，它的空洞性超过了它的危险性。

“不忘初心” 这个提法很好。但是一定要搞清楚“初心”是什么。什么是当时的根本目标，先进分子们牺牲生命去追求的那些东西，什么是在当时的国际国内条件下采取的临时手段。否则什么事情都往一个口号上套，口号和老百姓的现实感受越离越远，日常交流变得很无聊，更把“初心”搞得很模糊。

五

问：在这样一个时代，知识分子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对过去失落的幽灵的缅怀，很多时候都被脱欧、特朗普这样的政治力量吸收了。比如说到现在为止，已经有无数文章讨论过特朗普的语言如何空洞，但你去告诉民众说你们的梦想是空洞的，那大家会说，你告诉我什么是现实的？知识分子如何避免这种“纸上谈兵”的感觉？



图片来源：inthesetimes

项：反思这些年的问题，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多说接地气的话。空洞口号的盛行，一定是有它的现实基础的，它反映了某种现实需求。知识分子可能花了太多精力去“解构” 空洞口号，而没有把空洞口号的现实基础讲清楚。中国一些年轻人从 90 年代开始谈“崇高感”。这是很真实，也很可贵的想法，不能简单地把它处理为幼稚，但是它也确实比较容易被空洞化。知识分子可以做的，是接着他们对“崇高感”的追求往下聊，看看怎么可以贴着地皮、从普通人的行动里生发出崇高的意义。接地气的话说得好了，空洞的套套自然会瘪下去。

现在我们面临的一个很大挑战是知识分子自己的话语也空洞化了。特朗普这次的胜利，以及 2016 年发生的这些事情，说明我们原来很多启蒙时代以来的信念、信条，尽管在理论上是没有被驳倒的，但是它们和今天事实生活的距离已经差得很远了。

讲得具体一点。其实一直有两个美国，一个全球美国，一个地方美国。全球美国是各类精英、国际大企业等等把持的美国，他们不支持特朗普。它下面有一个地方性的美国，很多人没有护照，不知道巴勒斯坦和巴基斯坦是什么关系。这两个美国整合起来，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帝国，一个支配全球的政治实体。奥巴马怎么把这两个美国整合在一起？他是用一些进步的语言和价值，比如人权、人道，以及像奥巴马医保这样的政策。特朗普很大意义上是在重新调整这两个美国之间的关系。他当然不会放弃全球美国的军事力量和它占有的资源、市场，也不会放弃美国的全球企业的利益。但他不用人权、多元文化等等的话语协调这两个美国，而是用种族主义的、简单粗俗的国族主义来嫁接地方美国和全球美国。

这是我对特朗普上台的理解——地方美国对全球美国的反叛性的表达。所以在我看来特朗普的胜利没有那么糟糕，它只是把另外一面的美国展示给我们而已。

对知识分子的教训是什么呢？是我们那些文辞，那些经典的启蒙时代的话语和信条——我不是说要放弃那些——和我们实际生活已经有相当大的差距了。日常生活里有很多纠结和矛盾，在持续着，靠着理念上的那套经典东西解决不了。法国这么一个共和主义深入人心的国家，一直说“只要你认同共和主义，就是法国人”，不问肤色、性别、阶级等等。但是你看法国现在的族群矛盾，可能比英国还要深刻。

这些日常生活中的矛盾，看上去丑陋、龌龊，让你不快，同时它又很纠结、很“坚硬”。你当然能够高高在上地对这些现象给出一个自圆其说的说法，可以批判，但是那个问题还在。我的看法是，你不要忙着想怎么把这些现象消解掉，先要想着怎么和它开始有效地对话。

所以知识分子能做的，不光是用一个大框架去和特朗普辩论，而是把基层的，日常的生活逻辑重新整理，到它里面去理解它。如果真像我说的那样，特朗普代表了“地方美国”，那特朗普这个症候反映了全球社会构成中的一个结构性问题。你和特朗普较劲，能起什么作用？

问：如何既突出问题的复杂性，又用大家听得懂的语言表述？

项： 主要是你要能扣动人们的心弦。你讲的东西要能够触及到大家内心的纠结、投射到大家的生活经历去。突出问题的复杂性，不是故意要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而是因为现实本来就是复杂的。这里的关键是精确。注意到复杂性，其实是要对形势有个精确的把握。一旦精确了，几句话点破，就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和反思。

这需要很细致的观察去把握。比方说族群冲突，可以说得很简单，人权、平等这些概念，大家都会接受，但它解释不了很多人心头的块垒。族群矛盾，肯定是同时包含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等等因素，那肯定是复杂的。先要把这些复杂性吃透，然后在中间找那几个牵动全身的关键穴道。要打通问题的经脉，光靠理论的推理不行，要望闻听切，要泡在问题中间，要去悟。

这也意味着我们需要新的语言。举个中国的例子。我们前面说到“认”，讲到“认命”、“认输”。像“认”这种说法，也许能够成为我们新的分析语言。比如说有些出国的人告诉我说：“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不服”、“不认”，要坚持做下去。但在另外一些时候，他们花了很多钱，但是到了最后没有结果，他们就说“我认了”。所以“认”不是简单的接受，它是经过反思而形成的决定。“不认”也不只是不同意，它意味着要斗争，意味着坚持。有的“认了”是表示算了，到此为止；而有的“认了”是表示重新开始，像“认命”。那老百姓是怎么反思的？用什么样的原则达到认还是不认的结论？中间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如果我们分析好这些概念，再配合上一种好的写作方式，也许就可以把“认”的问题讲到底。这当然提不出什么解决方案，但是这让大家能够看到自己，意识到自己的生活状态，明白自己在整个体系里面处于什么位置。帮助大家变成自觉的人，帮助培育这种自觉的能力，应该是我们的一项重要工作。

我这些日子想的一个事是，我们要有意识地去探索新的思想生态系统。从书本上来的是信息和理论，是帮助你思考的工具，而活的思想，需要实践、交往、交流才会出来，所以它需要一个社会生态系统。

学者、媒体人、作家、艺术家、搞教育的、搞社会运动的，要更紧密地合作，要打成一片。艺术有力量，是因为它吸取了学者的思考，它以直观的方式把思想传递出去，这样又激发新的思考。这些工作在本质上没有太大差别，都是在拷问人生的意义。过去是人为地把它们隔开了。人的感知、人生的意义一定是多个面向的，所以只有打通隔阂、打成一片，才能更好地让我们觉悟人生。

本文原载于开端文化，由项飙老师授权土逗公社转载。

访谈:任其然

美编:黄山

# **用生殖器串联的政治家族，一个小县城的官场现象**

2017-04-13 19:02 陶方宣

<http://www.sohu.com/a/133770319_619192>

大概在五年前，我在《南方周末》上看到对北大博士**冯军旗**的一篇文章，暗自吃惊。冯军旗对小县城官场生态的研究让我从动物学、植物学、人类学角度进一步认清了中国社会。因为在中国，腐败就是我们的生活常态，是日常生活的一部份，甚至是我们生活的全部背景。

我在这里补充一点：“家族姻亲”用一句刻薄的话来说，就是用生殖器串联起来的，因为通婚是它存在的前提。所以我将此文标题改为：《小县城：用生殖器串联的政治家族》。其实新野县只是中国一个缩影。

三国时期，刘备屯兵新野，曹操派兵清剿，诸葛亮在这里放了一把著名的火，史称“火烧新野”。这个偏处一隅的农业县再度出名，是因为最近一个北大博士的学术论文披露的——21个政治家族把持了该县几乎所有的政府部门。

发现这一现象的，是一个叫冯军旗的社会学博士。他在新野挂职县长助理，深度访谈了数百名官员，最终写下一部长达二十万字的学术论文，名为《中县干部》，对中国县乡干部任用升迁体制进行细致研究，被认为触及了政治领域最核心的地带，但最终引起关注的，却是政治家族。

作为中国县域政治的缩影，新野政坛的21个政治家族，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他们形成了怎样的生态和控制模式？作为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冯军旗面临着一个两难选择。

冯军旗的《中县“政治家族”现象调查》在《南方周末》上发表，这篇只有5000余字见报文章，只是其二十余万字博士论文《中县干部》的一个章节。尽管该文隐匿了具体的人名和地名。但好奇的网友很快就搜索到，文章作者冯军旗在北大攻读社会学博士期间，曾在**河南新野**挂职锻炼，担任过上港乡副乡长和新野县县长助理。

新野隶属南阳，与湖北襄樊接壤，拥有98万亩土地和78万人口，是传统的农业县，棉纺织业是其经济支柱。新野共有副科级以上干部1013人，其中副科680人，正科280人，副处40人，正处5人。从籍贯上看，正科级以下基本来自本县，副处级以上多为南阳其他县人。

在这个副科以上干部刚过一千的农业县，具有血缘和婚姻关系的政治家族就有161家，其中，产生5个以上副科级以上的大家族21家，5个以下2人以上的小家族140家，这就意味着每十个干部中至少有一个背后有家族势力，有20%的干部属于官二代。

公众开始聚焦的情况下，新野县委宣传部长潘自钦紧急赴京面见冯军旗，希望冯暂时不要接受媒体采访，已有部分政治家族成员给冯打电话，称压力很大，希望冯能体谅苦衷。

35岁的冯军旗为河南汝南县人，2005年考入北大攻读社会学博士。2008年3月开始在新野挂职担任县长助理时，新野为其配备了一个单独的办公室，一辆汽车和一个秘书。冯军旗得以进入新野权力核心，平均每天要让秘书通知三个以上的官员到自己办公室座谈，对于比自己职位高的县领导，冯是到对方的办公室谈。返回北大时，冯军旗的两个大箱子装满了访谈材料，在数百个访谈对象中，有包括县委书记在内的161个党政一把手。

2010年8月，冯军旗进入当代中国研究所工作，将近30万字的论文初稿给了《南方周末》，该报最感兴趣的是其关于政治家族的章节。但冯并不想让这篇论文尽快见报。直到今年，地方政府进行换届，新野县委书记方显中上调南阳市任职，另有干部交流到其他市县，冯才同意发表该文。冯军旗说，网友对号入座后，学术论文变成了变相曝光，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我很纠结，新野养了我两年，有感情在。”冯回绝了大多数媒体的采访。

**姻亲葡萄藤**

冯军旗能搞清楚161个政治家族图谱，除了参阅《新野县志》，《新野年鉴》和《南阳干部名录1949—2000》等资料外，还受到了两个思想开明的干部世家子弟的帮助。

新野21个政治大家族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张家。冯论文中的张家核心人物张泰康，实际是新野原组织部长，政协主席张以彬的化名，张以彬后来在唐河县当过县委书记，从南阳地区劳动局长的位置上退休。其妹张秀彬也做过新野的副县长和政协主席，妹夫则为卫生局长。

张以彬有8个子女，儿子张新生现任南阳海关关长，大女婿张德宝为南阳市旅游局长，二女婿贺利民是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四女婿王庆为宛城区区长。其妹张秀彬的儿子是南阳市急救中心主任，儿媳为宛城区工商局副局长，儿媳的父亲也在新野当过县委副书记和政协主席。张以彬大女婿张德宝的父亲当过新野县城关镇教育组长，妹妹张平岚现在是新野县纪委副书记。

新野张家出来的副科级以上干部有22人，其中一半在南阳市，一半在新野。另一大家族王家的第二代中，有现任的南阳市政府副秘书长，新野县政法委副书记，人大农工委主任，航运局局长等。

除了21家大家族，还有15家4人型，35家3人型和90家二人型小政治家族，这161家政治家族几乎把持了新野大大小小的政府部门。今年，政治家族子弟有向纪委，组织，公检法，县委办等核心部门聚集的趋势，同时向外部延伸。由血缘和姻缘编织的关系网络能延伸到南阳，河南省会郑州，甚至北京。

利用姻亲关系编织关系网是新野官场的通常模式，一个流传甚广的经典例子是：王城（化名）最初是县政府的通讯员，当时县政府一女话务员和县长关系密切，王城千方百计接近她，最终娶了女话务员的女儿，由此和县长接上关系。王随后被提拔上政府办副主任，然后出任某局局长。

在局长任上，王城给常务副县长的侄女安排了工作，并鼓励侄儿和该女谈恋爱，成功联姻。常务副县长对王城关照有加，最终让王出任了具有更大晋升潜力的某镇党委书记。

新野在解放后的第一代干部中，以部队转业和工农出身为主，由于子女和姻亲形成了政治家族。对于“政治元老”来说，帮助下一代取得干部身份是第一步，接下来是通过关系网不断介绍子女情况，以提拔重用，冯军旗同组织部长座谈时，就几次遇到“老干部为自己的子女仕途说情”。

南阳组织部一官员如此理解政治家族的形成：“就像葡萄藤一样，顺着架会越长越大，越长越多，同时阳光和水分也更多。”

新野政治家族存在如下**特点**：

一，不少都是行业内或者系统内繁殖，具有一定的世袭性，比如岳父当过某乡书记，他的女婿后来也在该乡当书记，姐夫和内弟都在组织部副部长的位置上干过；

二，副处级以上的县领导子女一般至少有一个副科，不少还是正科；

三，政治家族的大小和家族核心人物的权利和位置成正比，核心人物权利和位置越重要，家族内出的干部也就越多，同时和后代数量也成正比，后代越多，家族内出的干部也越多。

政治家族最大的问题是形成了地方利益集团和势力集团。该县一位主要领导经常感叹很多措施执行不下去，原因就是地方利益集团的阻挠和反弹，很多时候投鼠忌器，极端的时候自己都可能翻船。

**家族子弟和“局外人”**

政治家族的垄断，令平民出身的干部的不公平感与日俱增。冯军旗考察新野官场得出的规律是，普通干部由股级到副科需要8年，从副科晋升到正科需要3年，从正科晋升到副处需要7年，从副处晋升到正处需要7年。

也就是说，1名22岁毕业的大学生，三十岁成为副科，33岁成为正科，40岁成为副处，47岁成为正处，然后在正处岗位上再干几年退休，只有极个别的能成为副厅级干部，这就是大部分县乡领导干部的政治生命历程。

但这只是理想的状态，现实中能实现这一历程的官员屈指可数，熬了几十年才混到一个虚职副科职位的大有人在。一位1983年参加工作干部用了20多年时间，只是把乡里的各种委员干了个遍，而一同上班的政治家族子弟早成为副处级，进入领导核心。

该干部抱怨，每次干部调整，他都被列入提拔名单，但“总是被有背景的人顶掉”，一开始，领导会安慰自己还年轻，以后有的是机会，后来又拿出如“群众基础不够”等借口，意指需要花钱跑要才能调整职务。

据传新野官场的行情是，根据升迁级别的大小从1万元到5万元不等，即使跑送无背景的干部也不会调到理想职位，基本在虚职圈内打转，比如从宣传委员调为组织委员。

乡镇副科升到正科有8个隐形阶段，从小到大依次为：综治办主任，工会主席，人大副主席，乡镇长助理，武装部长，党委委员，副乡镇长，乡镇党委副书记，很多平民子弟会耗尽半生都走不出这八个阶梯，而干部子弟基本能够通过“小步快跑”跳跃到正科位置上。

正科向上升迁的通道是副处，这里又依次排出县政府党组成员，县长助理，副县长，统战部长，宣传部长，政法委书记，组织部长，纪委书记，常务副县长，县委副书记等十几个隐形阶梯。

有背景的政治家族成员可在短短几年内完成跳跃，最后异地调动在另一县担任正处实职（书记，县长，人大主任，政协主席）。而平民子弟抱怨，这道大门几乎已对他们完全封闭了。政治家族子弟仕途上的畅通，使得平民子弟干部感觉不公平。一位乡干部第N次失意后，将自己关在书房内，整整一天都在苦练书法，未曾进食。

以下是政治家族子弟的**晋升实例**：

李姓官员有二子，长子初中未读完辍学，被安排到检察院当司机，干了几年后又借调到财政局作一般工作人员，在这一期间，李又运作关系更改了儿子的档案，花钱买了个大专文凭，用聘干的指标将其转化为干部身份。因为新野人都知道其只上过初中，就将其调到南阳市，从某区办公室副主任一路干到现任区长。

李的次子中专毕业，通过研修大专的方式取得了干部身份，先安排到一个乡当一般工作人员，经三年历练，作为第一梯队推荐副科人选，进入干部圈子，后借调南杨某市直机关。几年之后，回新野担任一正科实职不在话下。

上述运作模式，可用一句经典的新野土语进行概括——“磨活”，意指多方运作，穷尽关系网而求得上升。

**日薄西山**

近期的河南肃贪风暴中，新野一批科级干部落马，官场地震一触即发。

冯军旗的论文见报之前，新野副县长高志科，市政公用事业管理局局长程文和曾当过六年财政局长的纺织集团副董事长高照阳先后因违纪被“双规”。

坊间相传，程文的落马和人民路改造工程有关，该工程预算3000余万元，完工时实际花费达到8700万元，在这一过程中程文通过弟弟程雷和具有涉黑背景的商人樊小超进行合作，并从中牟利，程文被“双规”后，其弟程雷和樊小超均被控制。

一个官员的倒台，往往伴随的是其家族势力的瓦解。几乎同一时间，原新野县组织部长，已经调任内乡常务副县长的李玉芬被“双规”，她涉入开封组织部长李森林案。冯军旗曾经访谈过新野的10个女性正科级实职干部中，几乎每一个都出身政治家族。

耐人寻味的是，作为女性政治家族成员的佼佼者，李玉芬在接受冯军旗访谈时曾说出惊人之语：“我跟你说，在家庭和事业方面，没有一个女人能处理好的，女人干事业都患得患失。我最后的观点就是女同志要过女性式生活，青春愉快，养尊处优，不宜从政。”

一个趋势是，政治家族在新野县呈现逐渐衰落现象，计划生育政策是根本因素。新野第一大政治家族张家，家族庞大的原因就是子女众多，但现在干部群体严格执行的“一孩化”计划生育政策，对政治家族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另一个原因来自干部交流制度，异地任职对于打破政治家族网络，起到了很大作用。再者就是就业观念转变和高等教育的普及。

1980年代，很多新野干部千方百计回家就业，不愿意留在大城市。现在他们的子女就业时，则是千方百计留在大城市。随着干部子弟逐渐选择中等以上城市就业，新野的政治家族可持性的继承传递逐渐消耗，将融入更大范围内的体制系统。

在《中县干部》的扉页上，冯军旗为中县（新野）的干部写了一首小诗，题为《蒲公英》：

中县的天空

飘满了蒲公英

飘着的，是命运

落下的，是人生

新野的政治家族也像一朵蒲公英，在眼下大陆的整个政治和社会体制变迁的天空中飘动。落在地上的，则是那些没有关系的平民公务员。

**补充事例：**

**1**.有关吃吃喝喝：冯军旗首先到一个乡挂职副乡长。他下到乡里后，接连两周时间，乡里领导班子的十几个成员轮番为新到任的副乡长接风，酒量只有一两的冯军旗吐了半个月。有人偷塞给他两盒“速效救心丸”和“丹参滴丸”，并解释说，这是“官场必备良药”。

**2**.这才有个“官样”：在好心人的提醒下，冯军旗特意买了两件有牌子的衣服，同事笑着说：“哎呀，冯博士你这个穿着才像副乡长嘛！”次年改任县长助理，他迎来了一个秘书、一辆黑色的桑塔纳3000轿车以及一套100多平方米的三居室。官员应该是什么样？

**3**.关系背景的较量：某乡党委副书记通过曾任政府办主任的公公做了县委书记的工作，但竞争对手却将招呼打到了同省的更高领导那里。落败后的她说道“我真是政治上不成熟，不知道潜规则的重要性，认为光从下面推就行了，没想到还需要上面有人拉你。”官员职务晋升历来都是个变数，在没有最后敲定之前，就可能发生令人无法想像的N种变化。

**4**.越活越年轻：有一次，冯军旗与一个科级干部聊天，当问及年龄时，这个干部脱口而出：“你问我档案年龄还是真实年龄？”按照简历上的年龄倒推，这位干部9岁就当上了民办教师。在年龄与岗位挂钩的硬性标准之下，官员让自己越来越年轻，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和趋势，从与坦荡的一问一答中可以发现，更改年龄已经成为官场公开的游戏规则。

**5**.有关党员身份：相比于年龄“杠杠”，党员身份更是为官必不可少的基础。在中县的官场中，70%以上的县领导在25岁以前就已入党，而非党员干部普遍被视为“政策官”，不但没有车子待遇，还受排挤。

**6**.有关文凭：年龄要合格，政治要过关，学历当然也要过硬。在中县，各级党校被很多干部戏称为“文凭批发基地”。被称为“中专一代”的正科级一把手们，大多从这里取得在职教育的本科文凭，为升迁“扫除障碍”。

**7**.管钱管物是实权：冯军旗对中县近10年来的副处级升迁轨迹观察发现，不少县委县政府领导都是从乡镇党委书记中产生，却没有一名是从县直机关一把手中产生；在一次干部调整中，一位到民政局做副局长的财政局党委委员就大倒苦水，说某领导把他踢出财政局，是“往死里整他”。管钱管物的位子，拥有着比别人更为优越的地位。

**8**.书记的权威：在现行体制下，县委书记的权力高于县长。中县有人戏称，只有县委书记算官，别的都不算官。2008年冯军旗初到乡里的时候，每逢时任县委书记视察，乡政府的领导班子都要列队欢迎。有旁观者感慨：“咱们中县的皇帝来了。”在中县，如果县长接任不了县委书记，那他的仕途就算到顶了。当地管这叫做“没干成”。

**9**.别惹“一把手”：中县有一个叫张南国的中县公疗医院前院长。一次在路上看到为农业开发计划而栽的苹果树，张院长随口说：“陈书记真是胡球整，咱们县气候能长苹果吗？”几天后，这句话传到了时任县委书记陈遵义的耳朵里，陈当即叫来卫生局长，限他在3天内免掉张南国。

**10**.送礼的学问：一次，计生委的一位副主任升任其他部门的一把手，冯军旗前去祝贺，发现他的办公桌上摆满了罗盘、地球仪、铜牛等礼品。后来，冯军旗才知道礼物各有寓意：罗盘象征掌好舵，地球仪象征前途远大，铜牛则象征稳健及对麻烦制造者的威慑。每逢中秋或春节，县领导们便摇身一变成了送礼者，去市里，去省会，甚至去北京。在这些“常规动作”之后，真正的关系运作往往发生在晋升之际。

**11**.血缘与姻缘构筑防火墙：冯军旗在深入调研后发现，在这个副科级及以上干部仅有1000多人的农业县里，竟然存在着21个政治“大家族”和140个政治“小家族”。在这个庞大的“政治家族”网络中，一些秘而不宣的潜规则变得清晰可见。有的官位“世袭”，或是几代人，或是亲属连续稳坐同一官位；有的裙带提拔，凡是副处级及以上领导干部的子女，至少拥有一个副科级以上职务；普遍的规则是“不落空”现象，干部子弟们的工作会随着单位盛衰而流动。更为可怕的是，政治家族之间并不割裂，往往以联姻或者拜干亲的方式不断扩大，“几乎找不到一个孤立的家族”。

**12**.反腐，只收不送：冯军旗在对1993年以来中县被查处的正科级及以上干部名单进行统计后，他发现经济问题占了干部问题的一半以上，但蹊跷之处在于，其中却没有一起涉及跑官卖官问题。

**13**. 有关作风问题：冯军旗在调查中发现，中县1950~1978年查处的干部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是作风问题，而近年来一个有趣的演变趋势是，实际发生越来越多，但被查处的越来越少。自2005年以来，中县没有一名干部因为作风问题被查处。2000年，大门镇人大副主任状告镇长将其强奸，司法机关最终的判定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14**.不得志的“圣人蛋”：两年的调研让冯军旗深感困惑，“越是与干部晋升有关的制度，越是失灵和异化。明规则与潜规则并存，大家心照不宣。”他对一个郁郁不得志的县委党校副校长印象深刻。这个“明显被边缘化”的干部痛恨腐败，还常在公开场合抨击官场弊端。在私下，干部们不屑地称他为“圣人蛋”。

李北方：《软埋》要埋葬的是什么

*[http://www.wyzxwk.com/Article/wenyi/2017/03/377104.html](http://www.wyzxwk.com/Article/wenyi/2017/03/377104.html" \o "http://www.wyzxwk.com/Article/wenyi/2017/03/377104.html" \t "https://xueqiu.com/5674464747/_blank)*

****《软埋》说了些啥****

　　《软埋》首发于2016年的第二期《人民文学》杂志，2016年8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小说发表后迅速引来了评论界的大量好评，获得了2016年度“华文好书”评选的评委会特别奖。

　　小说的标题很讨巧，“软埋”是个方言用语，大部分人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容易产生了解的兴趣。什么叫软埋呢?是指人死之后，不用棺椁，直接埋土里。按小说的叙述，这应该是川东地区的一个说法，在那里，老百姓认为，被软埋者是不能转世的，所以人们都害怕被“软埋”。

　　《软埋》处理的是土改的话题，故事的核心是川东地区的地主陆子樵一家被软埋的经过。但小说是从当下写起的，整个叙述通过一个名叫丁子桃的女人展开。

　　丁子桃原名胡黛云，本是川东一个大户人家的大家闺秀。胡家和陆家关系不错，胡黛云的父亲胡如匀和陆子樵是留学日本的同学，回国后，陆子樵参加了辛亥革命，胡如匀则直接回家过起了舒服日子。胡黛云打小就认识陆家公子陆仲文，水到渠成地恋爱结婚，成了陆家的媳妇，生了个儿子，小名叫汀子。

　　在土改中，胡黛云的娘家被批斗，她不知道为什么正好回了娘家，赶上了。胡如匀为了保护女儿，想了个办法，让她当众跟家庭决裂，以求自保。胡黛云不但听话了，还听得比较彻底，在斗争会上把她爹推了个跟头，还打了她二娘——胡大老爷的小老婆——一个嘴巴子。于是她成功地在批斗会后脱身，但走的时候后背被砸了一枪托。

　　胡家的其他人就没那么好运了，都死了。胡黛云的二娘和嫂子还被点了天灯，惨叫了三天三夜。

　　随后，陆家也面临被斗争的危险。陆子樵是个吃过见过的人物，参加了辛亥革命，解放军来了，又在剿匪中立了功，还主动顺应新社会的潮流，决定把出家产的一半来做慈善，总之是一个开明地主的形象。全村人感念陆老爷的恩德，联名保陆老爷不被批斗。

　　但好死不死，原来跟陆家有仇的一个佃户的儿子回来了，而且是以革命干部的身份回来的，并参加了当地的土改工作组，他坚持要斗陆老爷一家。陆老爷这样的人物怎么能受这份委屈呢?于是他把全家召集起来，吃了顿最后的晚餐，宣布先在后花园挖好坑，然后集体服毒自杀的决定。胡黛云不能死，她的任务是把其他人都软埋了，然后带着汀子从暗道逃走。

　　陆家暗道直通一条河，在陆家长大的富童在那里等着胡黛云娘俩。富童当时对陆家集体自杀的事情还一无所知，当他得知他的心上人，丫头小茶也自杀了，就跳下船，游回去救小茶了。船失去控制，撞上石头，翻了，孩子不知所踪，胡黛云顺水漂流，后来在湖北境内被人救起。醒来后，胡黛云就失忆了。

　　救活胡黛云的大夫叫吴家名。因为她什么都忘了，只会本能地念叨汀子汀子，吴家名一抬头，恰巧看到窗外有棵桃树，就据此她重新起了个名字，丁子桃。待她身体恢复差不多了，还介绍她到一个名叫刘晋源的高级军官家里做保姆，说那里安全。

　　后来，因为机缘巧合，吴家名和丁子桃在刘晋源的撮合下结婚了，生了个儿子，起名叫吴青林。吴青林大学毕业后，进入房地产行业，公司老板恰巧是刘晋源的二儿子。

　　吴青林是《软埋》中另一个推动情节发展的关键人物。吴家名早逝，幸好吴青林能干，也孝顺，挣了钱之后，在武汉买了栋别墅给丁子桃养老。走到别墅门前，丁子桃说，这像地主家的宅子啊，你不怕被分了浮财么?这是且忍庐还是三知堂啊?

　　也就是说，被眼前的别墅一刺激，丁子桃的脑子里闪回了些过去的片段——且忍庐是她娘家宅子的名字，三知堂是婆家宅子的名字。搬进新家之后，受了刺激的丁子桃精神失常了，在呆滞的状态中，那些被忘记了的往事一点点地回到记忆中：小船是如何翻沉的，她是如何把全家软埋的，陆家人是怎么自杀的，娘家是如何被斗争和灭门的，她是怎么嫁到陆家，是怎么成长的……

　　在小说中，丁子桃并没有清醒过来，而是在精神失常的状态下就去世了，所谓记忆的复苏是作家方方以所谓的“上帝视角”写出来的，所以读者无从知道，丁子桃本人找回了记忆没有。丁子桃的这些回忆并没能分享给小说中的其他人物，比如她的儿子青林。于是，吴青林只能自己循着蛛丝马迹去寻找其父母的过往。

　　吴家名死后，留下了一个小箱子。这时，吴青林打开了它，看到了里面有其父留下来的早年的日记。这一看不要紧，原来吴家名也是跟丁子桃一样的苦命人。吴家名本姓董，山西人，也出身地主家庭，年轻时在上海学医。山西是老解放区，土改搞得比川东早，所谓无巧不成书，董家一家也在土改中被灭门了，小董的表弟在小董回家的路上拦住了他，让他千万别回去，他才幸存下来。

　　但不知道为什么，小董坠下山崖，摔晕过去了，被一个在山里采药的姓吴的老人救了。后来俩人又救起了一个被土匪打伤的解放军军官，也就是刘晋源，刘晋源伤愈归队的时候，就把小董带着一起了。小董不敢暴露身份，就起了个化名，叫吴家名。在部队里，吴家名成了一名医生。

　　也就是说，吴青林的双亲有着同样惨痛的人生经历，各自的家人都在土改中被杀光了，二人又不约而同地忘记了这段历史，吴家名采取的是主动遗忘策略，隐姓埋名，从不跟人提起往事，丁子桃则是因为失忆，属于被动遗忘，但时时下意识地抗拒回忆。

　　吴青林在了解这些往事的线索后，开始寻访其母的旧居，正好他的在大学教书的同学龙忠勇研究民居，二人就结伴而行。一找，还真地就找到了陆家老宅三知堂，看到了被软埋了的陆家一家人的坟茔。

　　随着寻访的深入，吴青林退缩了，不想再继续下去了，而是决定回到现实，好好过“地主资本家”(司机给吴青林的定位)的小日子。但龙忠勇对此很感兴趣，继续挖掘这段历史，决定写一本书。

　　以上是按时间顺序对《软埋》故事情节的简要概括。****小说用的是倒叙结构，尤其是对丁子桃爬出记忆的十八层地狱的叙述，从最终写起，一直写到最初，同时穿插着其他推动情节发展的叙事链条。从写作角度看，《软埋》是有点独到之处的****，而这一点是没办法通过概述故事情节传达出来的。

****“新社会把人变成了鬼”****

　　了解了《软埋》的故事梗概，就不难理解这本小说为什么会得到那么多正面评价，也不难理解为什么负面的评价会接踵而至了吧?

　　方方在后记中说，写《软埋》的灵感和动力来自现实中的一个故事。小说中的一些情节也是从真实故事中借来的，比如，丁子桃走到别墅门口时说的那段话，“****这不是像地主家了吗？你不怕分浮财？他们会找上门来的。****”

　　看来生活本身就是艺术，这暗合了关于前苏联的一个政治笑话：****勃列日涅夫把老母亲从乡下接到莫斯科，骄傲地展示自己的豪华别墅、名贵家具、高级汽车。老太太说：“孩子啊，这一切好是好，但共产党来了怎么办？”****

　　这个地方闪现了一丝批判现实主义的光亮，如果光看这一处，我是会欣赏《软埋》的。但光亮一闪即过，全书20来万字，除了这里，全是黑暗。

　　《软埋》的核心是翻土改的案。土改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土改到底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事关20世纪中国革命的正当性。社会主义革命已经被否定得差不多了，再把土改也否定了，GCD的祖坟也就快刨干净了。

　　在方方的眼中，土改“好得很”还是“糟得很”?这是再清楚不过的，她认为土改“糟得很”。****在方方的笔下，陷入呆滞的丁子桃召唤记忆的过程是一个从“十八层地狱”一层一层地往上爬的过程，回忆都回来了，也就从地狱里爬出来了，也就是说，回到地主大院的时候，才是回到了人间。****

　　从写作技巧上，我承认这是个精巧的构思，但这种表达方式等于精巧地说，丁子桃在土改后就一直生活在“十八层地狱”中。

****以前有一句话，“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是新中国建立自己的正当性的主流叙述。方方要做的是，把这个叙述颠倒过来，她写的是一个“新社会把人变成了鬼”的故事。****

　　在“华文好书”颁奖式上，方方直截了当地说，“作家永远会有自己的立场”，这是诚实的;但她接下来又说，她给自己的定位是一个记录者，以客观理性超然的立场来写，这就又不诚实了，等于否定了自己刚刚说过的话，宣称自己没有立场。

　　先看方方的立场。

　　土改至少有当事双方，即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领导土改的共产党可以视作这场斗争的催化剂。千百年来，“耕者有其田”就是中华民族追求的公正。近代以来，地主阶级成了阻碍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最腐朽的力量，从农民身上压榨走几乎所有的剩余，用于生活消费，这就使得中国没有启动工业化的资金。正是通过土改，新中国将被地主阶级占有的剩余转移到国家手中，实现了工业化的起步。

****方方看不到这些宏大的历史问题，仅仅以温情脉脉的眼光盯着个体化的旧地主。****可是，即便从个人的角度来看旧地主，其中绝大部分人也是品行低下的。方方笔下的陆家就是靠种植贩卖鸦片起家的，故而世代不好意思抬头做人，偌大的大宅子只敢开一扇小门。

　　再看方方的所谓“记录者”的自我定位。

　　对《软埋》做正面评价的论者和作家本人都强调作品的现实主义风格，强调这是一本关于记忆的小说。可是，小说里的“记忆”是否是站得住的历史记忆呢?肯定不是。****《软埋》中一共提到了四个地主家庭，结局都是在土改中惨遭灭门****，其中只有陆家的描写丰富一些，其他几个都简单带过。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有些暴力色彩是难免的，但历史的真实是地主阶级都被肉体上消灭了吗?不是的，革命要消灭的作为一种腐朽生产关系的地主阶级，而不是地主家庭的成员，如果像方方说的那样全被灭门了，后来怎么会有以成分划分的地富子弟呢?

****方方说，《软埋》的写作有自己家族史的影子。可是她们家咋没被灭门呢？如果真被灭门了，就不会有她今天朝GCD扔屎的事情发生了。****她在采访中提到，她大姨的命运特别悲惨，她大姨夫是国民政府的南京警察局长，后来逃到了台湾，她大姨在土改时失去了土地和财产，住在乡下祠堂，孩子没能好好读书。也就是说，在方方家族的真实经历中，非但没有因为阶级成分被灭门，而且全家“五个老人六个孩子”全都安然无恙。

　　其实，历史的真实是，地主不但不会被灭门，还会被保护得很好，留着当反面教材，用于激发和培育翻身农民的阶级意识。【关于土改的历史和土改的意义，老田的文章写得又系统又深刻，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即可跳转。】

　　那么，方方的血腥“记忆”是哪里来的呢?无疑是瞎编乱造的。当然了，在文学世界里，这不叫瞎编乱造，而叫做虚构。但这样毫无历史基础的所谓“记忆”还能够称作记忆吗?不能，这是伪记忆。

****因为是瞎编乱造，就会有实在编不下去而漏马脚的地方。****简单举一例吧，在写丁子桃从十八层地狱往上爬，爬到娘家被灭门的时候，方方写了这么一句：

　　前几天闻说她的二娘和她的嫂嫂都被点了“天灯”，惨叫了三天三夜，之后就不知去向。有人说她们被扔到乱岗上了，也有人说她们投了河。(p130)

　　被点了三天的天灯，还能去投河，这就太奇怪了，那为啥不早点去投河呢?那样身上的火就灭了啊。方方女士瞎编已经到了如此不用心的地步了，哪怕写成“有人说她们被扔到乱岗上了，也有人说她们被扔到河里喂鱼了”也好。

　　不但方方女士不用心，连编辑也不用心，这里当作病句也该挑出来啊。

****《软埋》要埋掉谁的记忆****

　　方方在阐释自己的作品时，把“软埋”转意为对历史的遗忘，即小说中的人物吴青林刻意回避，不再去追寻父辈经历的行为。这其实是一个生硬的词意转化，****“软埋”对应的是厚葬，那么什么叫“软埋”记忆呢？难道有厚葬记忆的选择吗？****

　　此外，这种阐释也是虚伪的，在小说中，她安排吴青林忘记，但安排了吴青林的同学龙忠勇不忘记，为地主阶级写书。龙忠勇象征的其实就是方方本人。

　　通过《软埋》的写作，方方要达到的目的不是忘记历史，而是勾起地主阶级的历史记忆，为此甚至不惜伪造记忆;她真正要埋葬(软埋)的，是属于杨白劳和喜儿们的历史记忆。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方方把地主的大家庭写的温馨又和睦，父慈子孝，兄友弟恭，长工丫环忠心耿耿。****胡如匀的小老婆死心塌地跟着胡家不肯被“解放”，陆子樵家的下人宁可跟着东家一块服毒自杀，也不肯迎接穷人翻身的新社会，前面提到过的富童没有死，直到吴青林去寻访的时候，他还在疯疯癫癫地给陆老爷看坟。****

　　如果这个逻辑成立，杨白劳和喜儿就是真傻逼了，去给黄世仁当小老婆多好，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生，那该是一副何等和谐的太平气象。

****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所有的历史记忆也都是关于当代的记忆。方方伪造历史记忆的目的是改造当下和未来，君不见，各方都在呼唤乡绅（乡贤）么？****

****通向美好未来的路怎么走？回到被GCD折腾前的旧社会就好了。就这么简单。可是回去的路上有障碍，那就革命的历史。有障碍怎么办？那就挖呗，把被颠倒过来的历史再颠倒回去。****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

　　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这是党对文艺战线提出的一项基本要求，也是决定我国文艺事业前途命运的关键。只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真正做到了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才能发挥最大正能量。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

　　话音刚落，湖北省作协主席方方女士就伙同《人民文学》杂志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向总书记扔了一本《软埋》。

一句话，现在给地主翻案的，可能善意，可能恶心。要说土改有没有冤假错案，肯定有，地主里面有没有（私德上的）好人，可能还不少。然而地主这个阶级的消亡是必然也是必须，既是为了发展生产力的需要，也是基于最根本的人人平等思想，而现在还鼓吹乡贤的，不是蠢就是坏。

“只要我们稍稍回忆和思考一下，就会明白：法国事实上存在两个“恐怖时代”。一个在感情冲动下进行屠杀，一个是冷漠地、蓄意地进行屠杀。一个只持续了数月，一个则持续了千年以上。一个使千余人死亡，一个则使一亿人丧生。可是我们只是对那个小规模的、短暂的恐怖时代感到恐惧。然而，刀斧在一瞬间带来的死亡，能够比得上饥饿、冷酷的侮辱、残忍和悲痛的慢性屠杀吗？闪电在一瞬间带来的死亡，能够比得上炮烙之刑的慢性屠杀吗？短暂的恐怖时代所填装的棺材，只要城市里的一块墓地就能容纳下了，却有人不断告诉我们要为之战栗和哀鸣。可是，那自古以来的真正恐怖，那种不可名状，惨绝人寰的恐怖，其所填装的棺材，就连整个法兰西也容纳不下啊，却没有人告诉我们要看到这种恐怖的巨大规模，要寄予应有的同情。”

**老田摘史：看看真实的地主家是如何父慈子孝和现世安稳的**

http://news.tuxi.com.cn/news/1038119999990127642/76425268.html

　　看看真实的地主家是如何父慈子孝和现世安稳的

　　老田摘自《霍邱县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

　　第四章：地主庄园李家圩

****引子****

　　李家圩座落在本县马店镇以西约3公里处，是全国闻名的地主庄园。清光绪年间，曾挂过“双千顷”牌(20万亩)。解放前，土地占有面积居全国地主庄园之首，其政治势力仅次于四川省大邑县大地主刘文彩。李氏家族从清咸丰初年(公元1851年)开始发迹，到民国38年(1949)，历经四世，称霸一方，残酷地统治和剥削农民长达100年之久。

[](http://photo.weibo.com/1036292481/photos/detail/photo_id/4106323028477114/album_id/4091696953615717)

霍邱政府网图片，李氏庄园正门

****第一节　庄园建筑****

　　一、选址

　　据民国17年(1928)《霍邱县志》记载：李家圩“咸丰中，首筑寨”。当时掌管李家财产的是李道南、李亚南、李图南弟兄三人，人们背后称他们“大老道”、“二老道”、“三老道”。他们十分迷信风水，在选择建圩地址时，遵循“靠山出人，近水出财，金银都归洼处来”的观念，将圩址定在青山环抱、绿水环绕的平畈中央。背靠银珠山，面对马鞍山，东傍长山，西倚煤山，且有泉水堰、煤山堰两溪，从东西两方汇流圩前，环李家祠堂，绕马鞍山东流入城西湖。风水先生称此处为“藏龙卧虎”之地。

　　圩址确定后，于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开工，动用数百名工匠，同时强迫4000多家佃户为其出工，烧砖瓦、挖濠沟、搬砖石、运木料，劳民耗资，历10年营造，方告竣工。占地70多亩，有房屋430多间。佃农在出工建圩时，被冻、饿、累、体罚致残致死的无计其数。农民王会友和赵大体弱多病，抬不动石头，被李图南用铜管旱烟袋活活打死。百姓说：李家圩是用农民的白骨堆砌起来的。

　　二、布局

　　建国前，站在跑马岗上俯视李家圩、沟堑环寨，吊桥悬空，座北朝南一片青堂瓦舍。仔细看，一寨分三宅、一宅分四院，头门至堂楼一线串珠，五排房一幢高过一幢，真是门庭似海深，一门一道关。

　　每宅头门外，防卫濠宽两丈，深数尺。濠外边巨石护岸，濠内墙用丈余条石自水底垒砌，上接城砖高耸丈余。砖墙上有卧、跪、立三排射击孔。在圩墙的东、西、北三面竖立6个炮楼，突出在墙外。炮楼三面都有枪炮眼，可供射击。头门楼屋顶上五脊六兽，正中间铁打的雄鹰展翅俯冲，呈抓鸡之状。明间“吞金”，两扇黑漆大门，铆钉茶盏大，对联书“凡事但求过得去，此心必须放平来”，伪告世人是慈善世家。门两旁伸出黑洞洞两门土炮，谓之大小“白龙”。门两厢朝南开着石磨大两个圆窗口，加之提起的吊桥和风吹尖叫的栎树，给人黑沉阴森的感觉。头门旁，门朝北两列矮房。西边是饲料库、枪兵舍。东边有骡马厩、长工房。门内开阔地南北宽180尺，东西长140丈。平时在这里训练家丁，午秋二季就成为收租场。

　　二门前圩濠修成荷花池，养有“寿龟”，种植荷花。门楣上描金篆书“天荷仙府”四个大字，显示其“大雅脱俗”。紧靠门前沟坝口立有上马石，在此，武人要下马，文人要落轿。门砧立有狮子卧鼓、张口狮子、盘球狮子三种款式石雕。

　　第二道门楼与第一道门楼的建筑形式基本相同。

　　二道门两边的厢房、耳房，分别用作碾屋、牢房和护圩亲兵以及族门远戚的住宅。三道门内别有洞天，按照封建等级制度设置不同功能特点的楼、堂、厅、阁和偏室、耳房、敞棚。三个院内都设有上下书房，供少爷、小姐读书习字和接待文人雅士，配有精美对联和字画，非常雅致。

　　以柜房为主的庭院，供管家和帐房先生居住、活动，在此存放契约帐册，以及作为接待商旅大贾，交谈经纪的密室。

　　东院三道门内建有戏台戏楼，常年供养一个戏班子(庆福班)，为其一家一户演出。

　　还有接待佃户交租送课人的敞棚，以及存放粮食和其他食品的仓房。

　　四道门内，中、东、西三个院，都在一条横线上，各院都建有大客楼或大客厅，庭院开阔，是宫殿式建筑：五脊挑角、重梁起架;24根立柱，每根直径40厘米;上有挂匾，柱有抱匾，黑漆金字，扯坊下面雕有龙、凤、狮、鹿、象撑拱，饰以彩绘。院内置有花台、花池，专门接待达官贵人和豪绅。

　　在西院四道门内，建有顶礼膜拜、供奉朝廷圣旨的“圣旨楼”，金碧辉煌，雕梁画栋，显得森严肃穆。

　　三个院子最后一进都建有正堂楼，是尊辈长者养尊处优的居室。正中一间供奉着李家祖宗牌位，宝鼎烛台是祭祀福禄寿三星及天地君亲师的地方。

　　每院正堂楼两侧建有东、西堂楼，是小姐们的闺阁绣房，并配有供丫环使女居住的厢房，另有妾婢居住的矮屋。

　　整个建筑布局对称协调，高楼矮屋檐牙交错。大小院内房屋都是出挑廊檐，通往院落的露天有路廊相连，或有腰门相通，廊腰缦回。此建筑形式夏避骄阳，即使滂沱大雨，漫地迳流，穿厅过院也不湿鞋。

　　天井小院严密紧凑，厅堂庭院大而不旷，布以花台、花池，雇用专职花匠栽培四季应景花卉。

　　圩内修有三口砖井，各有用途，东井供人饮用，西井饮马，院内井专供浇花。

　　三、建筑技艺

　　整个房舍建筑，都是驮粱起架结构，重梁木椽，笆砖铺顶。靠墙立柱一半嵌入墙内，一半露在墙外，呈弧形，并有铁制墙钩穿墙而过，巴结墙身。立柱油漆黑亮。

　　立柱下面有磉墩，既可承受压力，抬高建筑物，又可防潮，磉墩用青石琢成，有扁鼓形、长鼓形、方形、六角形，雕刻各种纹饰。

　　房内方砖铺地，砖的规格视厅堂大小，尺寸各异，或铺成斜纹形，线条直曲有序。院落用方石铺成。

　　各层廊檐下都有石阶，用坚硬青石琢成，宽50厘米，厚20厘米，长3—4米不等，从南到北2至7级逐幢增高。东院堂楼地势略高，台阶7级。西院堂楼地势较低，台阶9级。

　　在窗台以下为纯砖砌成的基础墙，石灰浆砌，横平竖直，做工精细，墙厚50厘米。窗台以上墙身是“金包银”砌法，俗称“里生外熟”。外墙只砌一条砖厚的墙面，白灰抹缝，内墙用土坯砌筑，坚固厚实，冬暖夏凉。

　　童墩(为木质柱头墩)置于立柱柱顶之上，横方和桁条之下，二榫之间穿连部位，雕刻莲花形、金瓜形、扁鼓形等各种精美花纹图案。

　　撑拱以房子出挑深浅而长短不同，长撑150厘米，分担横坊荷载。有圆柱形、扁坊形、四棱形，雕刻成龙、鹿、狮、鳌各种奇兽，造形逼真，刀工细腻，线条流畅，涂绘红、黄、蓝、白各种色彩，点缀衬托栩栩如生。刻“龙”寓意“青云直上”，刻“狮”意寓“祛邪”，刻“鹿”寓意“加官进爵”，刻“鳌鱼”寓意“连年有余”。

　　扯坊于两柱之间起到拉力作用，一般露于正屋檐下，或处于室内，有一间一扯的长坊，也有短坊。有长扁形、扇形、半金钱形，刻有人物、鸟兽、花卉、虫鱼，绘画雕刻，寓意甚深，刻“扇”为“行善积德”，刻“鱼”为“连年有余”，刻“水仙灵芝”寓为“佛人仙人”，雕“蝙蝠”寓为“福如东海”，雕“鸳鸯”寓意“恩爱”，刻“松柏”寓意“长生不老”，其他还刻有“和合二仙”、“八仙过海”、“二十四孝”等折子戏中人物，其雕刻技艺十分精细。

　　屋面为传统瓦房建筑工艺，木框架作成后，在桁条上直钉木瓦椽，满铺小巴砖。上底瓦以后再作瓦梗，加上盖瓦，一笼一笼直到檐口，作成各种眉毛形、扇形等瓦头子。两道瓦笼之间，加水淋子底瓦头，以利滴水。凡是厅堂出挑的檐口内，都有卷棚，棚面加彩绘。

　　楼、堂、厅、室、厢房、耳屋，不论班挑翅角，一律都做有屋脊。脊座用瓦片线砖砌成，脊身是空心面砖烧制的，脊的高矮不等。面砖浮雕各种花纹，脊帽出边走线，脊两端配有龙、鳌兽头。脊正中精塑多种狮、鹤等坐兽飞禽，十分壮美。

　　各道大门都是矩形，黑漆红堂，书刻“国恩家庆”、“人寿年丰”、“龙飞凤舞”等对联。厅堂多为六扇或八扇格子门，其他有月洞门、椭圆门、六方门、花瓶门”，门页制作精美，上为龟纹、破冰等各式花纹亮格，中下部抄角、起鼓、丢堂、木刻花卉，加以彩绘油漆。窗户有矩形、扇形、圆形、六角形、菱形，窗扇制作的花墙丰富多彩。

　　在中院三道门内，又对称地分东西两院，门楼上有砖雕。西院刻“行恒”，东院雕“履素”，字体苍劲有力。中院大客厅对面的照墙上，刻有斗大的“知命乐天”四个篆字。此院落尚保存，较为完好。

　　民国元年(1912)，李渐亭投靠北洋军阀政府，通过贿赂，买到一个税务官的职务，在三河尖设卡，比其父辈更加残酷地搜刮盘剥，对来往于正阳关至河南一带淮河上的船只，任意搜查征税。同时，他还当上三番帮会头子，勾结当地土豪劣绅，开烟馆、设当铺，榨取不少“黑心钱”。随于民国3年(1914)，在马店乡马井村(距西圩、老圩一公里处)，又建造一座新圩寨(又称东圩、双圩)，占地30多亩，双圩沟、双圩墙、双吊桥，独门入圩。圩四周设立碉堡，前后6层房、4道院，内有堂楼、客厅、书房、柜房、腰屋、花园等，屋内一律西式陈设，为李渐亭独家居住。死后由其子李希良继承。民国20年(1931)，红军曾围攻一个月未打开，仅将圩主李希良一人击毙。此新圩寨于民国37年(1948)，毁于战火，现仅存圩沟、墙基，圩内已成耕地，种植庄稼。

****第二节　地主经济****

　　李家圩地主占地20万亩、分布在安徽、河南两省五县：颍上县占地1万亩，阜阳县4000亩，金寨县1400亩，河南省固始县3万亩，本县15.46万亩。

　　此外，还在本县马店、龙潭、城关等9个集镇开设钱庄8处、当铺7处、粮行6处、货栈5处、烟土站1处、仓库6处，在上海、南京、天津、大连、青岛等大城市建公馆7处，开办茶馆1处、大戏院2处、火柴厂和营造厂各一个。

　　一、发家手段

　　清朝咸丰四年至同治元年(公元1854年至1862年)，霍邱遍地捻军和太平军，并多次攻占县城。霍邱知县英翰和典史兼县丞尹锡源，曾先后逃到李家圩“避难”，李图南兄弟3人殷勤招待。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尹锡源在离去时，将印丢在李家圩，李图甫趁机自制契纸，盖上县衙大印，霸占参加起义军和流亡在外的农民土地。自此，李家圩土地由原来11顷扩大到数百顷。

　　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英翰因镇压捻军有功升任颍州知府，李亚南前往投靠，当上阜阳三里湾卡官(税务官)。他拦路、沿河设卡，对来往客商、船户肆意加征苛捐杂税，甚至没收其财物，捞了不少黑心钱。遂在阜阳、颍上购房置地。船民、商人及当地市民对他恨之入骨，曾多次向官府控告，因有英翰庇护，不仅未告倒，李亚南反而变本加厉地横征暴敛。为铲除这个恶棍，船民们商定，轮流守候在码头上，等待出京的大官，向上控告。据传等候三年，终于等到文华殿大学士、分管吏、户、刑三部的大臣周祖培的亲眷，由京城回河南商城省亲。船民们殷情接待，船快到三里湾时，船民假称要起大风，请求将“执事”收起，扯满篷帆，驶过三里湾也未停靠。李亚南以为是大商船想逃税，随派兵乘船追赶拦截。上船随意搜查辱骂，对年青女眷进行调戏。事发后，刑部派员严查。商民、船民、市民也纷纷控告李亚南种种恶迹。按清朝法律，本应抄家斩首。但英翰在奏折上只说“该员以官为家”，结果只将李亚南一人斩首示众。据当地知情人说：李亚南死后运回本地时，有尸无首。李家请一木匠雕刻一个木质人头(一说做一个面头)安放其尸上，而后埋葬。

　　李图南的儿子李鸿文(外号二黑子)，被清廷委任为湖北郧西县知县，上任后大肆贪污，获得不少赃银，也广置地产。

　　清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西大山奶奶庙有庙产300顷，李家圩圩主强行霸占，和尚不服，与他打官司，县、州打不赢，老和尚上京告状。途中，李家圩主用金钱收买旅店老板。将和尚毒死，其庙产终被李家霸占。

　　李家对四邻农田，只要看中的，就强行买进，如不卖，就会惨遭暗杀。咸丰年间，牛集乡杨桥村农民牛尧轩的爷爷，有几亩田被李家看中，田价只给80串钱，强行收买。田主在回家的路上，被李家家兵杀死，并将田款夺回。农民谢益祥28亩耕地、8亩老坟地与李家田地相连，李家要买，谢家不愿卖，李家趁天旱。挖沟打坝，将谢家田地水路堵死。谢益祥叔父进李家圩说理，被李家指使兵丁吊打，回家自杀身亡，其田地终被李家霸占。

　　李家圩土地逐年增多，他们夸富说：人行百里不走人家路，马走百里不吃人家草。

　　二、剥削方式

　　李家圩剥削方式多种多样，农民租种他们田地，除收取实物地租外，另收杂课和杂役。此外，李家还兼放高利贷，开当铺，经营工厂、粮行、盐行、货栈，用多种办法对工人和农民进行剥削，剥削方式包括：

　　押金　农民租种李家的田地，上庄前，先要交足押金(俗称贷头)，一般每亩田交押金30串钱(合大米100斤)，并规定押金“三年连头烂”。到时还要补交，如不补交，轻者被撵下庄，重则被送官府或捉进李家圩，施以酷刑，有的被活活打死。农民王庆堂的父亲租种李家圩十石田(习惯亩100亩)，上庄前交押金3000串钱，又送给李家圩“管家”进庄礼1000串钱，种了14年，共烂掉押金5000串钱，农民李亚先、李松先兄弟俩，因没有按时补交被“烂掉”的押金，一个被捉进李家圩活活打死，一个被送进官府迫害致死。

　　调庄　李家圩先将荒田薄地租给农民种，待佃农经营几年，把荒地变成熟地、薄田成了肥田后，借故说押金已烂完，要种田就要到另一个庄上去。这份好田，则以重押、重租租给另一家农民耕种。农民陈照兴，租种李家圩田地，10多年被调过三次庄。最后调庄陈照兴不同意，李家圩派兵丁将陈照兴打得头破血流，并抢走织布机等财物，强行撵下庄。

　　租课　李家圩出租田地，明里规定三成租课，即每收一石粮交租课三斗，实际超过五成还多。因为在正课之外，还有许多杂课、杂役。

　　正课(即地租)　每年午秋收获后要一次交清，并规定应交的各种粗细粮的比例。一般稻谷占70%，小麦占20%，豇、黄、绿豆等杂粮占10%，灾年不减，丰年还要增加租课。

　　李家圩收租课用的是加一的大斗(李梦庚在供词中也承认：他家收租的斗比集市用的斗，每斗多三五斤)，而且规定粮质必须干、饱、净。

　　此外，在每年新粮登场前还要请“看司”(即帮李家圩看课催租人)看课，除好烟、好酒、好菜招待外，还要送“水礼”(即所谓跑路钱)给“看司”，否则，加重租课。交租时，要过登帐、量斗、进仓三关，同时要送笔墨费、灰土费、辛劳费“红包”给帐房先生、斗把子、看仓的。对于把守“三关”的人员，稍有怠慢，他们或不登帐，要重交二次租;或说粮食不干净，要佃户把粮食弄到场上翻晒几日，扬几遍，过风车;或在量斗时装得鼓鼓的，拍得实实的，每斗多量一升多;或推辞仓满，暂不收，让你等几日;或叫你翻仓，把粮食由仓口翻到仓里。民国30年(1941)，佃农范春之，送完租课，帐房先生未入帐，被逼交二回租课。

　　副课(即杂课)　李家圩规定除正课外，每租他家十石田，每年要交草课1万斤(折稻2500斤)、棉花课皮棉10斤、油料课芝麻二至五斗、羊课40斤重的公山羊一只、鹅课10斤重的母鹅3只、鸡鸭课3斤以上的鸡鸭6只、鱼课鲤鱼或鱼子60斤。另外还要送扫帚、刷把、锅盖及菱藕瓜果等等。凡是地里长的，水里养的，树上结的，家里喂的，李家圩没有一样不课。

　　杂役　李家圩圩主还规定，凡租种他家田地的佃户，都要无偿地为其服劳役，随叫随到。如修碉堡、筑圩墙、盖房子、铺路、抬轿、喂马、推磨、打碾、养猪、打扫卫生等等。所有的重活脏活，均由佃户承担，没有任何报酬。如遇婚丧嫁娶，或老爷、奶奶庆寿，少爷、小姐过生日，则要佃户再增派人员为其打杂，同时，还要送“贺礼”，稍有不慎，触怒圩主，就会遭到毒打。农民刘三樵租种李家圩的田，派他17岁的儿子进圩当杂役，在铺路时，因抬不动石头，圩主说他偷懒，用皮鞭打得鼻口流血，当场死去。

　　仅地租一项，李家圩地主每年就收入粮食12万石(折合1.8万吨，可供10万农民吃一年。

****第三节　地主武装****

　　一、武力

　　李家圩豢养一支护圩守寨的武装。清代，有兵丁200人左右，使用的是土枪、土炮，当时拥有大土炮两门，小土炮20门，土枪600支;圩内可自制火药，建有火药库。

　　民国时期，李家圩为增强防御能力，又新建一个圩寨。此时，李家圩兵丁扩充到400人，并强迫佃户每家购买步枪一支，买不到枪的，交银元80块。民国20年(1931)前后，除老式武器外，新式武器有迫击炮2门，手提式冲锋枪20支，步枪300支，手枪100支，圩内有枪械修理所。

　　二、代表人物

　　在清朝咸丰至同治年间(公元1851～1866年)，李家圩掌管军事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李道南。开始在本县组织团练，自任练总。后任清军的候补参将，跟随英翰到处追剿太平军和捻军。据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和民国17年(1928)《霍邱县志》记载：“李道南，尽先候补参将，从戎有年，屡建战功，由怀庆追贼(指太平军和捻军)至太和，昼夜兼行，积劳在营病殁”。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被清王朝追赠副将。

　　民国年间，李松泉(外号四胡子)继承祖父掌管武装，曾先后担任霍邱西乡一二三区铲共义勇军大队长、保卫团团总、区总董、铲共义勇军第四团团长等职务。民国21年(1932)，国民党军队攻占霍邱后，师长徐廷瑶亲自召见李松泉，并赠给迫击炮2门、手提式冲锋枪6支。随后，蒋介石又特电嘉奖“力抵强寇，保卫乡闾”。

　　民国24年(1935)，当地土豪劣绅强迫老百姓出钱为李家圩竖碑(石碑竖在马店东半公里处，后来人称牌坊店子)。碑的正面刻有蒋中正特电嘉奖“力抵强寇，保卫乡闾”。两边的对联是：

　　“外攘而内安，效管子农兵御寇。

　　爱乡及报国，继曾公团练之名。”

　　碑的背面记述李家圩几代人镇压太平军和捻军、反对红军的所谓“功德”。两边配联是：

　　“沣湖沣水清，杰士挺身桃园再现。

　　鞍山千仞刀，丰碑对峙防躅长存。”

　　李松泉手握武装，杀人如麻，群众称他“杀人魔王”。

　　三、罪行

　　咸丰年间，本县农民纷纷响应太平军和捻军起义，反抗清王朝的黑暗统治。李家圩的三个老圩主李道南、李亚南、李图南联合本县的大地主管、胡、刘、窦、赵、王、孙等，强迫农民组织团练镇压农民起义军。他们一家先后杀害义军及其家属400多人。

　　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捻军一部从淮北押运钱粮路经李家圩，大队过后，李家圩出动兵丁截其后卫，劫掠许多金银，并将俘虏的捻军士兵绑在李家圩树上杀死。

　　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本县西山套参加捻军和太平军的农民陆续返回故乡，李家圩出动兵丁前往围剿，一夜间将西山套农民房屋全部烧尽，杀人无数，鸡犬不留。

　　在此前后，李道南当上清军参将，从怀庆(今河南省沁阳县)到太和，杀害起义军和农民难以计数。据当地老人说：他路过家乡时，马身上的毛被人血凝住。

　　民国16年至21年(1927～1932)，本县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组织红军、赤卫队和农会，开展土地革命。李家圩的圩主李松泉、李梦庚联合刘继渊、赵益吾等，组织一支1000余人的“铲共义勇军”同时强迫农民加入红、白学会等反动会道门，反抗红军。李松泉任“铲共”团长，李梦庚任参谋长，他们四处搜集红军情报，捕杀红军干部、战士及其家属。

　　民国19年(1930)7月，李松泉在马店杀害红军宣传主任赵少川等6人，又杀死屈文述、张三和冷二的哥哥等。庙岗乡汪培松的父亲身上被浇上煤油，活活烧死。

　　民国20年(1931)5月，李松泉在马店杀害红军干部汪凤祥、汪凤岐、陈继中、何老三、黄麻子等5人，并剖腹挖心，将人头挂在马店南头。然后，又带兵到龙潭寺，将汪姓30多户房屋烧尽，有5户被斩尽杀绝，有15户被逼得妻离子散。

　　民国21年(1932)5月，红二十五军解放霍邱县城，李梦庚、裴毅公等以“皖北难民请愿团”身份到南京活动，促使国民党令驻蚌埠空军第七航空队逐日轰炸霍邱城关及李家圩周围村庄，炸死群众多人。住在李家圩南边李兽医的妻子，就是在这次轰炸中被炸死的。

　　马店北杨山，是李松泉的杀人场，从民国19年至21年(1930至1932)，他在此杀害红军、赤卫队战士，农会会员，以及红军家属600多人。

　　从民国20年到21年(1931到1932)，红军和赤卫队曾几次攻打李家圩，李松泉凭恃深沟高墙负隅顽抗，均未打开，一些红军、赤卫队战士反被圩内枪、炮打死打伤。

　　民国36年(1947)秋，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以李梦庚、李焕球为首的李家圩地主，联合本县刘继渊、赵益吾以及河南省固始县的蔡小谷、董良才等大地主，组织民团和红、白学会，实行联防，对抗解放军，残害人民。他们先后杀害解放军营长曹海山及群众多人。

****第四节　政治势力****

　　李家圩上通朝廷、官府，下联土豪劣绅，还与土匪勾结，是霍邱县最大的封建势力。

　　一、李家官职

　　在清朝时期，由于李道南镇压太平军和捻军，对清廷有功，除本人被封为副将、赐花翎、加二级外，其三代祖宗均被清王朝赠封为武显将军和夫人。其子李鸿志、授八品荫生。兄弟李亚南、李图南则靠贿赂分别当上税卡官和湖北候补县丞。李图南的三个儿子，除长子李远亭在家守护圩寨和掌管家务外，次子李鸿文被清廷派往湖北省陨西县任知县，三子李鸿祺在光绪年间考中举人。

　　民国年间，李松泉先后任一二三区“铲共义勇军”大队长、保卫团团长、区总董、“铲共义勇军”第四团团长等职。李梦庚在民国35年至37年(1946至1948)任霍邱县参议会参议员、安徽省参议会参议员，并参加竞选“国大代表”。李焕球任马店联防区区长。

　　二、通官府联豪绅

　　李家圩的圩主们善于巴结官府。本县知县、县丞等地方官上任初，必前往拜望。平时，则是李家圩的“常客”。遭到战乱，大小官员和豪绅常携眷逃往李家圩“避难”。咸丰中后期，先后到李家圩“避难”的有知县英翰、县丞尹锡源等。李家圩奉为上宾，殷勤招待。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英翰升任颍州知府，为感谢李家圩圩主保护和招待之情，委任李亚南为税卡官。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英翰升任安徽巡抚后，又上表朝廷，赐封李家圩几代人的官爵。

　　民国期间，李家圩的圩主们更是千方百计地巴结国民党军政要员。民国21年(1932)，李松泉结交国民党右路军总指挥徐廷瑶，被委任“七县剿共总司令”(未上任)，并赠给枪炮。随后，又受到蒋介石的嘉奖。

　　民国32年(1933)元月，日军进攻立煌(现金寨县)。5日，安徽省国民政府迁到李家圩办公，省政府主席李品仙逃到李家圩，李梦庚殷勤招待并认作宗家。日军退后，省府于19日迁回立煌，留下军卷办事处在李家圩办公达数月之久。自此，李梦庚结交上省府大批党政军要员。李品仙保举李梦庚当上省、县参议。民国36年(1947)，又提名李梦庚竞选“国大代表”，为霍邱县第一候选人。

　　李家圩广为交结本县有权势的土豪劣绅，有的还结为“亲家”。如城关的裴介候(李梦庚的岳父家)、陈仲衡(李梦庚大女儿婆家)、刘相如(李梦庚妹婿)、新店田仲祥(李梦庚妹婿)、叶集的管家楼(李梦庚姐夫)、三河尖的杨瑞五、周集的冯笑凡、吴集的朱安甫、河口的阮凌川、潘集的王多经，还有河南省固始县的蔡小谷、董良才等均与李家圩主有姻亲关系，甚至连霍邱三大匪首岳岐山、屠纪周、凌致和等，也成为李家圩的高朋和座上宾。

　　三、权势

　　李家圩从清朝到民国，在政治上拥有各种特权。

　　加租逼债权　韩庙乡佃农孙兰竹租种李家圩的土地，因灾欠租课3石，李家圩圩主派出兵丁强行拉走孙家的牛和驴，逼迫孙兰竹下庄，全家人要饭，儿子饿死。民国36年(1947)，李梦庚竞选“国大代表”，在城关和全县各个集镇广设招待处，拉选票。用于招待、活动和贿赂等开支，折合大米7500石。这些粮食大都转嫁在佃户头上，他向佃户每家借贷十石、八石不等，名曰“借贷”，实为加租，逼得佃户到处借高利贷，甚至破产。

　　私设公堂，刑讯逼供权　李家圩内设有牢房，置有各种刑具。民国23年(1934)，李松泉将王庆堂抓进圩内，说他通共当匪，用各种刑罚逼供。王庆堂不承认，最后用烧红的铁犁尖套在王的脚上，名曰“穿红绣鞋”，五个脚指烙掉四个半，昏死过去，丢在圩子东门外，后被人抬回家救活。

　　买卖人口权　如马店乡冷戴氏，6岁时，家里欠李家圩一石租课，父亲被逼将她送进圩内当女仆抵债，侍奉圩主13年。19岁时，又被圩主以32块银元卖掉。

　　有随意杀人，侵吞财物权　民国19年(1930)，河口农民谢金立参加红军。民国21年(1932)，红军主力撤退后，谢金立被李松泉抓去杀害。一次，李松泉在牛集看到有12辆车满载茶、麻，就命兵丁将人车押到圩里，杀人劫货。

　　李家圩的圩主在血腥镇压和屠杀人民的同时，也玩弄权术，欺骗人民。

　　民国17年(1928)《霍邱县志》载：李图南在沣河设义渡，捐田9顷。又于马店修桥梁，施医药，设义塾。这点“善事”开支仅占其剥削劳动人民血汗的万分之一，但却受到官府的嘉奖。清·光绪12年(公元1887年)，安徽巡抚陈彝奖李图南“以仁安人”的金匾。当地知县和豪绅，又强迫百姓出资，在沣河桥头为李图南竖碑。光绪初，某巡抚由本县过沣河前往河南，当时沣河桥小无船，轿过河时，衣物湿了，在徐家老园休息，许多群众前去喊冤告状，诉说李家圩在各个集镇开设的当铺坑骗百姓财物。凡在李家当铺当押的衣物，均以“对开”钱当进，以“一九”钱或“十足”钱回赎。而且随意“烂当”、“死当”，较好的衣物，即被其“烂当”、“死当”而吞没。巡抚不信，派人将其黄马褂送李家当铺当押，第二天(一说当天)回赎时，即被“烂当”。触怒了巡抚，下命知县捉拿李家圩主，李图南派遣大管家李某代替前去接受处罚：撤掉所有当铺，罚建沣河桥，在桥未建成前，先造两只大渡船，供来往行人过河，且不许收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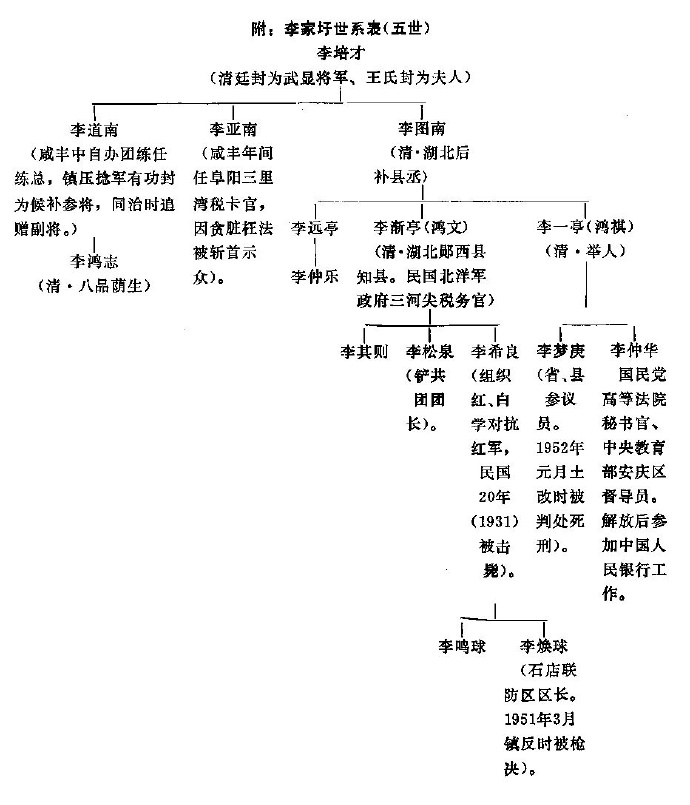
　　民国期间，李梦庚也伪装成“善人”，每年施舍几口棺木，几十件棉衣，或煮粥放粮，收买人心。其实他背后却做了许多残害民众的恶事。

　　民国21年(1932)5月，红二十五军克正阳、解放霍邱，李梦庚跑到南京，纠集地主豪绅，组织所谓“皖北难民请愿团”，多次到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泣求速令徐师(徐廷瑶)前进”。又据国民党《中央日报》5月26日第三版载：“昨晨十时，该团派裴毅公、李梦庚两代表，赴军政部航空署请求电令驻蚌航空第七队，逐日飞往寿县、正阳、霍邱西二区一带，侦察轰炸……”。致使霍邱于7月13日城破，千余名红军战士壮烈牺牲，千余名干部、战士被俘。

　　民国35年(1946)，李梦庚在省、县参议会上提议并通过在本县组织“民众自卫队”，残害人民，加重民众负担。

　　民国36年(1947)，李梦庚又支持本县国民党政府加征“勘乱”费，为县常备大队增购枪支，对抗解放军。同年，李梦庚亲赴合肥、南京，请求国民党派军队来霍邱“清剿”。同时，支持国民党政府收编岳、屠、凌三大股匪为国民军第九路军，与人民为敌。 　　民国37年(1948)，李梦庚竞选“国大代表”失败后，跑到南京，伙同周炳灿、薛禹初、周昆等开办“太平火柴厂”，榨取工人血汗。

****附：李家圩世系表(五世)****

[](http://photo.weibo.com/1036292481/photos/detail/photo_id/4106323032671456/album_id/4091696953615717)

****第五节　腐朽生活****

　　李家圩的圩主们，凭借他们剥削来的大量钱财，过着荒淫无耻的腐朽生活，他们吃、喝、嫖、赌、抽(鸦片)，无所不为。

　　一、日常生活

　　李家圩的圩主们大大、小小、老老、少少仅30余口人，却用上保镖、丫环、奶妈、厨师、轿夫、马夫、花匠、唱戏的、熬糖、烧酒的匠工等六七百人为其服务。一日四五餐，除早、中、晚正餐外，还有早点和夜宵。每餐都有鸡、鱼、肉、蛋、山珍海味、猴头燕窝。酒足饭饱之后，便吸大烟，打麻将，摸纸牌，或让戏班予为其唱戏娱乐。丫环、使女则要日夜守护在他们身旁，端茶、送饭、烧大烟、铺床、叠被、倒马桶、梳头、洗脸和洗澡，夏天为其扇扇驱蚊，中午和晚上休息前，还要捶背按摩。稍有不慎，即遭毒打凌辱。

　　丫环春桃，六岁进李家圩为奴，侍候李松泉的大老婆“徐大奶奶”。有一次刷过马桶忘了用开水烫，地主婆便又骂又打，还将马桶套在春桃头上。还有一次，李梦庚和李松泉在一起抽大烟，春桃不慎将烟土掉落地上，李松泉张口就骂，还将烧红的烟钎向春桃脸上戳，使春桃右脸留下永久的伤疤。

　　一次丫环金凤给李仲乐小老婆梳头，不慎把梳子跌断，便遭到恶毒打骂，地主还用烟钎将金凤手腕扎通，成了残废。

　　丫环彩霞，因父母欠地主的租课被逼进入李家圩为奴，日夜侍候圩主们，累得面黄肌瘦，重病缠身。有一年夏天，带病侍奉圩主们吃饭，并为其扇扇纳凉，因天热体虚，累得满头大汗，给圩主添饭时，顺手抹去脸上的汗水，圩主们嫌脏，便遭到臭骂毒打，从中午一直打到晚饭时，活活被打死。死后还不准从大门抬出，而从圩墙洞口拖出去，抛在荒山坡上。

　　二、生日祝寿

　　李家圩的圩主，无论老的少的，每逢生日必要庆贺一番。这既可祈求神灵保佑“延年益寿”，又可借机显示其荣华富贵，同时又可捞到一笔财物。因此，李家圩生日祝寿已成惯例，大庆年年有，小庆隔日不隔月。最为铺张的是李梦庚的母亲60岁生日。提前一个多月即张扬筹办，县官、豪绅以及亲朋则趋炎附势，相互串连拉拢，送匾、送贺礼。佃户们为生活计，也只好硬着头皮送厚礼，并为其打杂服劳役。整个寿期，杀猪100多头，摆酒席(分上、中、下三等)1000余桌，开支折合大米1000多石(计17.5万公斤)，按4口之家计算，可供150多户农民吃一年。

　　三、婚丧嫁娶

　　李家圩的圩主们，每逢婚丧嫁娶，更是大操大办。

　　民国27年(1938)，杀人魔王李松泉死后，睡的是七寸厚四块整板做的大棺材，穿的是丝绸锦缎，头枕元宝，脚蹬元宝，请来和尚、尼姑、道士为其做斋2个月，还用白布数百丈，从死者卧室直铺到大门外，名曰“天桥”，意为让死者通过“天桥”，升入“天堂”。逢七还设坛祭奠，都要佃户家送纸扎、白布、白纱以及粮柴等，所费粮、款不可胜计。

　　民国35年(1946)，李梦庚的大女儿与霍邱城关豪绅陈家公馆的大少爷结亲，李家圩提前两年从颍上请来宁木匠等，雕制各种家具100余件，里外均油漆多遍，光亮照人。出嫁时，用几百人抬嫁妆，从沣河桥头到城内，排列5公里，其中仅瓷器一项就有12台盒。同时还有陪嫁的丫环、老干娘。男方陈家公馆特派“响手”(乐队)细吹细打，长途迎接。全城围观群众数千人，热闹非凡，实为霍邱历史上仅有的。

　　四、荒淫乱伦

　　李家圩的圩主，男的大多有三妻四妾，女的也多偷人养汉，整日花天酒地，淫乱无度。

　　杀人魔王李松泉，大小老婆有7个，经常争风吃醋，闹得乌烟瘴气。但他们仍不满足，还不分辈份乱搞两性关系。有一次，李松泉在大烟瘾过足后，奸污其亲侄女(大瘸子的女儿)，进而发展为叔侄通奸，并且怀孕。李家圩为遮丑，将女的用土枪杆活活轧死，投入院内浇花用的水井中，并将井口密封。然后，谎称暴病身亡，用假衣棺埋葬。

　　大胡子的女儿与其姑父长期通奸。

　　伪装成“大善人”的李梦庚也是个淫棍。他也有几个老婆，但无人为他生个男孩，为了继承“香火”，曾奸污其贴身丫环、使女多人。有个姓徐的丫环，被李梦庚奸污后怀孕，“大善人”指望他生个男孩，遂收作小妾，后来生下一个女孩，李梦庚心狠手辣，将徐姓丫环关在冷房里，徐不久得病身亡。

　　又一丫环荷花，16岁时被李梦庚多次调戏，荷花抗拒不从，一天夜里，荷花送茶到书房，李梦庚又想奸污她，荷花宁死不从，被逼跳进池塘自尽。

　　李仲乐更是淫乱无比，他除在家里有七八个老婆外，凡侍候他的丫环、使女，大多被其奸污。此外，还常在外面寻花问柳，逛“窑子”嫖妓女，挥金如土。抗日战争前夕，他在上海开设有大戏院、旅馆、茶馆。有一年，他卖掉十多顷田地，携巨款到上海，从各妓院召来百多名妓女，充当三宫六院七十二妃，让随从人员扮作文武大臣，做了一次“夜皇帝”。

****第六节　结局****

　　1949年霍邱解放前夕。李梦庚和李焕球携家眷潜逃蚌埠、南京。同年4月，南京解放，李梦庚化名李其印，仍在南京潜伏。1951年5月16日，被公安机关逮捕。1952年元月17日，在马店召开公判大会，到会的有本县各区乡和河南省固始县的农民代表16087人，会上有苦主118人用口头或书面控诉李梦庚的罪恶，人民法庭当会宣判李梦庚死刑，予以处决。

　　李家圩所霸占的20万亩土地全部没收，分给广大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李家圩这座压在霍邱等县人民身上的封建堡垒被彻底摧垮。李家圩地主庄园被没收后，曾先后作仓库、西山林场场部、西山五·七干校。1961年秋，安徽省人民委员会下达通知，将李家圩地主庄园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78年，省革委同意在李家圩建立阶级教育展览馆，并拨款4.5万元进行维修。1980年8月，省人民政府批转省文物局报告，同意李家圩阶级教育展览馆撤销。次年8月8日，省人民政府再次下文，将李家圩地主庄园列为“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立有大理石碑记为保护标志(镶嵌在李梦庚宅院二道门西厢房南墙上)，并由县文物组派员保护、管理。1985年，省人民政府决定，西山林场场部搬出李家圩，同时又拨款1万元维修现存房屋。1987年，尚存房屋39间，已修复25间。

你姓赵，你有十亩地，一个人种不过来，佃给隔壁老王两亩。隔壁老王自身有两亩地，加上你的两亩地，交完地租以后一家过的紧巴巴的。天有不测风云，老王他娘生病了，请了大夫就欠下了租子，按规矩是九出十三归。驴打了一年滚，老王家的两亩地就归你了，老王彻底成了你的佃户。  
第二年发洪水把地界冲没了，洪水退了以后你把地界往隔壁老孙家挪了一点，圈了十亩地，老孙告了官，可是县太爷纳了你的女儿做小妾。慢慢的半个村子都是你家的了，你还觉得不满足，于是在一个风调雨顺的日子，你把河堤扒了。当然有很多人告官，这次县太爷也不是你女婿了，然而你现在是这个村子的包税人，没了你整个村子的税都收不上来，毕竟不是每个县太爷都姓海。  
一个村子的地都是你的了，你养了几十个狗腿子。终于不用起早贪黑的扒河堤了，有什么事刀尖上说话。你死了以后把家产传给你的儿子，传给你的孙子，你们一家人过着永远幸福的生活。当然难免有不肖子，但有祠堂在，有宗族在，不孝子也败不了你的财产。  
不久以后一个县都归你了，你的租子收走了老王打的大半粮食，给他留下了一些口粮。若是丰收就是多收了三五斗，若是灾年就得卖儿卖女卖地。  
当然你是很喜欢灾年的。  
有一天闹了灾，全县颗粒无收，皇帝下旨免税。然后你给自己免了税——佃户本来就不交税，他们交租。还有一些交税的人得继续交税，他们不识字，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你准备好[小米](http://jump2.bdimg.com/safecheck/index?url=rN3wPs8te/pL4AOY0zAwhz3wi8AXlR5gsMEbyYdIw636h6BYTc8ifY4Ee60C2e0/t6XyibVFgk4fbLMgytUg5Z4Q4OO30Ri8SAtVjSx1NjJY8K44RtEayJKDidv8UDH+gujgEyCiqB4LTd6WN5w0LgGasqIGSyUqPxl0jAwKiZz3IzR7245/q7zIkU9kOXOqU9LI4CCJvs4wPGbuJnYGNA==" \t "https://tieba.baidu.com/p/_blank)收地。  
当然你会问为什么要把人逼到绝路，做人留一线不好吗？对，如果这样做你很快就不姓赵了，会有别的姓赵的人来夺了你的地，那时候你要改姓王了。  
老王饭也没着落，卖儿卖女吃[草根](http://jump2.bdimg.com/safecheck/index?url=rN3wPs8te/pL4AOY0zAwhz3wi8AXlR5gsMEbyYdIw61Qnuv9hq6khq0RP8tA/75At6XyibVFgk4fbLMgytUg5Z4Q4OO30Ri8SAtVjSx1NjJY8K44RtEayJKDidv8UDH+gujgEyCiqB4LTd6WN5w0LgGasqIGSyUqPxl0jAwKiZz3IzR7245/q7zIkU9kOXOqU9LI4CCJvs4wPGbuJnYGNA==" \t "https://tieba.baidu.com/p/_blank)树皮乃至人肉，终于有一天把你家院子围住了，因为方圆几百里就你这里有粮食。  
围子破了，他们吃了你的粮食，要了你的命，然后如[蝗虫](http://jump2.bdimg.com/safecheck/index?url=rN3wPs8te/pL4AOY0zAwhz3wi8AXlR5gsMEbyYdIw60XD5qAL7StfVpyMrh1OGlst6XyibVFgk4fbLMgytUg5Z4Q4OO30Ri8SAtVjSx1NjJY8K44RtEayJKDidv8UDH+gujgEyCiqB4LTd6WN5w0LgGasqIGSyUqPxl0jAwKiZz3IzR7245/q7zIkU9kOXOqU9LI4CCJvs4wPGbuJnYGNA==" \t "https://tieba.baidu.com/p/_blank)一般涌向下一个围子。人越死越多，有的是被打死的，更多是被饿死的，终于有一天人死的差不多了，人比地多，养蛊一般出了一个新的统治者，活下来的人分了地，又是一个轮回。  
只要地归个人，那慢慢总有人姓赵有人姓王，就有一个又一个的轮回。  
有个人终结了轮回，地是所有人的，任何一个靠种地为生的人都可以分到一定的土地，想干活就有地，不用交地租，只交税。  
你说这侵犯了你的人权。  
那个人指了指地上，老王的白骨堆成了山。  
你说关我屁事，我的地就是我的地。当然你是文明人，不会说这么不雅的话，你说不做安安饿殍，尤效奋臂螳螂。  
那个人说没有你对我很重要。  
你的子孙都不姓赵了，他们拿着你的笔记痛斥这个社会的不公，要求返还你家被土匪夺去的地产。  
笔记里，你温文尔雅风度翩翩英俊潇洒聪明仁爱温柔善良修桥开路赈灾扶贫，你养活了老王全家而不求回报，敌人入侵的时候你奋战在最前线，家里很多人为国捐躯，你留下了很多浪漫的故事。  
而老王一家又懒又馋，吃着你的饭还不好好干活，整天游手好闲无事生非，撩猫打狗，调戏良家妇女，土匪来了马上投靠了土匪，反过来咬你一口，简直是十恶不赦。  
当然还有很多小事，比如有一次老王家的儿子饿得不行偷了你家的土豆，全家被打碎了脑袋喂狗。你刀下留人救下了老王家仅剩了一个女儿，让他做了你的婢女。然而土匪来了，他们要分了你的地，老王家的女儿居然带头打开了大门，真是恩将仇报，狼心狗肺。  
有的人看了你的笔记感动的热泪盈眶，他们说你所在的年代是中国历史上最美好的年代，你是他们心中最可爱的人，他们为你鸣不平，为你奔走呐喊，他们甚至迫不及待的想穿越到你的年代。  
不知道他们姓王还是姓赵。

聚得起打得倒，才成，就成。  
一个穷人的穷可能像富人描述的那样是因为好吃懒作。人数明显多数的穷人聚集起来的穷人阶级，不但造反有理，而且造反就是道理。

是，穷的活不下去你就可以聚集起来打到马云，打倒王健林，打倒你们村书记，打倒你们县县长以此类推。  
所以现在要扶贫。  
是的，造反有理。

不要颠倒是非，这是两个概念，一个是你自己不知道倒了什么霉活不下去了，一个是你本来活的下去的被逼的活不下了

一个阶级活不下去了，系统性周期性地活不下去了，你还让人家讲法律

讲法律嘛 看一开始的描述 在这个年代好歹也是个不正当竞争、高利贷、毁坏公共措施、地方黑恶势力、故意杀人嘛   
知乎上总有这种人 灾年动乱革命年要知法普法，和平法制年却要讲道义、激情，就算干不起也可以搞舆论来闹闹事情 整天质疑反对公权机关的结论 这个时候怎么就不讲法了呢？

对啊，所以我说你觉得这和打地主是一个级别的可以试试能不能拉起来一波人打同行啊！  
怎么样看出区别了吧？  
1、公司被暗算是小概率非周期性事件，而土地兼并是高概率周期性事件。  
2、农民失去土地的影响无法和公司倒闭相提并论，公司倒闭了你和你的员工还有活路而农民没有了！

没打到马云是因为过不下去的人不够多. 等到失业率30%的时候你再看看. 别说马总统, xi老板能不能活下来也要看气质

这就是事实啊，不要动不动就说多看书，2000多年的王朝罔替，哪一个不是皇权不下县，土地兼并，饿莩遍野！不能只看见日记里的仁义道德，而看不到白骨皑皑。

2017-05-31

我家祖上就是地主，地也有几百亩，对邻里乡亲还算厚道，算是费孝通描述的那种传统小地主。土改也只是收了地分了，没见血，那么多地和产业放现在少说也是几千万上亿，要说我们这些后人心里没念想那不可能，然而通过史料和亲历者越了解历史和思考，我越发明白地主阶级的消亡是必然也是必须，落后的必然消亡，人类必须前进。

前面有人说人人平等是骗小孩，不错，人类千年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平等，可预见的未来也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多得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和乌合之众之间的夹缠。

然而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由己及人，及众人，即为同体悲，无缘慈，有这份心，叫赤子之心；被社会操过了，人模狗样了，还能抽冷子蹦出这份心来，叫不忘初心。这种人骨子里还是“小孩”，也愿意被人人平等这个念头“骗”！​

近代苏鲁地区的初夜权：社会分层与人格异变  
马俊亚  
来源：《文史哲》2013年1期  
　　  
  
　　内容提要：近代苏鲁地主对佃农拥有初夜权。这一权力的实施是社会结构异变的结果。这里的社会分化为占有大量土地的利益集团(大地主)与大量占地较少的贫民群体，社会结构演化为缺乏中间阶层的哑铃形而非金字塔形。掌握行政、军事和经济等各种权力的大地主，基本上不受程序化的法规制约，多沉湎于本能型的享受，无法追求高成就动机人格。一方面，他们利用国家优裕的政策，对贫民实施包括初夜权在内的各种超经济剥夺；另一方面，他们利用对下层民众的控制，经常策动成千上万的贫民反叛代表社会上层利益的国家，以获得更多的非法利益，他们的终极理想是成为享受更大肉欲的封建君主。  
  
　　关 键 词：初夜权 哑铃形社会结构 利益集团  
  
　　作者简介：马俊亚，安徽大学特聘教授，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  
  
  
  
　　世界各地的初夜权叙述，绝大多数存在于文学作品或口头传说中①，缺乏过硬的史料证据②。苏鲁地区的初夜权资料则极为丰富可靠，充分反映了这一地区的社会状况。苏北涟水籍的严中平先生生前多次指出，由于中国地区之间差别极大，苏北就存在着初夜权的现象③。应该说，这一现象源于苏北特殊的社会结构。  
  
　　一  
  
　　华夏(汉)民族地区，初夜权多为民间传说，并且存在较大争议④。郭沫若认为，《诗经》时代，公子们对平民女子拥有初夜权⑤。有些学者则认为，周代、乃至中国传统社会不可能存在初夜权⑥。上述对中国初夜权的看法，均是臆测。近代苏鲁地区的初夜权有着充分的依据。  
  
　　与欧洲相似，中国文学作品中不乏初夜权记述。一部晚明作品描写的主佃关系，包含明显的初夜权成分。  
  
　　寿山寺，田良五百石，分为十二房，僧皆富足，都锦衣肉食，饮酒宿娼，更甚俗家。……或有畏受家累，不思归俗者，辄择村中愚善佃客，有无妻者，出银与代娶。僧先宿一个月，后付与佃客共，不时往宿。⑦  
  
　　鲁人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有许多郭沫若所说的“公子”形象。如韦公子“放纵好淫，婢妇有色，无不私者”。怀庆潞王，“时行民间，窥有好女子，辄夺之”⑧。  
  
　　一部清末作品中，鲁南侠盗雁高翔酬谢苏北世家子沈筠时，尽管沈非常中意一“尤妙丽”之姬，但雁认为：“此皆非贞躯，不足以辱长者。昨得一全璧，臂上守宫砂未退，谨当奉献。”⑨后使沈获得了青州贾太守之女的初夜权。这部作品的作者为泗州人宣鼎，同治(1862—1874)、光绪(1875—1908)年间在济宁、淮安等地游幕，熟悉苏鲁的风土人情与社会心理。从中可以看出苏鲁社会上层非常看重初夜权。  
  
　　现实中更不乏这类人与事。晚清仪征学者程守谦记载，淮安府盐城县的富室商人，多利用财势奸淫未婚女子⑩。同治年间(1862—1874)，沭阳(现属宿迁市)一名施恩于贫者的寺僧，明确提出初夜权的要求，并得到了对方的认可。  
  
　　甲者……栖身庙中，为香火道人。甲父在日，为甲聘同邑某氏女。甲财产既竭，贫不能娶。 僧故饶于资，性尤险僻，尝奢甲值而轻其事，甲颇惑之。一日置酒密室，召甲饮。半酣，谓甲曰：“闻子已论婚，胡久不娶?”甲以贫对。……僧曰：“今有一策，不知子能俯从否?若能与共之，当先为子谋百金，入门后衣食悉取给于我，并当增子值。”甲本非人类，欣然从之。合卺之夕，宾客既散，甲出，易僧入房，女不之知，听其所为。(11)  
  
　　苏北的初夜权更多地发生在主佃之间。仪征学者刘师培指出：“禾麦初熟，则田主向农民索租，居佃民之舍，食佃民之粟。……或淫其妻女。”(12)据1928年的一份报告，徐海地区地主下乡，佃户们要献上妻女供其淫乐(13)。苏北地主看中佃户的妻女，常以服役为名，召至家中随意奸淫(14)。沭水、临沭一带地主对佃户“打、骂、奸淫的事情也是层出不穷的”(15)。《申报》载，号称“沭阳程震泰之半”的顾七斤，“垦良田七万有余亩，姬妾百。……此人好淫，远近妇人受其污者，莫点其数”(16)。曹县朱庄大地主朱凯臣拥有土地数千亩，任五方局团总，他看中的佃户女性均为其所奸淫(17)。苏北宿迁极乐庵与寿山寺相似，和尚往往有妻妾多人(18)。宿迁邵店圣寿寺的和尚“几乎个个寻花问柳”。当地俚语：“庙前庙后十八家，都是和尚丈人家。”(19)  
  
　　由于苏北鲁南是古代的鲁地，儒家传统影响较深，普通百姓往往羞于谈论涉性话题，加上初夜权本身存在着隐秘性，当事人多不愿对此加以张扬(20)。并且，“初夜权”一词20世纪以后才成为汉语词汇。因此，对初夜权的准确叙述，多为新式知识分子。  
  
　　20世纪40年代中期，据苏北土地改革工作者调查，“地主对佃户的妻女，可以随意侮辱、霸占。……甚至有若干地区如宿迁北部，还保留‘初夜权’制度，佃户娶妻，首先要让地主睏过，然后可以同房”(21)。1942年4月，苏北新四军领导人邓子恢指出：贵族地主阶级的思想意识，包括“可以自由奸淫以至霸占人家的妻女，可以享受初晚的权利”(22)。香港报人潘朗写道：“农奴的新婚妻子，第一夜必须先陪地主睡，让地主老爷‘破瓜’。”“这风俗，在中国，在号称文风甚盛的苏北，也是存在。”反之，佃农“如果讨老婆而在新婚第一夜不把妻子送到地主老爷的床上，倒是‘大逆不道’，是‘不道德’了”(23)。  
  
　　据20世纪40年代担任沭阳农会会长、钱集区委书记的徐士善叙述：“有次在沭阳张圩斗地主，晚上让他的佃户看管他。结果，夜里佃户用棍子把地主打死了。后来调查知道，原来佃户的媳妇，娶过来的头夜，被这位地主睡了。”(24)沭阳有的佃户向地主借贷娶亲，地主则以得到初夜权作为条件：  
  
　　沭阳胡集北老单圩地主单旭东佃户某某，儿子大了要带媳妇，因没有钱，向地主商量。地主说：“不要愁，我替你想办法。但你要允许我一件事。”佃户问他什么事，他说：“你新儿媳带来，头一晚上我去，这你也赚便宜。你不允许，我只要想你儿媳，还能不给我吗?”佃户经过思考，没办法，答应了。地主借了三石小麦。(25)  
  
　　值得注意的是地主所说的“我只要想你儿媳，还能不给我吗?”表明地主对佃户妻女拥有常规的性权力。对这种权力略有不满的佃户自然会受到地主的严惩。沭阳宋山区河东乡小宋庄地主徐香太奸淫佃户田二的儿媳，被田二发觉，田仅责骂儿媳几句。次日，徐执牛鞭将田痛打。田问：“你为什么要打我?”徐答：“你自己知道。”(26)1936年，沭阳汤沟乡乡长、大地主汤宜逊的佃户王某娶妻，汤闯进王宅，奸淫王妻。王母劝阻，被其枪杀(27)。  
  
　　类似于郭沫若所说的“尝新”(28)，在苏北广泛存在。沐阳程震泰家族的程廉泉，家中的女性雇工“差不多都受过他的蹂躏。老的也好，丑的也好，俊的也好，甚至于满脸是疤和麻的，他也要糟蹋他[她]。他说这是‘尝新’”(29)。淮阴孙圩孙大琨，家有田地26顷多，“听到沟南佃户陈兆臻有个美貌的姑娘，他就马上叫几个自卫团[丁]，挑了被子，拿着毡毯，提着尿壶，他自己捧着水烟袋跟在后面，一步三幌(晃)，三步九摇，到了陈兆臻的家里，是话未讲，只说：‘把你姑娘带来睡睡看，好才要，不好两便。’”(30)  
  
　　更有许多地主获得了初夜权后，长期霸占佃户的妻女不予归还。泗沭县裴圩地主周继叔家的雇工朱尚队兄弟两人，积蓄多年替弟娶媳，入门头晚被周奸占，后被周长期霸作“小婆子”(31)。宿迁北部窑湾区王楼乡地主马知非(又名马如元)，有地60余顷、佃户200余家。他46岁时看中佃户孙广礼17岁女儿，在孙氏嫁果场张姓的当晚，用花轿把孙氏抬到自己家中，后长期予以霸占。“因他有钱有势，张姓也只好哑吧吃黄莲，有苦无处说。”另被他长期霸占的还有佃户王怀仁的女儿与佃户张九清的妻子(32)。  
  
　　地主厌腻了佃户的妻女后，可随时抛弃，无需负任何责任。沭阳曙红区崔沟村崔家庄丁杰三，父辈有80顷地，本人在上海读过大学。他曾将佃户王春保女儿霸占一年多，王女怀孕后，丁即予抛弃。佃户黄德安一个15岁的妹妹，亦被丁霸占年余后抛弃。后又将佃户崔振露之妻霸占(33)。  
  
　　与欧洲中世纪不同的是，苏北从外地迁入的佃户妻女同样要被当地地主行使初夜权。沭阳县耀南区长安乡地主袁席山，有地9顷，有位佃户搬来的第一夜，他去佃户家奸淫其妻，“地主及门勇一夜去打几次门，小笆门都被打坏了”(34)。  
  
　　在《费加罗的婚礼》中，法国伯爵为了取得女仆苏珊娜的初夜权，采取的是“温情”引诱的方式。相比而言，苏北初夜权的实施极为野蛮。有的新婚妇女因不顺从，竟被逼死。1945年春末(当地人称“麦头”)，沭阳龙庙乡长兼大地主徐士流在一乡民娶亲时，欲奸淫新妇，新妇不从，被迫跳井自杀(35)。宿迁顺河区日伪区长张少桐与义子曹寿才强奸祁某之妇不遂，竟枪杀了祁氏夫妇(36)。宿迁姚湖北高圩地主高永年奸淫佃户陆某17岁孙女，陆女两次喝盐卤相拒，仍迭次被奸(37)。  
  
　　与苏北类似，抗战和土改时期的调查均表明，山东不少地方，地主对其佃户享有初夜权，直到1945年山东省战时行动委员会制定了《婚姻法暂行条例》后才真正废除(38)。  
  
　　抗战时任丰县、鱼台等地妇女部部长的张令仪写道：抗战初，在鲁南，“我第一次听说有这样的事：佃贫家的人新婚之夜，新娘要被地主享有初夜权”(39)。据她叙述，1938年她在单县任县委委员时，中共县委书记张子敬(40)亲口对她说，因佃种了单县辛羊区张寨地主的田地，张新婚时，妻子被张寨的地主施行了初夜权。她认为：“鲁西南的初夜权不是潜规则，而是一种比较普遍的不成文法规。农民根本无力抗拒。地主实施初夜权主要是为了满足其荒淫的肉欲。”(41)  
  
　　抗战期间，山东救国团体为了发动民众，把取消鲁南地区的初夜权作为改善雇工待遇的一项内容。1940年8月11日，山东省各界救国联合总会会长霍士廉在山东职工联合大会上报告：“鲁南许多落后的地区，仍存在着超经济的剥削和残(惨)无人道的野蛮行为，如初夜权。”(42)由此可知，初夜权在鲁南是比较显著的社会问题。1943年12月，陈毅经过鲁西南，他的《曹南行》诗称：“毫邑汤都史所传，至今豪霸圈庄园。蜀客多情问遗事，居停首说初夜权。”(43)其时，地主尚是中共的统战对象，山东的中共高层反复强调“照顾地主利益”(44)，陈毅等人不会刻意丑化地主。据一位“老战士亲身经历”所写的作品同样记述了鲁南的初夜权：临沂张庄有400多户人家，庄主族长张大富，拥有全庄土地，还享有初夜权，“谁家娶新娘子，先要被他睡三晚”(45)。  
  
　　即使在普遍存在过初夜权的西方，“真正的性交权力是很难证实的，目前并无确凿的证据证明其真的发生过”(46)。但苏鲁地区的初夜权是确切无疑的。近代苏鲁地区的初夜权与少数民族地区的初夜权有着较大的区别。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也存在着形式不一的初夜权。据记述，在西藏，“这些地区的民众不愿与年青的处女结婚，而是要求她们必须与其他许多人发生过性关系。他们相信这样才能为神所悦，并认为一个没有男伴的女人是极为低贱的。因此，当商队到来，搭好帐篷过夜时，那些有女儿待嫁的母亲们会领着她们来到这里，请求这些陌生人接受自己的女儿”(47)。在新疆，“回俗女子至十岁左右，即送请阿浑诵经，为之破瓜，彼俗称为开窟窿，否则无人承配。幼女举行此典，恒数日不能起，甚有下部溃烂至成废疾者”(48)。为此，民国新疆省长杨增新专门下令，女子“非至十四岁，不得开窟窿”(49)。改土归流前，鄂西土家族女子婚期的前三天，土王享有初夜权，凡与土王异姓成亲，新娘在婚前必须和土王同住三宿后，方能与新郎结婚(50)。四川酉阳土司所属的大江里、小江里一带，不仅居于特权地位的土司享有初夜权，就是封建氏族长，也在本(氏)家族内享有初夜权(51)。湖南永顺、保靖、永绥的土司，除同宗外，对于任何人新婚都享有初夜权(52)。贵州毕节的土司享有初夜权(53)。该省安龙，农民妇女出嫁当晚，即迁往兵目附近，为兵目服役三年，才可落夫家，这种习俗“可能是‘初夜权’的残存形式”(54)。  
  
　　这种权力是基于习俗或信仰的“神权”。某些汉人地区流传着类似的传说，不少与神权有关。郁达夫所述的浙江诸暨避水岭西山脚下的石和尚，“从前近村人家娶媳妇，这和尚总要先来享受初夜权”(55)。宋之的所说的山西冀城东山，“相传那山里有一个东山大王，是要享受初夜权的”(56)。在这些传说中，石和尚和东山大王都非现实中的人，而是具有神性，至少拥有某些神通。  
  
　　苏鲁地区享受初夜权者均是活生生的人，一般是富者通过财产关系对贫者性权利的统治，多见于地主对佃农的妻子施行这一特权。由于地主身兼官僚、寨主等多种身份，处于极为强势的地位，作为弱势一方的佃农无力抗拒其要求。这一关系的本质是人身依附的表现。  
  
　　二  
  
　　性权力的不平等是由社会阶层和社会结构决定的(57)。近代苏鲁乡村严重分化，大地主是极为强势的利益集团，他们几乎占据所有的政治、军事、经济等各种社会资源，把乡村社会变成了自己的独立王国，视普通平民为农奴。而平民群体不但在经济上被剥夺殆尽，而且连基本的公民权利也从未拥有过。这是初夜权这种恶俗得以普遍存在的社会经济性土壤。  
  
　　一般认为，中国近代各阶层构成了一个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占地500亩以上的大地主约32万人，小地主200万人；自耕农1.2亿，其中有“余钱剩米”者达1200万人；半自耕农和贫农约1.5亿—1.7亿人(58)。与此估计不同，近来的研究表明：土改前，宿迁、沭阳、淮阴、邳县、新沂等县的富农数量不但远少于中农、贫农，而且远少于地主!富农数量仅相当于地主的66％，事实上，中产者的数量最少。近代苏北社会系由少数极富者和绝大多数极贫者构成的哑铃型结构(59)。  
  
　　鲁南与苏北差堪相似。据1943年统计，莒南、赣榆(时属山东滨海专署)3个区13个典型村中，“地主”人数最少，户均占地仅50.50亩(60)。应该说，除去个别占地特别大的地主，鲁南一般地主户均占地面积显然不足50亩，而山东全省有3个县农民户均占地超过了50亩(61)。也就是说，鲁南的不少“地主”占地不到山东许多地区的一般农民占地的平均数。苏北土改时富农户均被没收的土地为56.3亩(62)，实际占地数不会少于60亩。即使占地达60亩的农户，“生活仍很困难”(63)。因此，鲁南的“地主”充其量相当于苏北的富农，是各阶层中人数最少的。鲁南同样缺乏中产者。近年来，有学者强调：“99％的地主占地充其量也就在人均10亩上下。”(64)但不论近代鲁南还是苏北，乡村大地主占地数量均极为惊人。唐守中在铜山、沛县、滕县、峄县等处占地数百万亩(65)。鲁南窦家拥有土地8万亩(66)。峄县王海槎、鲍大安分别占地7万和10余万亩(67)。鲁南的社会实态是“地主统治占优势。富者田连阡陌，地以顷计，贫者纵有土地，亦渐荒芜，地主操有政治经济大权，以政府为支持……横占土地，鱼肉人民。非特中贫农不能上升，富农多数降为佃户”(68)。这说明社会一直处于两极分化之中。  
  
　　嘉庆、道光年间(1796—1850)，沭阳程震泰家族占地16万余亩(69)，被誉为“江苏第一家”(70)。苏北陈、杨两氏各占田40万与30万亩，而占田4万至7万亩的地主“为数不知凡几”(71)。民国年间，地主占地的势头不减反增。1929年，中共徐海特委报告：“东海、宿迁、邳县、泗州等处，则地主土地，有二十万亩以上、十万亩以上的，几千亩以上的非常之多。”(72)睢宁有地主占田10万多亩(73)。萧县“大官僚地主”段氏在徐州占地，方圆达几十里；仅在萧县即有18个庄园(74)。据民国学者调查，邳县、阜宁、灌云等县均有占田五六万亩的地主(75)。宿迁极乐庵及下院占地20万多亩(76)。大地主谢应恭有田数十万亩(77)。据国民政府地政学院抽查的苏、浙、皖、赣、湘、鄂、冀、晋、豫、陕、闽大地主情况比较，江苏省的地主占地数量最大(78)。  
  
　　当然，大地产本身并非原罪。大地产形成过程中所表现的社会不公，才是值得谴责的。苏鲁地区的大地主从来都不是单纯的土地所有者，他们的主要成分是国家的军政人员(79)，是国家各种恩宠的独占者，他们掌握国家赋予的各种权力。国民政府内政部地政司司长郑震宇认为：“官绅世家较多的地方，土地分配易于集中。”(80)陈翰笙指出，苏北“大部地主，都以官吏为职业”。苏北一带，身兼军政职位的地主占地主总数的57.28％(81)。像唐守中，乃沛县团练首领(82)。民国年间，海州镇守使白宝山，“占有海州多数盐田官田”(83)。其他大地主也多有军政方面的背景(84)。沭阳王洪章任官田游击队长，原有地百余亩，通过敲诈霸占，增加到560亩(85)。灌云县大地主徐继泰，原任国民党常备第二旅长，占地20余顷。团长蒲开喜，在短时间里占地300余顷，“这里包括了胁迫欺骗、利诱各种方式的”(86)。阜东圩寨寨主顾豹成，其弟乃阜宁县长兼保安团长，本人则是悍匪，占有土地四五千亩(87)。  
  
　　山东莒南县大店、筵宾、沟头的地主，“大都做过官”。庄陔兰曾任清翰林院编修，民国山东省议会会长，庄德孚原系举人，庄明远曾任国民党军队的军长等职(88)。临沭甄家沟地主甄安乐担任乡长，占地7000余亩。“他们是这一带的土皇帝。”(89)1930年后，韩复榘实行军垦，没有所有权的土地全部没收，连排长每人分得1顷，士兵50亩，连长以上无限制(90)。造成有权者大肆霸占土地的局面。  
  
　　近代苏鲁乡村普遍军事化，大地主全部拥有强大的武装，更强化了强势集团的权力，使他们成了名副其实的土皇帝。  
  
　　从《水浒传》中的“祝家庄”，到《施公案》中的“殷家堡”等，苏鲁地区早就出现了圩寨。捻军战乱发生后，苏鲁乡村全面圩寨化。圩寨的寨主通常是当地最大的地主。如沭阳地区，有民国学者指出：“都像部落式的各个土圩子分成了村庄，等级森严[的]一个庄主，都是这庄的首富地主。一般农民都是仰仗着他们的。”(91)新四军领导人同样意识到长江南北地主之间的区别。管文蔚写道：“苏北的地主与江南的地主有很大的不同。苏北的地主主要靠土地剥削生活，终日闲在家里享清福，不事劳动，婢女成群。出门收租时，保镖人员，前护后拥，完全是封建社会的一种景象。”(92)黄克诚回忆：苏北盐阜地区“地主本身有武装。大地主住地周围住着他的佃户，有点像封建时代的庄园一样”(93)。  
  
　　苏北圩寨类似“小小部落”，经济是“自足”型的。大地主本质上是暴富的小农，这些利用权势致富的利益集团，是建立在对平民的超经济剥夺的基础之上的，他们没有任何公民意识，没有社会责任感。苏北圩寨中尽管没有法庭，但作为寨主的地主可以处理任何纠纷，可以随意杀死平民。是以卜凯(J. L. Buck)指出：“北江苏宿迁那些居留的地主，使我们想起欧洲诸国古代的封建主。”当然，这种情形并不限于宿迁，整个苏北地区差堪相似(94)。  
  
　　郑震宇认为：官僚地主较多的地区“自然要使佃耕制度盛行”(95)。光绪前期，江苏北部除沿江30英里内，自耕农很少，农民自耕地仅占全部耕地的20％—30％(96)。据国民政府所作的调查，20世纪30年代，峄县的自耕农仅占2.6％，佃农占24.1％，半自耕农占51.9％，雇农为21.4％(97)。苏鲁社会截然分裂为极富与极贫两个阶层。郑震宇指出，上下阶层之间地位悬殊，使得上层“对于农民，可以颐指气使，奴隶待之”。江苏江北各县“大都是地主与农民身份悬殊的地方，也都是业佃关系最恶劣的地方”(98)。  
  
　　处于社会下层的佃农，从未获得过近代意义上的公民权利。他们根本无力抵御作为强势集团的大地主的欺压。民国学者指出，苏北农民，“对于一般的地主、老爷们，总是顺从的。他们能忍受毫无理由的、强迫的、很明显的地主和劣绅的虐待，他们能甘心受地主和劣绅的敲诈”(99)。这与《费加罗的婚礼》中为了取消初夜权而与伯爵勇敢斗争的仆人费加罗的形象判若云泥。  
  
　　国民党中央委员蓝渭滨主办的刊物称沭阳地区，“一般无智识的农民，差不多一无所知，只有惟命是从的特殊现象”(100)。据《中外经济周刊》1927年的调查，东海、沭阳、灌云地区佃户与田主所订的契约，“须声明永远服从田主指挥”(101)。1928年徐海蚌特委报告，海州等地的农民、盐民，看见地主均要叩头，“地主对于农民任意侮辱，有生杀之权”(102)。据山东省民政厅长对峄县的视察，“地主对于佃农极其苛刻，每届农忙，不出男差即出女差。佃农只得放下犁锄去为地主佣工，无论时日，多不给工资”(103)。  
  
　　中世纪欧洲的初夜权通常以法律形式加以规定。孟德斯鸠写道：罗马窝尔西年人地区的法律，“使脱离奴籍的人取得对于同自由民结婚的少女的初夜权”(104)。恩格斯写道：在卡斯蒂利亚，直到1486年天主教徒斐迪南作出裁决，才废除了初夜权(105)。法国作品《夜深沉》中，巴朗森对弗朗西斯说：“您是不是要向我承认，您常常去对我们的佃妇施行初夜权?这可是已被1789年的革命连同其他特权废除了的。”(106)  
  
　　苏鲁地区的初夜权不见于法律规定。事实上，在近代苏鲁乡村社会中，法律的影响力极小，社会生活中最具影响力的是个人权势。  
  
　　初夜权并非苏鲁乡村孤立的怪俗异习，而是社会经济结构畸变所造成的强势集团人格裂变的必然结果。权力巨大、缺乏程式化监督的田主，是不可能成为“仁义”地主的，他们利用国家的庇护纵容，肆意对平民进行惨无人道的欺压。因此，相对这一利益集团的其他暴行，初夜权竟成了相对“人道”的行为。  
  
　　在苏北，地主的名字，是平民必须避讳的。沭阳十字耿卓如，其父拥有二三十顷地，佃户见了他要喊“我三太爷”，如不带“我”字，耿就会将人痛骂一顿(107)。灌云李集杜养禾，家有100多顷土地，1939年冬，鱼牢庄富农张鸿如无意说了“杜养禾”三个字，杜知道后派出一连兵丁到张家，将张逮捕，搜走全部衣物及枪5支，把张关入牢房，张多方行贿才予保释(108)。  
  
　　在地主面前，佃户没有任何人格尊严。1940年，涟水县葛沟区佃户王四在地主郑介仁田里割草，郑诬王割苜蓿，将王捆起跪在门前，用“毛厕括屁棒”括嘴。佃户马如祥因缺差一次，地主赵某见他正做饭，“用屎粪勺放里去搅”(109)。涟水塘西区地主井瑞五，佃户替他家挑水，不能换肩，前一桶水他会留下，后一桶拒收，因他认为“佃户会放屁，有臭味”(110)。涟水西乡奋官庄地主朱子龙，有3个客庄、2000多亩地、50多家佃户、4个大炮楼，“他门前的马桩上，经常吊着佃户打得皮开肉绽”。佃户徐兆标因拿他家一个馒头给乞丐，一家13口被罚跪半天，并被罚洋200元。最后把徐逐出庄，没收所有财物。从此连乞丐都不许上他家门。马树本替他当差，解手时间稍长，他令人打得马树本大小便失禁。胡广才因探亲，误了一天庄差，回来后他拿枪就打。经多人求情，最终打了40皮鞭。“他打人时，要叫人向他笑，否则认为你被打不愿意，打得更厉害。”(111)  
  
　　在地主的威权下，平民没有生命权。涟水塘西区乡长井泉五，有12顷地，庄丁孙培伦妻替他做饭时糊锅，井令孙将妻打死，孙因妻怀孕，不忍下手。井喝道：“三爹命令，非打不可。”孙被逼杀妻(112)。峄县王海槎之子王致平因一名16岁使女答话“犯上”，先用烙铁烙，后用皮鞭抽，再活活打死(113)。  
  
　　潘正芳回忆：  
  
　　记得有一次，我从古邳上县城，途经魏集北门，曾目睹一桩惨事：夏××的狗腿子，向农民魏树德要租粮没有要到手，竟然把魏的年轻妻子带走抵租，魏妻有两岁多的小男孩跟着哭喊，凶残的狗腿子一刺刀戳死小孩，把孩子扔多远。还说：“去狗肚里喝汤吧!”(114)  
  
　　连汪伪政府也认为，徐海地区，“七八年来除直接受到军队的灾害外，更有着地方上恶势力的压榨，他们唯一的借口是‘通八路’，如果敲诈不遂，便联络官方实行那最惨酷的‘活埋’，在七八年中也不知被活埋了多少人，有时更把被活埋人底家属叫他们在旁看着受刑”(115)。东海南岗区日伪区长(下同)刘海如等，杀死人命29条。沭阳韩山乡杨士同等杀死人命19条。宿迁北部沂河区土楼乡王洪波杀死8人，维持会长王守巡杀死9人，最奇的连律师王维英也杀死4人。沭阳章集区葛子玉仅1941年8月27日在仲湾就打死仲兆奎、仲兆彬、仲兆喜、仲兆佑、石广仁及仲跻昌之妻、葛明俊之母、赵廉(后被勒死)等(116)。沭阳小店区朱开富杀害人命28条，薛棣西杀害人命15条(117)。沭城某区长张晋民杀害的百姓超过10人(118)。宿迁北部蒋记临陵乡长陆永禹，仅于陆沟、西欧棋盘一带，即活埋33人，死者妻子，大都被出卖、奸淫(119)。张敬轩在博爱，先后杀死130多人，以致该村多年很少看到男人。刘村一妇女拒奸，被掷入水井，因井中尸骨太多，未被淹死，爬出来二三年不敢露面(120)。  
  
　　在封闭的乡村社会中，集各种权力于一身的大地主，既然把自己土地上的佃户视为农奴，就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对其土地上的妇女拥有性权力。20世纪20年代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一项决议案指出：“地主又在批耕约中时常规定：如欠租的时候，地主得直接没收其家产。……甚者虽其妻儿，亦把来抵租。”(121)一位无政府主义者指出：豪绅“在和平的民众们间，他可以任所欲为。人民的财产就是他的财产，人民的妻子，就是他的妻子”(122)。狄超白写道：“地主恶霸强夺人妻，强奸农民闺女，也算不得希[稀]奇。”(123)苏北豪绅势力之大，甚至可以强占县长的女儿。盱眙县日伪县长郭济川只有一女，“非常疼爱”，“长大供其读书”(124)。1939年，郭女竟“被仇集豪绅宋振中仗势强娶为妾。该女备受宋妻虐待，过着佣人生活”(125)。郭济川终也无可奈何。一般平民妻女的遭遇也就可想而知了。  
  
　　综上所述，近代苏鲁社会掌握政治、经济、行政等权力的大地主，构成了社会的上层，他们掌握的绝对权力导致了绝对腐败。经济与人格相对独立的中间阶层极为弱小，在苏鲁社会中基本上没有影响力。因而，这种哑铃型社会经济结构中，弱势群体无法抗拒强势集团的种种侵权行为，自然无法抗拒强势集团的初夜权要求。  
  
　　地主本身并不意味着罪恶。但利用权势故意制造社会不公正，从而使自己成为利益集团的大地主，则是罪恶的象征。  
  
　　三  
  
　　大地主是乡村权力的集中占有者，事实上是国家的宠儿和依恃的精英。如中国传统法规就明确禁止“奴讦其主”(126)。由于国家政策的偏误，大地主势力膨胀，成为苏鲁社会甚少受到制衡的强势群体。至元十九年(1282)十二月，杨少中陈奏：“切见江南富户，止靠田土。因买田土，方有地客。所谓地客，即系良民。主家科派其害，甚于官司差发。若地客生男，便供奴役；若有子女，便为婢使，或为妻妾。”(127)应该说，苏北的地主早就对农民拥有领主式的奴役权，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20世纪40年代。与中世纪的欧洲相似，农民须向领主或保护者购赎初夜权(128)，无力承购者，连婚姻权都被剥夺。杨少中奏：“又有佃客，男女婚姻，主户常行拦当，需求钞贯布帛礼数，方许成亲。其贫寒之人，力所不及，以致男女怨旷失时，淫奔伤俗。”(129)  
  
　　随着近代中央政府威权的下降，既无法像传统“盛世”那样，利用国家权力抑制豪强，更不能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公民政府，使平民享有公民权，利用程序化的法律规范限制这一强势集团的违法越权行为。  
  
　　近年来，学界对中国的大地主阶层有较多的质疑(130)。文学作品中“没有见利忘义、贪恋钱财；没有霸占民女、贪恋女色”的地主形象(131)，备受某些学者的赞赏。事实上，由于没有法治环境，大地主腐败的程度实乃骇人听闻。一些地主豪绅的势力远在县政府之上。有些县长必须听命寨主才能履职(132)，有的还被豪绅公然杀死(133)。  
  
　　由于大地主本身多是军政官员，并由于教育背景、经济资源、人际关系等因素，大地主本人、亲属及子嗣显然比贫民更容易跻身官场。据国民党学者调查，“一般农民都是无智识的，子弟小的时候，都任他们去游荡，略大的就干着割算[草]等工作，都是不给子弟们去受教育，所以往往受一班劣根性的人欺弄的。沭阳的农村学校，还没有普及，学校里的学生，多数都是富农的子弟”(134)。此处的富农系指富裕家庭。滕县大地主申宪武的家训是：“能交游官场，花钱再多也得花。”(135)应该说，不论是古代、还是近代国家，国家的公权力总是被逐渐私有化。各级政权总是逐渐被大地主所利用和把持。正如亚当·斯密所说：“有时候，所谓的国家的宪法代表政府的利益，有时是代表左右政府的某些特殊阶层的人们的利益。”(136)  
  
　　在没有法律规范的环境里，满足了物质需要的大地主们，没有任何动力和动机去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需要，只能沉湎于低层次的肉欲享受。在治世时，他们充其量是西门庆、韦公子式的人物，虽然不断地腐化社会，但不会危及国家政权。因此，大地主通常利用国家赋予的各种权力，牢牢控制着在经济上依赖他们的下层民众，进一步破坏国家体制，破坏社会的各种规范，甚至直接起而推翻予他们以各种恩宠的国家政权，就如宿迁人项羽所言：“彼可取而代也”，由自己充当可以享受更大肉欲的封建君主，而不满足于当“土皇帝”。晚清名臣潘祖荫对苏北鲁南一带地主豪绅的军事化深感忧虑：“山东郯城至江南宿迁一带土匪蜂起，道路为梗。现闻红花埠一带，俱筑土城，挖濠沟，虽为防土匪起见，究莫知意之所在。团练乡勇愈聚愈多。原其初心，未必即怀叵测，而势由积渐，实恐浸成祸端。”(137)这种担忧是有相当的根据的。  
  
　　在苏鲁地区，豪绅反叛不胜枚举。大地主平时拥有的君主般的权力，促使他们频繁地“叛君”。明熹宗天启二年(1622)，巨野徐鸿儒，“以妖术煽众，为闻香教。设盆水照人头面，自见帝王将相衣冠”。从者达数万人，攻占了郓城县城(138)。清顺治年间(1644—1661)，成武人李化鲸，“纠党谋逆，奉伪主，僭忠义王，遂发兵反”(139)。咸丰十一年(1861)四月，定陶县贾由彪等谋反，聚集两千余人攻打定陶县城(140)。1927—1928年，涟水大地主朱温领导红会暴动，目标是打下南京称帝(141)。1929年2月12日，山东马士伟称帝，国号“黄天”(142)。同年4月11日晨，宿迁薛干臣称帝，建立“大同”国(143)。1938年以后，侵华日军攻占了苏鲁部分地区，以大地主为首的利益集团更纷纷叛国。“当初徐州沦陷时的地方情景，真是所谓：‘十八路反王，七十二路烟尘。’敌骑纵横，匪伪遍地。”(144)宿迁某乡乡长王斗山投日后，摇身变成了伪军区团长(145)。灌云县大地主徐继泰，原任国民党常备第二旅长，1943年投日，历任71旅、11旅旅长(146)。峄县南古邵大荒村大地主孙茂墀，1940年投日，被任命为峄县警备第六大队队长(147)。前文所述的徐士流、张少桐、顾豹成、朱子龙、井泉五、郭济川无不投降了日军，担任各种官职或军职。苏鲁地区大地主阶层的频繁“叛君”与普遍叛国表明，在近代民族国家的构建中，这一利益集团不是正面的建设力量，更不可能成为积极的中坚因素。  
  
　　因此，苏鲁地区的初夜权，是乡村法制毁坏、地主权力失控的结果，而不是源于法律规定或宗教习俗。豪绅大地主在社会生活中的优势地位以及掌握的较多资源，主要用于维护其私益和满足其私欲，而不是把这些资源用于追求更高成就的动机，实现人格的进一步升华。他们没有脱离本能需要的追求，使其在近代社会中始终沦为负面的因素。  
  
　　掌握国家权力的军政人员，极易成为乡村大地主，进而成为一个强势的利益集团。因此，本文所说的大地主，如其说是土地占有者，更不如说是乡村权力的占有者，且这种权力基本不受程序化法规的制约。这个集团享受了国家政策的种种优渥，成为国家在乡村的化身，但他们却不是国家利益的维护者。也正因为这个集团集国家万千宠爱于一身，造成了对平民最大程度的剥夺，使苏鲁社会除了这个集团外，几乎所有的平民群体都成为依附于他们的贫困阶层，社会结构发展成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型。显然，与金字塔型结构相比，哑铃型结构更加体现了社会不公，也更加脆弱，更容易崩溃。由于缺乏经济与人格相对独立的中间阶层，一方面，社会上层极易通过经济手段对下层进行控制。另一方面，社会上层可以轻易地控制社会的话语权，通过思想精神层面对社会进行操纵，成为具有巨大社会动员能量的集团。  
  
　　表面上看，初夜权是强势集团剥夺贫民性权利，满足个人肉欲的陋俗。进言之，通过剥夺贫民的人格尊严，树立强者在社会中的独尊地位。从深层次看，由于其权力极少受到程式化法制的制约，强势集团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肆意制定乡村规范，任意创造低俗“文化”，恣意发展陋劣“传统”，对平民从物质与精神两方面进行统治。由于性权利被剥夺者的长子与剥夺者之间可能存在的血缘关系，初夜权还有助于强化贫民对豪强的君父认同，更有利于对其加以控制。  
  
　　在严重缺失法治的环境下，一方面，强势集团绝不会成为近代国家的建设力量和乡村社会的稳定因素，他们无所不用其极地把自由民变为农奴、甚至奴隶，使依靠不合理、不公正原则建立的社会关系无以变革，固化为彻底的人身依附关系。另一方面，强势集团本身的人格升华受到了极大的束缚，使他们异变为仅能追求肉体享受的低层次人格，始终处于动物本能的状态。  
  
　　在大地主阶层的操纵下，本应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近代国家，成了强势集团的代言人和最忠实的保护者。而强势集团却往往以叛“君”和叛国来作为回报。这一悖谬现象表明，要建设真正的近代民族国家，必须对强势集团进行程式化的监督和法制制约。  
  
　　附记：本文初稿曾获曹树基、胡永恒、刘克祥、胡英泽、张佩国诸位教授的批评，深表感谢!  
  
　　注释：  
  
　　①Jrg Wettlaufer, “The jus primae noctis as a male power display: A review of historic sources with evolutionary interpretation, ”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 2000(21), pp. 111-123; S. MacPhillb, “Jus primae noctis and the sexual image of Irish landlords in folk tradition and in contemporary accounts. Bealoideas”, The Journal of the Folklore of Ireland Society, 1988(56), pp. 97-140; Voltalre, Le Droit du seigneur, ou l’écueil du sage, comédie, 1762-1779, Vijan: Lampsaque, 2002; 二阶堂招久：《初夜权》，汪馥泉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4—7页。  
  
　　②学界目前对初夜权通常有三种解释：(一)原始习俗。恩格斯指出：“在另一些民族中，新郎的朋友和亲属或请来参加婚礼的客人，在举行婚礼时，都可以提出古代遗传下来的对新娘的权利，新郎按次序是最后的一个。……在另一些民族中，则由一个有公职的人，一部落或氏族的头目、酋长、萨满、祭司、诸侯或其他不管是什么头衔的人，代表公社行使对新娘的初夜权。”(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9页)拉法格认为：“在父权社会的初期，这种公公与儿媳通奸的事是一种很自然的实践。……丈夫的兄长也僭妄地对于新媳妇保留初夜权”([法]拉法格：《拉法格文学论文选》，罗大冈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45页)。持类似看法的还有周作人(少侯：《周作人文选》，上海：启智书局，1936年，第199页)、二阶堂招久(《初夜权》，第41—54页)，等等。(二)宗教信仰。8世纪天竺、唐、吐蕃等王朝密教盛行的时候，阿利僧拥有信徒的初夜权(杜继文主编：《佛教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94页)。对西藏的类似看法还有Komroff(Manuel Komroff ed., 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 1271-1295, v. 2. NewYork: The Limited　Editions Club. 1934, pp. 252—253)，对新疆的类似记载有谢彬《新疆游记》(上海：中华书局，1929年，第134页)。(三)封建领主特权说。倍倍尔指出：“地主对于他们的家臣和农奴差不多有无限的支配权。……臣下们的主人，自承有使用女农奴和家臣的性的权利——‘初夜权’就是这种权力的表现”([德]倍倍尔：《妇人与社会》，沈端先译，上海：开明书店，1927年，第89页)。持类似看法的还有蔡和森(蔡和森：《社会进化史》，《蔡和森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464页)及Pfannenschmid(H.Pfannenschmid, “jus primae noctis”, Das Ausland, 1883[56], pp. 141—150)、Hanauer(C. A. Hanauer, “Coutumes matrtmonlal du moyen-age”，mémoires de l’Aac-demie Stanislas, 1893[2], 253—312)。另有男性权力展示说(Jrg Wettlaufer, “The jus primae noctis as a male power display：A review of historic sources with evolutionary interpretation，”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2000[21]，p.111)、强奸说(Vern L. Bullough, “Jus primae noctis or drolt du seigneur”, The Journal of Sex Research, 1991, 28(1), pp. 163—166)，等。  
  
　　③据刘克祥先生2011年7月9日在河南大学召开的“中国近代乡村研究的理论与实证研讨会”上对拙文评论时所谈。  
  
　　④各地流传最广的是元代蒙古人对汉人施行的初夜权。参见张紫晨：《中国古代传说》，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317页；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上海分会等编：《中国民间文学论文选(1949—1979)》上册，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第174页；荀德麟等：《运河之都——淮安》，北京：方志出版社，2006年，第174页，等等。  
  
　　⑤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14页。  
  
　　⑥金性尧：《炉边诗话》，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页；何满子：《何满子学术论文集》(下)，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8页。  
  
　　⑦林鲤主编：《中国历代珍稀小说》(1)，北京：九州图书出版社，1998年，第103页。  
  
　　⑧蒲松龄：《聊斋志异》，长春：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806、423页。  
  
　　⑨宣鼎：《正续夜雨秋灯录》(下)，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221页。  
  
　　⑩程守谦：《退谷文存》卷一，光绪二年(1876)刻本，第31页下。  
  
　　(11)《沭阳奇案》，《申报》第649号，同治甲戌四月二十七日(1874年6月11日)，第3版。  
  
　　(12)李妙根编：《国粹与西化——刘师培文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288页。  
  
　　(13)萧县党史办、萧县档案局(馆)编：《萧县党史资料》(1)，萧县，1985年，第44页。  
  
　　(14)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江苏省农村调查》(内部资料)，1952年，第438页。　　  
  
　　(15)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山东省农村调查/华东各大中城市郊区农村调查》(内部资料)，1952年，第63页。  
  
　　(16)虞山棣花庵主人稿：《黑虫伤人致命》，《申报》第428号，清同治癸酉七月二十七日(1873年9月18日)，第3页。  
  
　　(17)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125页。  
  
　　(18)中岛权：《江北农村社会の构造に就て》，《满铁支那月志》1930年第9期。  
  
　　(19)唐文明：《宿北大战》，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82页。  
  
　　(20)如栖霞县，“事情[初夜权]确实有”，但“群众不肯谈自己事情”。见栖霞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等合编：《牟墨林地主庄园》，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65页。  
  
　　(21)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江苏省农村调查》(内部资料)，1952年，第438页。  
  
　　(22)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淮北分会、江苏省泗洪县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编：《邓子恢淮北文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9页。  
  
　　(23)潘朗：《新民主主义的道德》，香港：智源书局，1950年，第2—3页。  
  
　　(24)2009年6月17日，笔者与包蕾在南京市江苏省军区第一干休所对徐士善(正军级离休干部，1922年生)的访谈。  
  
　　(25)《淮海报》1947年10月17日，第1版。  
  
　　(26)《苏北报》(淮海版)1946年3月22日，第1版。  
  
　　(27)张新羽：《土地革命时期灌南地区的农民暴动概述》，《灌南革命史料》第1辑，1984年9月，第257页。  
  
　　(28)《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第114页。  
  
　　(29)文年：《〈大地主程震泰〉补遗》，《淮海报》1946年7月15日，第4版。  
  
　　(30)洪崖：《孙二太爷的后代》，《淮海报》1946年6月21日，第4版。  
  
　　(31)《淮海报》1947年11月9日，第4版。  
  
　　(32)《淮海报》1946年7月3日，第1版。  
  
　　(33)《淮海报》1946年6月21日，第4版。  
  
　　(34)《淮海报》1944年8月19日，第1版。  
  
　　(35)《苏北报》1945年11月19日，第2版。  
  
　　(36)《苏北报》(淮海版)1946年3月25日，第1版。  
  
　　(37)《淮海报》1947年9月28日，第1版。  
  
　　(38)王启云编著：《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减租减息》，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第147页。  
  
　　(39)张令仪：《在革命队伍里》，何以祥等：《似火青春——八路军(临汾)学兵队成立五十周年纪念文集》，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第187页。  
  
　　(40)张子敬，1913年生，曾任中共单县县委组织委员、单县县委书记。1939年5月，任苏鲁豫区党委巡视团主任。  
  
　　(41)2011年1月11日，笔者与张广杰在复旦大学医学院老干部处对张令仪(1921年生)的访淡。  
  
　　(42)《山东职工运动的总结——一九四○年八月十一日霍士廉在联合大会上的报告》，山东省总工会、山东省档案馆合编：《山东工人运动历史文献选编》第2集，1984年打印本，第20页。  
  
　　(43)陈昊苏编：《陈毅诗词全集》，北京：华夏出版社，1993年，第123页。  
  
　　(44)江苏省档案馆藏：《山东抗日民主政府三年工作总结及今后民主政治建设方案》，案卷号6—14，资料4000754，第19页。  
  
　　(45)杨杰：《人生曲》，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1991年，第205页。  
  
　　(46)Jorg Wettlaufer,“The jus primae noctis as a male power display: A review of historic sources with evolutionary interpretation, ”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 2000(21), pp. 111—123.  
  
　　(47)Manuel Komroff ed., 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 1271—1295, Vol. 2, New York: The Limited Editions Club, 1934, pp. 252—253.  
  
　　(48)谢彬：《新疆游记》，第134页。  
  
　　(49)谢彬：《新疆游记》，第134页。  
  
　　(50)田发刚、谭笑编著：《鄂西土家族传统文化概观》，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30页。  
  
　　(51)伍湛：《土家族的形成及其发展轨迹述论》，《伍湛民族学术论集》，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9年，第144—145页。  
  
　　(52)沈从文：《白河流域几个码头》，《沈从文散文选》，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63页。  
  
　　(53) 陈翰笙：《“大跃进”中所见所闻》，张静如、李松晨主编：《图文共和国史记》，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第899页。  
  
　　(54)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中国科学院贵州分院民族研究所编：《贵州省望谟县桑朗亭目历史、安龙县龙山布依族解放前社会经济、镇宁县扁担山布依族解放前社会经济和阶级斗争调查资料》，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中国科学院贵州分院民族研究所，1964年，第18页。  
  
　　(55)郁达夫：《郁达夫文集》第3卷，广州：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2年，第227页。  
  
　　(56)宋时编选：《宋之的文集》，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412页。  
  
　　(57)L. L. Betzig, “Despotism and differential reproduction: a cross cultural correlation of conflict asymmetry, hierarchy, and degree of polygyny, ”Ethnology and Sociobiology, 1982(3), pp. 209—221.  
  
　　(58)毛泽东：《中国农民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中国农民》第1卷第1期，1926年1月，第14—18页。  
  
　　(59)详见马俊亚：《从沃土到瘠壤：淮北经济史几个基本问题的再审视》，《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60)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山东省农村调查/华东各大中城市郊区农村调查》(内部资料)，1952年，第6页。  
  
　　(61)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山东省)》第2编，上海：华丰印刷铸字所，1934年，第10页。  
  
　　(62)马俊亚：《近代淮北地主的势力与影响》，《历史研究》2010年第1期。  
  
　　(63)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编：《江苏省农村调查》，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67页。  
  
　　(64)杨奎松：《新中国土改背景下的地主问题》，《史林》2008年第6期。  
  
　　(65)贾桢等监修：《大清文宗显皇帝实录》卷二二二，东京：大藏出版株式会社，无刊印年月，第14页a。  
  
　　(66)李艺辉：《窦家的“千顷牌”传说》，《郯城文史资料》第6辑，1989年11月，第173页。  
  
　　(67)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封建土地制的覆灭——新中国成立初期山东的土地改革》，北京：中国大地出版社，1999年，第366-367页。  
  
　　(68)《山东抗日民主政府三年工作总结及今后民主政治建设方案》，江苏档案b1942，案卷号6—14，第23页。  
  
　　(69)杨鹤高：《大地主“程震泰”家业兴衰始末》，《沭阳文史资料》第2辑，1985年，第120页。  
  
　　(70)金安清：《水窗春呓》卷下，欧阳兆熊、金安清撰，谢光尧点校：《水窗春呓》，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74页。  
  
　　(71)Journal of the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23, 1889, p. 98. 转引自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173页。  
  
　　(72)中共萧县党史办公室、萧县档案局(馆)编：《萧县党史资料》第1辑，第117页。  
  
　　(73)孙晓村：《现代中国的农业经营问题》，《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3卷第2期，1936年4月，第462页。  
  
　　(74)中共萧县县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萧县地方史》第1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第3—4页。  
  
　　(75)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编：《江苏省农村调查》，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3页。  
  
　　(76)吴寿彭：《逗留于农村经济时代的徐海各属》，《东方杂志》第27卷第6号，1930年3月25日，第79页。  
  
　　(77)胡焕庸：《两淮水利盐垦实录》，南京：中央大学，1934年，第17页。  
  
　　(78)土地委员会编：《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1937年1月，第32页。  
  
　　(79)Chee Kwon Chun, “Agrarian Unrest and the Civil War in China,”Land Economics, Vol. 26, No. 1(Feb. 1950), pp. 17.  
  
　　(80)郑震宇：《中国之佃耕制度与佃农保障》，《地政月刊》第1卷第3期，1933年3月，第294页。  
  
　　(81)陈翰笙：《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汪熙等主编：《陈翰笙文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61页。  
  
　　(82)贾桢等监修：《大清文宗显皇帝实录》卷二二二，第14页a。  
  
　　(83)董成勋：《中国农村复兴问题》，上海：世界书局，1935年，第191页。  
  
　　(84)详见江苏省档馆藏：《泗洪县大庄集农民起义的调查材料》，泗洪县地方志档案I-33-4-31，第2页；江苏省档案馆藏：《苏北区农业生产调查报告》第9号《沭阳县塘沟区华邦乡》，1952年8月，中共苏北区档案3067-48(永久)，第16页b。  
  
　　(85)《淮海报》1946年7月1日，第3版。  
  
　　(86)《苏北报》(淮海版)1945年9月26日，第4版。  
  
　　(87)2009年6月17日，笔者与包蕾在南京市江苏省军区第一干休所对李棠(正师级离休干部，1925年生)的访谈。  
  
　　(88)华东军政委员会农村改革委员会编：《山东省农村调查/华东各大中城市郊区农村调查》(内部资料)，1952年，第37页。  
  
　　(89)华东军政委员会农村改革委员会编：《山东省农村调查/华东各大中城市郊区农村调查》(内部资料)，1952年，第55页。  
  
　　(90)江苏省档案馆藏：《山东抗日民主政府三年工作总结及今后民主政治建设方案》，案卷号6—14，资料4000754，第23页。  
  
　　(91)《沭阳农业农村农民之概况》(作者不详)，《农村经济》第2卷第6期，1935年4月1日，第77页。  
  
　　(92)管文蔚：《管文蔚回忆录续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3页。  
  
　　(93)黄克诚：《关于盐阜区抗日根据地的建设问题》，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江苏省档案馆编：《苏北抗日根据地》，打印本，1989年8月，第547—548页。  
  
　　(94)吴寿彭：《逗留于农村经济时代的徐海各属》，《东方杂志》第27卷第6号，1930年3月25日。  
  
　　(95)郑震宇：《中国之佃耕制度与佃农保障》，《地政月刊》第1卷第3期，1933年3月，第294页。  
  
　　(96)Journal of the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23, 1889, pp. 79—117. 转引自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173、195页。  
  
　　(97)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山东省)》第2编，上海：华丰印刷铸字所，1934年，第55页。  
  
　　(98)郑震宇：《中国之佃耕制度与佃农保障》，《地政月刊》第1卷第3期，1933年3月，第300页。  
  
　　(99)苏冷：《睢宁的农民生活》，《农村经济》第2卷第8期，1935年6月1日，第91页。  
  
　　(100)《沭阳农业农村农民之概况》(作者不详)，《农村经济》第2卷第6期，1935年4月1日出版，第77页。  
  
　　(101)《灌云县之农业》，《中外经济周刊》第198号，1927年1月29日，第20页。  
  
　　(102)《徐海蚌特委报告(1928年11月)》，中共萧县党史办公室、萧县档案局(馆)编：《萧县党史资料》第1辑，1985年，第65页。  
  
　　(103)李树春编：《山东政俗视察记》上卷，济南，1934年，第269页。  
  
　　(104)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56页。  
  
　　(105)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9页。  
  
　　(106)[法]居尔蒂斯：《夜深沉》，顾微微、李玉民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56页。  
  
　　(107)《淮海报》1946年6月16日，第4版。  
  
　　(108)冯树人：《地主杜养禾》，《淮海报》1946年7月26日，第4版。  
  
　　(109)《苏北报》(淮海版)1946年3月8日，第1版。  
  
　　(110)《淮海报》1946年6月21日，第4版。  
  
　　(111)向群：《奤官庄地主与佃户今昔》，《淮海报》1946年7月4日，第4版。  
  
　　(112)《淮海报》1946年6月21日，第4版。  
  
　　(113)高瑛：《峄县王恒兴》，《峄城文史资料》第1辑，1989年10月，第139页。  
  
　　(114)潘正芳：《旧事杂忆》，《睢宁文史资料》第7辑，1992年3月，第139页。  
  
　　(115)卓印环：《淮海一角：卓圩与高圩》，《大公》1945年5月15日，第76页。  
  
　　(116)以上见《苏北报》(淮海版)1946年3月12日，第1版。  
  
　　(117)《苏北报》(淮海版)1946年3月12日，第2版。  
  
　　(118)《苏北报》(淮海版)1 946年3月23日，第1版。  
  
　　(119)《淮海报》1947年9月28日，第1版。  
  
　　(120)《苏北报》1945年10月28日，第2版。  
  
　　(121)《废除地主对于农民苛例决议案》，《中国农民》第六、七期合刊，1926年，第12页。  
  
　　(122)一墨：《土豪劣绅之研究》，《革命周报合订本》第11册，上海：革命周报社，1929年9月，第175页。  
  
　　(123)狄超白：《中国土地剥削关系底激化与农业生产力底衰退》，沈志远主编：《中国土地问题与土地改革》，香港：新中出版社，1948年，第38页。  
  
　　(124)钝子：《日伪县长郭济川片断》，《盱眙文史资料》第2辑，1985年6月，第131页。  
  
　　(125)钝子：《日伪县长郭济川片断》，《盱眙文史资料》第2辑，1985年6月，第132页。  
  
　　(126)《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典四十一，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第1955页。  
  
　　(127)《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典五十七，第2051页。  
  
　　(128)P. K., “The Jus Primae Noctis,”Folklore, 1898, 9(4), pp. 366-368; M. Peacock, “Jus Prim Noctis, ”Folklore,1903, 14(4), pp. 419-420; E. D. Jones, “Medieval merchets as demographic data: some evidence from the Spalding Priory estates, Lincolnshire, ”Continuity and Change, 1996, 11(5), pp. 459—470.  
  
　　(129)《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典五十七，第2051-2052页。  
  
　　(130)如杨奎松：《新中国土改背景下的地主问题》，《史林》2008年第6期；赵冈：《试论地主的主导力》，《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王志润：《对清代中后期地主大规模兼并土地的质疑》，《新东方》2005年第1/2期。  
  
　　(131)林爱民：《好一个“大写”的地主——试析〈白鹿原〉中白嘉轩形象的创新意义》，《名作欣赏》2008年第1期。  
  
　　(132)吴寿彭：《逗留于农村经济时代的徐海各属》，《东方杂志》第27卷第6号，1930年3月25日，第73页。  
  
　　(133)孟庆平：《县长张德焱被烧真相》，《邳县文史资料》第4辑，1986年，第108页。  
  
　　(134)《沐阳农业农村农民之概况》(作者不详)，《农村经济》第2卷第6期，1935年4月1日，第80页。  
  
　　(135)一禾：《鲁南匪伪顽首——申宪武》，《滕州文史资料》第7辑，1991年，第127页。  
  
　　(136)[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感论》，谢祖钧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15页。  
  
　　(137)潘祖荫：《请责成署淮海道办理江南山东交界土匪疏》，《潘文勤公(伯寅)奏疏》，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6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第43页。  
  
　　(138)李登明等纂修：《曹州府志》卷二十二，菏泽地区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8年重印，第762页。  
  
　　(139)李登明等纂修：《曹州府志》卷二十二，第764页。  
  
　　(140)冯麟溎修，曹垣纂：《定陶县志》卷九，瑞林堂刻本，1916年，第14页a。  
  
　　(141)参见周焰：《中共涟水特支与红刀会暴动》，《档案与建设》2001年第4期。  
  
　　(142)《山东自称皇帝之马匪已剿灭》，《申报》1929年8月12日，第9版。  
  
　　(143)《徐东刀匪又起骚动》，《申报》1929年4月18日，第7版。  
  
　　(144)江苏省档案馆藏：《淮北苏皖边区三年来的政府工作》(1942年10月)，案卷号6—1，资料4000739，第7页。  
  
　　(145)郭乾元：《汉奸王斗山的滔天罪行》，《宿迁文史资料》第7辑，1986年，第221—226页。  
  
　　(146)《苏北报》(淮海版)1945年9月26日，第4版。  
  
　　(147)孙晋辉：《峄南土司令孙茂墀》，《峄城文史资料》第5辑，1992年，第122—131页。